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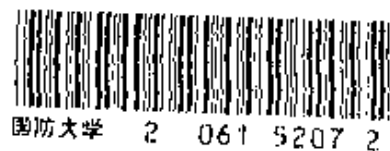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从革命到独裁

——悲壮的法国大革命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从革命到独裁

——悲壮的法国大革命

陈贵峰 刘桂珍 陈小春 著
陈振中 刘新春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从革命到独裁

陈贵峰 刘桂珍 陈小春 著
陈振中 刘新春 葛 波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8.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3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1.0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懂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桛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梓，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震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法国大革命	
缘起	(1)
崛起的革命时代乞助于卢梭——一个日内瓦的公民。罗伯斯庇尔说：“这次革命，卢梭就是导师。”	(1)
“那一天，我目睹了法国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文学家司汤达这样追忆道	(18)
西哀士质问法国：“第三等级是什么？”路易十六惊呼：“怎么，这不是造反吗？”“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25)
第二章 拉法耶特的革命——君主与自由结合的梦想	(34)
攻陷巴士底狱，“华盛顿之子”成为革命领袖	(34)
自由的光芒熠熠生辉	(39)

“把拉法耶特吊死在路灯杆子 上”	(45)
第三章 布里索的革命——共和国与危机	(53)
在分裂中产生，在斗争中壮大	(53)
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 注	(58)
在内外交困中挣扎	(65)
第四章 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血腥与 辉煌	(71)
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71)
残垣断壁下站立着罗伯斯庇尔， 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危机四伏 的法兰西	(77)
我们应当用大炮来向敌人表达 我们的宪法！我们每个人都誓 死消灭一切暴君	(86)
强盗们得势，共和国完蛋了。 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 头台	(91)
第五章 富人的王国——热月党人与巴贝 夫：通向独裁之路	(102)
“金色青年”与白色恐怖	(102)

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	(108)
第六章 走向权力顶峰的拿破仑——	
从伟大到荒谬	(115)
最强劲的生命气息吹进并活跃 了泥土造成的人，大革命的呼 唤，战神拿破仑出世	(115)
1796年4月9日，一支破烂的 法国军队在一个据说叫拿破仑 的率领下，正走在阿尔卑斯山 的狭长地带，说是去意大利 打奥军，太可笑了！欧洲没有 一个人看它一眼，然而就是这 支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上演出 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 壮的活剧，拿破仑从此声威远扬	(129)
扑朔迷离的政局，拿破仑神秘 离开埃及。共和国鼓乐喧天， 为的是迎接共和国的将军，然 而它迎回的却是一位君主	(148)
内安法国，外和欧洲，拿破仑 泪洒意大利，血腥的史诗并未 结束	(165)

科西嘉怪物来了，惊呆了的欧洲屏息细听。英国弄巧成拙，沙皇痛哭流涕。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热烈拥抱，相见恨晚	(182)
惊人的举措，维也纳举行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伊比利亚却高奏拿破仑的丧歌	(215)
第七章 走向深渊的拿破仑——从皇帝到囚徒	
“再过三年，我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1812年拿破仑如是说。然而，莫斯科却为他造好了囚车.....	(225)
山河飘零，拿破仑挥泪退位。英国报纸说：“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雄史诗结束了——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可拿破仑注定还要震惊世界	(240)
厄尔巴岛的囚徒，天涯乡思，欧洲再次惊呼：“拿破仑回来了！”百日黄粱梦，滑铁卢不尽的遗憾.....	(255)

历史的重负，海岛遗恨，拿
破仑荣归故里 (264)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 满楼——法 国大革命的 缘起

崛起的革命时代乞助于卢梭——一个日内瓦的公民。罗伯斯庇尔说：“这次革命，卢梭就是导师。”

18 世纪末，旧法国走到了它的尽头，紧接着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它为全世界奠定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

宙的基石。”

实际上，这场革命早就开始了。不过，不是在巴黎街头，而是在法国人的思想中。人们将19世纪后一切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了卢梭和伏尔泰的身上。雨果在自己的作品《悲惨世界》里，借主人公加夫罗克之口说了两句带着嘲弄口吻的歌词：

“这是伏尔泰的过错！这是卢梭的罪过！”

当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动乱，如同法国在18世纪最后12年所经历的那场动乱一样，都不是由单一事件引发的，尽管可能这一事件十分具有爆炸性。人们决不会象赛场上的运动员在听到裁判的枪声后立即冲向起跑线那样，仅仅由于某一事件的发生就去围攻旧世界，更不能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

思想界的潮流也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六在刚听到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时与其大臣一段对话所说的那样：

“怎么，这不是造反吗？”

“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卢梭、伏尔泰，还有孟德斯鸠等人，他们在

思想界所掀起的震动，也是一场革命，这就是世界近代历史上震聋发聩的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

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承担最重要任务者是卢梭。他是精神力量超越现实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榜样。他洞察、转变及改革了他的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社会。他对行将崩溃的旧世界仇恨并没有使他认错了其目标。

卢梭是共和政体的传道者。法国大革命者称他为革命的鼻祖；国民会议最得势时人们崇拜之有如神；罗伯斯庇尔下令将他的遗骸迁至先贤祠归葬。

真的，卢梭自己不会梦想到他死后的光荣竟如此伟大。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可以相信，如同伏尔泰一样，对法国大革命所加诸于他的赞扬。或许有人会予以否认。一个伟大的事业常超越它们的创始者而前进。被解放了的思想必会激起一种不能预测的大骚动。可是这样造成的社会骚动仍是他们奋斗的成果。尽管他对于命运所给予他的任务提出抗议，但是卢梭，这位孤独者，仍不失为历史上一个革命的伟大的前驱，新时代的创始者。

卢梭，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小资产者的家庭里。日内瓦是一个共和制城邦。对于时代来说，这个共和制城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它被实行君主制和信奉天主教的诸大国所包围，所渗透。

卢梭对他自己的出生地非常自豪，他一生深深地留着这痕迹。他亲手题词：

“卢梭，日内瓦的公民。”

他主张他应该有权利做“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和民主国家的成员”，他在《人类不平等起源论》的卷首写明是“奉献给日内瓦共和邦”。不管故国是如何的忘恩负义，甚至要迫害他，他总是很关心并爱护自己的“祖国”。他绝不支吾地称赞那个劳动大众的城邦和它的共和国政治的风尚。在他离开日内瓦谋生的时候，常在情绪上表现强烈的爱和悲。

“每当他研究有关政府的问题时，要是在搜集研究之中，找到本国政府所谓新的可爱的理由，他总是显得很快乐。”

当他对于一切政府加以批判时，“他仅保留着一个，并举它为模范政府”，这便是日内瓦政府。

卢梭的祖先也是法国人。他是被迫从法国逃亡的新基督教徒的后裔。虽然他以坚持日内瓦独立为荣，可是他对于法国仍还表示偏爱。他曾想隐瞒这个事实，然而终归无效；他对于法国常保持一种偏好，自认是这样：

“法国有着少许的成功，便使他心里欢乐；她的失败，便使他苦恼，好象这些失败是临到他自己身上一般。”

他 37 岁那年，仍还处于贫苦的平凡著作者群中。他们靠着从富人们和他们的伙伴的餐桌上拾取面包屑度日。

然而，1749 年夏季一次偶然的事件，使他象被雷电所击一般，受到了启示。他的笔握在手中，无异是一件凶猛的武器。他感到自身已投入于战斗的场合，在那里，有最卓越的人类精神的斗士，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着竞争。然而他一击便胜过了其他一切的人。他带着诧异和惧怕的心情，听到了他本身的声音，它使沉重的声调充满了圆形的剧场，象古代护民官的声音一样沉重有力，它攻击最受人尊敬的偶像，并撼动了旧社会的基础。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去慰问因违反出版

法而被禁闭在梵孙莱地牢中的狄德罗。天气非常炎热。他沿着荫蔽的路步行6里的路程，一边走一边翻阅一册文字评论的书。他瞥见狄容学院的通告，悬赏征求研究下列问题的佳作：

“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使道德改善？抑使道德败坏？”

一霎时，他好像“被千百道光线刺射着；许多有生气的思想”对他攻击；他感到窒息，昏迷不省人事；他倒在路边。在这里，他在思想上经过半小时的错乱状态，他发觉他短衣的前襟已被泪水湿透。他说：

“在那一刹那，我已生存在另一世界，我已成为另一人。”

这时涌现脑际的，不仅是狄容学院提出的问题获得答案，并且有一连串相继而起的观念，犹如水闸一开，激起一个“伟大真理”的浪潮，这些真理将为他将来整个的事业形成基本的要素。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出他真正的生命。他对法国旧制度的异议早就憋了很久。

卢梭体会到这时代中所酝酿的社会不安，并对它发生了兴趣。他不隶属法兰西和巴黎的集团，亦不受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这种专制，

因道德的松懈和对生活的一种讥讽态度而得到了调剂，在它的统治之下，大部分独立的作家，如百科全书派，力求自我适应，他们以他们所攻击的弊端，为自己所用。而卢梭在最初的30年中，是瑞士的一个不更事的游荡者，生活在快乐和昏睡氛围中，变成了一个怠惰的学童，不曾虑及社会的束缚和法律。因此，他对于矫饰的学者世界和巴黎的宫廷生活的道德——几乎是物质的压抑，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情感。最初，他感到惶恐和窒息，抑制着他的容忍、反抗和嫌憎的情绪，可是这些情绪在累积中。现在，它们爆发了。经他一击，社会的罪恶——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都暴露出来了。他以一次吼声的回响，启示着一向为他所不曾揣度到的一种使命。

他的成功，不仅大大地超越他自己的期望，而且也超过他本身正确的估计——一次相当平和的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舆论抓到了这一点，并给它以革命的意义。人们都把他看做文明的破坏者，因为他声言一切文明的胜利，全等于零。

普通人只会有感而发，而他却一发而不可收拾。既然笔已握在手里，他就不会停止，他必

须走到尽头。他思想的洋溢，由于首次“论文”的空前反响而增加，这使他心里落入“豪迈和德性的沸腾”。

他对于任何事物不再畏避了。但卢梭此时只知道那些哲学家的“教义中的错误和愚蠢”，这些哲学家是他以前所尊敬的，而他们亦引他为同道。他深究“在社会秩序中只有压迫和穷困”。他提到这话，态度很坚决。他以为“要使听众信服，他该使他的行为和他所提供的原则一致”。卢梭便这样实行了。他变换装束，抛弃长袜子和精致衬衣，把表卖掉，把剑丢弃，穿着用厚布缝制的一袭普通衣服和一条圆的假发；他放弃他的会计员的职位，声言要以劳动者、誊写乐谱者的身分去维持他的生计。这是他内心中所发生的一场革命，一个世纪以后为卢梭的榜样和教训所激动的托尔斯泰与他所做的一样——“我真的转变了”。没有人认得他：他不再是窘迫的、怕羞的、少不更事的异国人，也不再是容易为任何事物所慑服的年轻人。

“大胆、骄傲、勇敢，对于他和他的世纪之道德、信条、成见完全蔑视，对抱着这些成见的人们的嘲笑完全不顾。”他说，他自己的警句压

天他们微不足道的妙语，犹如在手指间捏死一只小虫一般。这是怎样一个转变！所有的巴黎人都重复说着他的讥讽刺刺人的语言，这在两年前或在十年以后，他永不会想到必须说这样的话，也不会想到应该怎样措词。

假使以后他提及他曾受迫害的话，你必须在这个战争时期中——这种战争是他宣布的，并对他所面临的时代及整个社会毫不饶恕地进行斗争——来探求他引起的难解之仇恨来源。

在他发表有关探讨科学和艺术文明等的“罪恶”的论文之后，1753年，他又发表了《人类不平等起源论》，它的社会意义和革命意味较首次论文更为深入。卢梭深觉他自己为他内心所燃烧的革命精神和他本身思想上难解的逻辑所驱使，以至排斥“财产”观念，这财产是产生不平等的始因，并排斥国家将这不平等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必要，以及排斥国家的致命的腐败现象，在这些国家里权力却为富人们所专横地僭窃着，而他们的目的是在于使人类陷于奴隶的命运。他反对将来的富人的民治主义。18世纪许多哲学家早曾大略论到这些大胆思想，但尚无一人应用少许意志力，替他的冥想规划出

一个积极的形式。

卢梭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他以为思想不是玩艺儿，对之应该抱着严肃的态度。当他对富人们诅咒时，已引起了恐惧；当他宣布将“逐渐把可怕的头抬起来的专制政治”的暴君勒死或废去的反叛是一种“司法上的行动”时，更引起了恐惧。

除这些危险的思想外，他运用他演说家的天才，运用一个足以影响听众的惊人方法：他创造一种户外的讲演体裁，练成来刺激群众。这种演说体裁把那些埋头案上的著作家所用的各种体裁都一笔勾销了。

在他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到热情的滔滔雄辩，足以使舆论受到高度的激荡。这是1758年完成的《论游艺》一书，其中某几部分早已成为革命的演讲词。其友人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但他象是受了威胁似的，感到和这个只有“日内瓦公民”资格、素不知名的人争论，心里有些恐惧。

“要与象你那样的笔争斗，该是一件危险的事。……你知道怎样取悦群众，你即以你对他们的蔑视来取悦他们……”

他把卢梭比做马丁·路德。

卢梭所希望的只是告别民众和世界，离开巴黎，单独地隐居于自然界中。他如此做了，住在蒙莫朗西的森林中的“隐庐”。这里，他感到了自由的空气。他说：“从那天起，我才开始了真正的生命。”

他从前的朋友不理解，群起责备他的行动徒然成为人们闲谈的资料，甚至说他有顽固的厌世心理。他对此有解释的必要，“那不能克服的自由精神，没有东西能摧垮它。在它之前，所谓尊荣、财产、甚至名誉，都已微不足道。”他又出诸衷诚地说：

“不仅如此，在我内心活跃的自由精神，其起因于怠惰，系较自尊心为多。但这怠惰是不可思议的；任何事情都使它恐惧；公民生活中最微小的义务都难忍受；说句话，写封信，作一次访问，如果这些事情是必要的话，对我都是一种痛苦。”

他青年时期的一切努力所要达到的，只有一个目标：“幽居与休息”。如果他一旦可以享受到这些，他就会立即促使自己善加使用。

他内在的恶魔是破坏幽居的原因。

虽然他退隐于田间，文人学士们却把他当做妒忌的好目标，他们不时残酷地嘲笑这位隐士，这爱好自然的人，这社会的讥讽者，说他常设法充做理财能手和宫廷官员的家中寓公！卢梭自己也感受到这些矛盾的痛苦，但是他又禁不住以亲切的谢忱接受贵族朋友们慷慨赐予他的恩惠。他们在他们扶持下的四、五年当中写出他个人最伟大的几部著作：《新哀绿绮思》、《寄达隆培尔论游艺》、《民约论》和《爱弥儿》。

他计划着这该是他文学生涯的终局。他估计《民约论》和《爱弥儿》可使他获得8千或1万法郎的版权净收入，他可以从这个数字中拿出生活用金，然后到各地旅行，留寓在那里度幽隐生活，趁暇写作他一生中的行述。他想“这生活为一无比的真实写作，使将来总会有人明了他的用心所在”。这本《忏悔录》，好象是自言自语，生前未曾印行，字里行间，充满隐遁的快乐气氛，把人间烦扰全丢开了。

他不会猜到可怕的浪潮正向他袭来，它把他从寓所中摔出去，并追逐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他有许多敌人，被卢梭视为他们秘密团体

的叛徒之“哲学家”，就如同他们满怀嫉忌的和怨毒心理视其领袖伏尔泰为敌人一样；法院的中产阶级即法院分子，他们开始猜疑在这异国人惊人而革命的思想里所潜藏的危险；他们最后认为这是无神论者和迷信家的奇异结合。他们的态度原是踌躇的，到现在，他们却正在密切注视着一种著作，虽然卢梭自己并不觉得这著作会有什么危险。

《民约论》是卢梭写作以来一种最美丽、最纯洁、嘉惠人类最多的著作，它是容忍和仁慈的信仰者的福音，但并没落入教会一切成见的窠臼——这就是“萨伏依牧师信仰的宣言”，它构成《爱弥儿》的第四部分。它在30年之后成为罗伯斯庇尔决定国策的要籍，然而在出版时却遭了厄运。

日内瓦——他的故国下令焚毁了《民约论》。卢梭痛心疾首，“我这本著作攻击一切政府，而并不为任何政府所禁印。它只颂扬一个政府，并建议应以这个政府为榜样；而它就是在这一政府之下被焚毁的。日内瓦的长官为了他荐举他国内的法律给其它国家，而处罚她自己的公民。”

这一著作，决定了卢梭所谓“无神论的狂热”和“迷信家的狂热”的同盟联合攻击他。那时群情鼎沸，呈现猛烈的内战之征兆。“百科全书”的印行，煽动了热情的火焰。基督徒和哲学家之流，“象疯狼一般”拼命地互相搏斗。

卢梭，感到受这恶毒气氛围绕的痛苦，想用他的《新哀绿绮思》以及《爱弥儿》和他的《信仰宣言》，使两个对立营垒言归于好，并向他们陈述容忍的道理——结果，却使全体转向攻击卢梭自己。

许久以后，他才觉到自己的危险。平常极易蕴存没来由的恐惧的他，却不予理会，甚至拒绝朋友们的许多劝告。他们到《爱弥儿》几近出版时，都觉得惊骇。卢梭仍旧沉浸在狂喜之中等待他的作品问世。他住在卢森堡公爵给他的可爱的小别墅，四面有水环绕，恰似一个“美岛”。他伴着爱妻，领着爱犬和宠猫，漫步在水边。忽然，别墅四周响起了怒吼声。他开始惊惧了，并从高处落下来，失去了神志，他看见到处充斥着危险。

巴黎法院又发出一道恐怖的法令。《爱弥儿》在荷兰出版以后不到20天，还来不及把书

运进法国，法院不予通知即判定焚毁书籍，并逮捕著作人。书在巴黎大法院的楼梯下当场焚毁；当时还传说著作人也要焚死。卢梭的保护人，是法国的大贵族，他怕连累自己，怂恿卢梭逃亡。

他逃抵祖国瑞士，他俯伏着，以热烈的情绪吻着“自由之土”。对瑞士的“自由”，他不久就醒悟，日内瓦也开始焚毁《爱弥儿》。“全欧洲响起了诅咒的叫声，向我攻击，其情势的凶险是前所未见的。我被人看做基督教的叛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暴的野兽，一只狼。”他相信世界已步入癫狂之途。

他被迫逃到普鲁士，写了《山居书札》重上战场。在这个册子里，他猛烈攻击他的敌人，即日内瓦的教会和国家，并用真正基督教的名义，控诉基督新教是伪善者。

全体牧师们执着武器站起来了。教堂对他闭门不纳，教会拒绝他参加圣餐礼，他被控告为反基督的宣传者，教会怂恿人民攻击他。在田野上，有人向他投掷笨重的石块，他并受到枪的恐吓，住宅遭到袭击。德国当局命令他离去，巴黎无权容留他，他只得暂避英国。不久，又从英国逃亡，经过法国，由这地逃到那地，犹如一个被

通缉的人。有时，他甚至向空旷的大地呼喊：“我无罪啊！”

后来，他虽被准许返回巴黎，但是凄凄惨惨，住他石灰窖路边一间不成样的房子里，靠写乐谱维持生活。他已完成《忏悔录》，最后一页的内容全是发狂。他把它读给几个朋友听。但是惧受控告的他们通知警察禁止他诵读，书信检查局截留他的信件。这毕竟不是平息他的狂暴方法吧！孤单——“住在巴黎市区较鲁宾逊住在他的孤岛更孤单”——卢梭相信，他被人监视犹如全世界的公敌。他想绝望的呼喊，世俗之人不予同情。只有向上帝呼吁，并决定将他的原稿奉献给它，置于巴黎圣母院的崇高祭坛上。然而他惊悚地发现，通往歌唱队席的铁栅门关闭了！

这是极大的打击。在他看来，上帝似乎对他也不友善了。他在最后的著作《孤独的散步者梦想》中叹道：“我在世间是孤单的，除我自己外，没有兄弟、邻居、朋友、社会。人类中最友好和最亲爱的人，已为一致的意见所排斥。”1778年7月2日，卢梭在孤独中逝去了。

然而，他留下了整整一个世界。

这不幸的人，临死还以为自己是“孤单地活

在世上”，而且注定“永久”孤单，他却不曾知道他已战胜了现在和未来。从1780年起，有一半法国人都到白扬岛去巡礼。那里，安息着这疯圣遗骸。甚至王后和一切的王子亦都去瞻仰。晋谒的人们无不沉浸于崇拜和敬爱的狂喜中。“哲学者群”的妒憎终归无效，他们用恶意攻击企图破坏卢梭名声，结果反而损了他们自己名誉。一切反对终于烟消云散。

崛起的革命时代，乞助于这位日内瓦的公民。未来的法兰西革命以及每一政党的领袖们，他们以后互相吞灭——曾经联合起来向卢梭举行祀典。

布里索为了发挥“不平等论”的推论，进了巴士底狱。

罗伯斯庇尔跃上政治舞台以前，将自己当做供神之物奉献给卢梭。他在讲台上强调卢梭的遗教；当他权力红极一时，曾在6月18日（即1794年5月7日）的著名演说词中，对卢梭推崇备至：

“这次革命，卢梭就是导师，所以他的遗骸应迁葬于先贤祠。”

他对卢梭敬献橡树叶的花冠，追赠他为“人

类的导师”。

在议会的大厅，卢梭的半身像面对着富兰克林和华盛顿。

卢梭——这位“导师”，培养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家。大革命的氛围形成了。

“那一天，我目睹了法国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文学家司汤达这样追忆道

“那一天，我目睹了法国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司汤达——法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当时只有5岁，他这样追忆道。

1788年6月7日，在格勒诺布尔市发生。事情起因是这样的：王室强令格勒诺布尔大理院接受它制定的法律，在大理院法官们则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一场叛乱迫在眉睫。庶民们站到了法官们一边。

实际上，法官们也不是群众的真正的代表。作为真正的民主派，他们对此是可以拍手叫好的。因为这不正是自由制度的开端，或者按孟德斯鸠的说法，是人们希望的“以权制权”吗？然而，这些以人民代表自居的法官们毫无社会基

础而言，他们是一批地地道道的以贿赂得官的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往往不支持国民希望的改革，这些无一例外出身贵族的法官们更不会希望改变重压在平民头上的赋税负担不平等的现象。所以，一旦政府决心让富人掏掏腰包，取消某些过于明显的特权，按新的课税基数征税，站在它前面的拦路虎会是谁呢？显而易见，是大理院的法官们！政府要改革司法制度，不就是要打击法官吗？

此种改革方案必然要激怒法官，他们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反对专制主义。

国家开支无度，入不敷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不能回避改革问题了。可巴黎和各省大理院拒绝登记有关法令，其中就有土地征税法案。王室对此应采取什么对策呢？

国王看到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公开挑战，决心解决危机。在大臣的建议下，国王面对这一被称做“改变”的举动没有退让，他要对司法机构动大手术，铲除第二政权大理院，设立全权法院，以剥夺大理院的提异议权。

敕令公布之后，立即引起普遍的愤怒。多菲

内省的格勒诺布尔市大理院仿效巴黎大理院签署了抗议书。法官们气焰嚣张，拒绝就座，并且不顾命令退出会场。

大理院进一步煽动群众，指责新设全权法院没有包括第三等级的代表。大理院成功了，煽起了全城乃至整个多菲内地区群众的情绪，群众成了大理院及其利益的捍卫者，因为他们感到中央政权侵害了他们的利益。5月20日，大理院有恃无恐，在—项抗议中表示拒绝屈服于“丑恶的专制主义”。这是一场决定格市的未来，乃至生死存亡的斗争。

格市出现不稳，当局担心发生暴动，请求巴黎给予指示。上面的答复毫不含糊：必须镇压不屈服分子！消息在市内各地传开，商店相继关门，街上人群越聚越多，密探们开始在近郊出没。

这一天是星期六，正值赶集的日子。附近村庄许多农民涌进城里。手工业工人、脚夫、帮工、流浪汉等小市民受司法界教士们的鼓动，发誓保卫他们的“保卫者”。在绿茵广场出售生菜和咸鱼的粗俗妇女们对着来往人群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在临格朗街的窗前，司汤达看到一位老妇人手提一双破旧的鞋子，拼命地喊叫：

“我造反了！我造反了！”

中午，一群妇女拥上钟楼，敲响了警钟。人们的口号十分明确：阻止法官们离开城市！市政当局依仗两团兵力，发出紧急集合令。王家海军士兵向群众开枪，打死一人。被士兵追逐的暴动者翻墙上房，揭下屋顶瓦块做武器，向士兵投去。红色瓦块犹如雨注，挨打的王军领略了“格勒诺布尔行动的教训”。

全城有发生大屠杀的危险。手持斧头、镰刀、棍棒、镐头甚至枪支的农民通过城墙进入市区。人们抬着被王军打死的一位暴动者尸体沿街示威。

市政长官屈服了，请求大理院首席院长德贝吕勒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留下，暴动随即演变成纵酒狂欢。

格市的法官们不无担心地看到，在他们点燃的这场熊熊烈火中，他们有可能引火烧身。他们把主动权交给了人民，而人民一旦起来就全然不顾了。

暴动者首先要求敲锣打鼓，举行隆重仪式

把法官们迎回法院。

德贝吕勒先生出于尊严，谢绝了给予他的颇令其怀疑的荣誉，拒绝把用玫瑰花和用桂树枝编成的花环带在头上，法官们也没有人乘坐人拉马车，而是让兴高采烈的脚夫们挤坐里面。

这些身着长袍、头戴方形官帽的格市的先生们把事情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刻，这些尴尬的胜利者，在欣喜若狂的群众簇拥下，正列队前进，强颜欢笑，无数鲜花从临街窗口撒下，全城钟声齐鸣，响彻四方。

入夜，烟花齐放，四处欢歌，一派节日气氛。深夜，城市复又平静下来，警察出动了，他们四处拣拾刚刚印刷的抨击传单，其醒目标题是：《敕令精神》。传单作者是格市的一位年轻律师巴纳夫。

“宽宏大度的国王，请睁开你的双眼，”巴纳夫抨击文章写道：

“请看，你的卑微奴仆已把你的王国推向无底深渊，他们盗用你的名义，滥用攫取的非法权力，后果何等严重啊！”

推崇国王，揭露大臣，这就是这篇革命准备阶段的文章的基调。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改革

者主张实行共和。人们是通过反对来世来抵制国王的专制主义的。

格市的群众天真地以为大理院的先生们就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可是这并不能蒙骗所有的法国人。年轻的律师巴纳夫就是代表，这位受“英格兰”思想熏陶、活跃于法庭上的演说家，对于大理院先生们的傲慢，对于他们的特权等级思想，了如指掌。他当然希望按照五月敕令的规定，这些先生们仅限于履行“法官职务”。然而目前情况是：大理院是唯一能够抵制国王专断的独立权构。

巴纳夫派人士主张召开三级会议，并且通过它为国家制定一部宪法。“三级会议是唯一有效的药方，任何其它办法都只不过是掩盖和加深危机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付国王的决定，法官们也在呼吁召开三级会议。

多菲内省又走在了前列。全省的三级会议于7月21日在维济耶城堡举行。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王的专制。多菲内事件打开了一个缺口。多菲内省代表着一种潮流，在这里，贵族首先反叛，而继续反叛

活动的却是第三等级。维济耶会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很清楚，大理院的反抗作为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国王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特权者的联盟，而是全国起义的浪潮。

召开三级会议逐渐成为王国全体臣民的一致要求，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亦不例外，虽然他们还没有预感到自己将是牺牲品。国王企图推迟三级会议的举行，却是枉然。枢密院决议确定1789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决定能够稳定局势吗？恐怕不一定办得到。

专制制度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吃了败仗。地方显贵们首先扮演了动摇专制制度的角色。

16世纪以来，教士、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都是王权无限膨胀的受害者。王室成员无所不为，他们在凡尔赛宫里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把异己送入巴士底狱。所以教士和贵族对王权再一次遭到削弱并无切肤之痛，而是希望借此机会恢复失去的特权。但是，困扰国家的财政问题迫使王室实行改革。这时，大理院、教士和贵族突然反叛，把矛头对准了国王的大臣们，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在这场冲突中，今

天是我胜，明天又是你赢，唯有召开三级会议成为始终不变的口号。重提三级会议本是个幌子，包括国王、大理院法官和首先提到三级会议的所有人在内，任何人都不希望真正召开三个等级的会议。

但事态的发展使国家走上了这条道，对此，贵族从心里表示欢迎。夏多布里昂用一句话概括了由显贵们引起的却又不情愿看到的结局：“我们战胜了王室，大家战胜了它，紧接着我们与它一起跌进了同一个深渊。”

西哀士质问法国：“第三等级是什么？”
路易十六惊呼：“怎么，这不是造反吗？”
“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在7月5日枢密院的决议中，国王宣布了召开三级会议；此外，这一文件还隐隐约约地提出了新闻自由。文件说，“陛下”对175年以来停止召开的三级会议的形式尚无定见，现特“邀请”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各抒己见。没有任何规定禁止以书面形式发表意见，也就是说，人们刊印文章无须得到批准。

事实上，1787年初以来，各种小册子和文章就已大量刊行了，但是查封事件层出不穷，大理院还可以做出判决，下令焚烧刊物。7月5日以后，印刷品经历了空前繁荣时期，仅7月至9月出版的小册子就多达300余种。其中100余种月刊一直维持到1789年5月，即新闻自由正式写进“人权宣言”第十一条之前，虽然出现了个别查封事件，但是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日益增多的报纸和文章将加速“哲学”核心思想以及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更为积极的民主原则的传播。

这些刊物，绝大多数是宣传平等思想，反对教会和贵族，主张彻底取消专制主义的。动乱的年代给罕见的天才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新型的社交形式，如联谊会、读书会等，加速了这种影响。

全法国都在渴望自由、平等和民主，并把希望寄托于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但决不能改革旧有秩序，这是显贵们的基本口号。他们不愿放弃特权，尤其不能接受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尽管第三等级占全国人口98%。最后，路易十六的新任大臣内克做

出了有利于第三等级的裁决，但并没有让第三等级完全满意，因为他拒绝按人头进行表决。3个等级将分厅议事。真正的国民议会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789年初，一场大辩论振奋着民心：人类应该在怎样的基础上缔造自己的共同生活？一方是主张维护历史传统的人，即积极鼓吹神赋权利、等级制度和行业组合的卫道士。另一方面是相信人的智慧，力主平等和正义的人。这场涉及哲理的政治辩论，其关键所在十分清楚，那就是在召开三级会议之前几个月，确认第三等级拥有何种地位。

1789年1月，数以百计的小册子中有一本引起了轰动，迅即成为有关民主的圣经。人们把书中的格言挂在嘴上，常问第三等级是什么？该书第四版时才透露了作者，原来是西哀士神甫。西哀士用几句言简意赅的话语归纳国民的要求：

- “1. 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
2. 迄今它在政治等级中有何作为？没有。
3. 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有所作为。”

西哀士以此为论纲，声称第三等级是“国民

的整体”，代表一切，各行各业，各种才能均在这个整体中共处。至于压迫第三等级的特权阶层，它“无所事事”，拒绝共同的法律，因为自己置身于国民之外，它是国中之国。

西哀士不主张设立三级会议制度，而主张选举制宪国民议会，唯有国民才有资格制订根本大法。既然要设三级会议制度，那么就得把全国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肩负这一重任的只能是第三等级。

迄今，第三等级还没有真正来自自身队伍的代言人。鉴于此，他们应该拥有“从自己等级中选拔的”真正代表。这些代表应该“至少具有与特权者同等的影响”。只有建立按人表决制，把第三等级代表的名额增加一倍才具有积极意义。

西哀士的提法动摇了社会的观念，他说，第三等级已不再排列第三，它拥有 2500 万成员，它就是国民，它不应受制于 30 万特权者。第三等级行将组成国民议会。教士和贵族若要参予其中，就必须放弃特权！

西哀士的小册子风行法国，它的思想给以后的革命——行将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打上了深

深印记。然而它也预示了大革命的两重性。眼下，要求自由的呼声占了上风，而且“人民至上”的赞歌的头几个音符也已奏响。

国民不可分的特性与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彼此相容吗？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总算开幕了。第三等级的代表、贵族和教士在凡尔赛同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们面对面地入座。这本应该是个节日，但实际上只是一种仪式，而且一开始就为礼宾次序发生了争吵。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国王就显得信心不足，而且缺乏热情。内克的讲话却获得了掌声。不过，他那近3个小时长的技术性发言很快使听众感到厌倦。而且，会议主要争议的问题之一，即分等级讨论还是按人头进行辩论，实际上已经被掩盖了。

按照等级表决还是按人头表决？不乏重要人物的第三等级，通过代表资格审查问题，对此进行了激烈的长时间讨论。贵族和教士不顾内部少数自由派的意见，不愿放弃他们的特权，担心自己被淹没于3个等级组成的议会里。经过反复辩论，第三等级的代表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但毫无结果。人们面临的显然是无法克服的分

歧。

第三等级对贵族和教士的迟疑不决感到厌烦，通过西哀士之口，“勒令特权议院”去会议厅并要求民族的全体代表一起集合以召开“现行议会”。

1789年6月15日，西哀士提出了一个表面上极普通但实际上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即将组成的，“至少代表全国96%人口”的议会该怎样称呼。他说，可以叫“法国民族经过资格审查的知名代表议会”。米拉波回答说，这个称呼不好，可以简单地称为“法国人民代表议会”。穆尼埃说，不行，还是叫：“在少数派缺席的情况下法国多数派代表合法议会。”

最后，西哀士回到他的第一个叫法——建议为“国民议会”。会议大部分代表通过了这一叫法。德斯塔埃尔夫人评论说：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国王下令关闭议会的会议大厅，巴伊议长坚决表示：

“我想，聚会在一起的全体民族不能接受任何命令。”

议员们移至网球场大厅里继续集会，并且

就在那里，在此朴实无华的地方，举行了著名的宣誓仪式：

“我们宣誓永远不脱离国民议会，在形势需要的任何地方开会，直到王国的宪法制定出来并且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得到巩固。”

除了卡斯泰尔诺达里管区的马丹·多什之外，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宣誓。

国王和宫廷不能听任事态继续发展，必须刹车！6月23日，路易十六讲话，首先郑重表示他决心要使“3个等级的划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宣布第三等级的决议无效。这对国民议会来说实在是奇辱大耻，国民议会明确表示拒绝离开会场。议会就代表的不受侵犯权通过了象征权的声明。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在凡尔赛和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在内克的坚持下，路易十六命令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议员一起开会。消息传来，凡尔赛和巴黎一片欢腾，民众向国王和王后欢呼致意。

但是，此举已经太晚了！物价飞涨，三级会议踏步不前导致全国发生多次骚动。更有甚者，王朝谣言四起，一个谣传说贵族正在策划阴谋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权者在巴黎和凡尔赛集结了越来越多的雇佣军。

7月11日，星期六。正当内克准备用膳时，收到路易十六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内克秘密离开国土。宫廷占了上风，终于赶走了这位深得人心而又牵动时局变化的大臣。但是巴黎人民不答应，这特别是因为国王调集的部队越来越多。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游行队伍遍布全城。军火库被劫一空。税务所火光冲天。

7月14日凌晨，成千的示威者在荣军院的地下室里搞到了3万多支枪。但是，没有火药，没有子弹，这些枪又有什么用呢？谣言四起，紧张不安的气氛有增无减。一会有消息说德意志皇家轻骑兵要来进攻，一会儿又有人传说某某军团到了王宫门口……。没别的路可走，赶紧到有弹药的地方去，这就是下一个进攻目标：到巴士底狱去！

于是，巴士底狱被夷为平地。

当利昂古尔公爵叫醒路易十六并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时，路易十六惊呼：

“怎么，这不是造反吗？”

“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路易十六没有马上理解攻占巴士底狱的意义，而法国和其它国家都把这一举动看做是长期孕育之果。

德国的亨利·斯特芬森看到的更远，这不仅是一场“法国革命”，而且是一场“欧洲革命”。

第二章 拉法耶特的革命——君主与自由结合的梦想

攻陷巴士底狱，“华盛顿之子”成为革命领袖

公元 1789 年 7 月 14 日是法国历史上最宏伟最壮观的一天。

这天，巴黎市民听说，巴士底狱的大炮正在对着他们聚集的圣安东街。

这个堡垒所引起的恐惧，人们对这个堡垒所卫护的恶势力的憎恨，在起义时占领这个重

要据点及不使它落在敌人手中的必要性等等。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巴士底狱方面来了。自上午9时至下午2时，巴黎全城只有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

从巴黎各区来的一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士底狱进发。群众中不时地传出“攻陷巴士底狱，攻陷巴士底狱”的呼声。

守备巴士底的要塞司令拒绝了市政厅关于把武器交给人民，把大炮移开的请求，继续负隅顽抗。

人民群众向巴士底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倾向革命的法国近卫军带着大炮也来助战。在激战中，群众虽然死伤数很多，但仍奋不顾身、继续战斗，最后用炮打断了吊桥绳索，一拥而进，攻占了巴士底狱。

人民群众把满腔怒火都集中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人民群众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立即把它夷为平地。整个巴黎欢呼雀跃，庆祝着革命的成功。

1789年7月14日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起义者需要自己的领袖。

7月15日，由拉法叶特率领的100人议会代表团来到巴黎，受到起义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一片欢呼声中，拉法叶特被起义者拥戴为国民自卫军司令。

拉法叶特不负众望，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拔出佩剑，向周围的群众大声宣誓，决心竭尽全力捍卫刚刚取得的胜利，为了自由的事业，哪怕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拉法叶特决定采用红白蓝三色帽徽作为国民自卫军的徽章。此后，又决定以三色旗作为国民自卫军的军旗。从此，三色旗成为革命的象征。

同时，三色旗也反映了拉法叶特的政治主张。三色旗中的红色和蓝色，是巴黎群众起义时佩戴的标记的颜色，而白色是王室的象征。确实，拉法叶特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他一方面反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拥护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在人民起义爆发后，他顺应历史潮流，站在了人民的一边，并成为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他不主张自下而上地彻底推翻君主制度，只是希望制定一部美国式的宪法来限制王权，建立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而行使代议制的

君主国。

这里且不说拉法叶特的政治主张是否代表了法国革命的总趋向，单就拉法叶特在 30 岁刚出头时能被拥为国民军首领这一点就令人叹为观止。

拉法叶特早就是一个参加过多次革命战争的英雄。不过，他的革命战场并不是在法国，而是在美国。

1775 年 4 月，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爆发了革命。这个消息象一阵飓风席卷整个欧洲。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壮举，深深地打动了青年贵族拉法叶特的心，他早已厌倦了法国社会中的那种空虚而奢华的贵族生活，渴望投身于革命队伍中，为自由的理想去战斗。

拉法叶特冲破了来自家庭和朋友的阻挠，摆脱了反动政府的通牒，终于在 1777 年进入了北美的革命中心——费城。北美大陆会议决定重用这位不足 20 岁的异国小伙子，授予他大陆军少将军衔，任命他为大陆军司令乔治·华盛顿的副官。

拉法叶特这位不满 20 岁的法国青年和 49 岁的美国革命领袖华盛顿一见如故。在他们之

间，很快形成了一种世所罕见的、父子般的情谊。华盛顿处处把拉法叶特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从他俩的面容体型来看，确实长得酷似真正的父子。

拉法叶特多次参加北美人民的革命战争。有一次，他不幸中弹，由于流血过多而晕了过去，但等到苏醒之后，仍然坚持继续作战。

拉法叶特为北美人民的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美国大陆会议还专门写信给法国国王介绍了拉法叶特在美利坚合众国最艰苦的时候为美国人民所做的贡献，并特意为拉法叶特铸造一把精致的宝剑，在剑上刻上了他在美国参加的4次主要战役的地名作为纪念。

这时候，拉法叶特的名字已经传遍了整个法国。在人民群众心中，“拉法叶特”已经成为“为自由而战的勇士”的代名词。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称拉法叶特为“新世界的英雄”。

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给拉法叶特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在法国，从凡尔赛宫廷到歌剧院，从巴黎到外省，到处是对拉法叶特的赞扬声。

因此，巴黎人民在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就竭力拥戴拉法叶特为自己的领袖。在人民心目中，

拉法叶特已是革命的化身，人民把自己的权力交给这样的人才能放心。

自由的光芒熠熠生辉

起初，拉法叶特真的没有让法国人民失望。

首先，在拉法叶特时期，制宪会议确实着手解决过棘手的农民问题。代表们宣布放弃了他们的封建特权，如狩猎权、养鸽权和领主法厅等。8月5日，制宪议会正式宣布：

“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

“永远废除封建制度。”

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颁布了《人权宣言》。《人权宣言》思想的源泉一为法国18世纪的启蒙学派，一为美国的《独立宣言》。

而拉法叶特是直接受到美国《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浸染的。他个人与《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富兰克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的经历，使拉法叶特的自由主义思想日趋成熟。他公开赞颂美国的革命，他在自己家里的墙壁上悬挂了一张美国《独立宣言》，并在宣言旁边留下空白地方。他期待着有一天能把法国《民权

宣言》贴在那个空白处。

在法国革命前召开的三级会议上，拉法叶特就不顾王党分子的反对，毅然走上议会讲台，向大会，向全体法国人民，宣读了自己起草的《欧洲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拉法叶特是欧洲第一个起草这种宣言的人。

在起草这个宣言前，拉法叶特同美国驻法国公使，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个主要起草人杰弗逊进行了认真的切磋。拉法叶特明确指出：这个宣言，不是同国王要求妥协的祈求书，而是按照“美国革命的原则”，将民权还给人民的宣言书。

无疑，《人权宣言》的真正蓝本是拉法叶特起草的《欧洲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人权宣言》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人权宣言》所公布的许多原则，直到200年后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并永远平等的”，这句话在今天看来是习以为常的话。但在欧洲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法国，这无异于春天的第一声响雷，它一方面向封建势力宣布，法国人民与法

国贵族生来是平等的，法国人民必须取消封建特权；另一方面，这些平等原则激励着法国人民把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

《人权宣言》宣布了法律必须是人民共同意愿的表现，确定了人民主权原则；还确认公民平等，确定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从而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三个原则仍为资产阶级奉为金科玉律。在当时，鼓舞了欧洲的进步人士，推动了欧洲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

拉法叶特也曾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奋斗过。

国王路易十六表面上对革命做出让步，接受三色旗，承认革命；而背地里却秘密调集军队，准备镇压革命。国王以“预防群众暴动”为借口，将大批骑兵、步兵调到凡尔赛。

国王的行动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种倒行逆施令拉法叶特大失所望。他一再向国王发出警告，要国王把军队撤走；他拒绝了国王高官厚禄的许诺，表示：

“如果国王怕暴动，可以到巴黎来，有国民自卫军保卫他的安全。”

但是，路易十六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明显。10月1日，路易十六及王后在凡尔赛宫大摆筵席招待反动军官，他们借着酒兴，故意把象征革命的三色帽徽抛在地上践踏。

消息传入巴黎，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5日早晨，巴黎6000多名妇女敲响战鼓向凡尔赛进军，要求国王批准8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拉法叶特认为目前不宜采取这种行动，于是，他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凡尔赛。有人质问他：

“你要干什么？”

他回答说：

“我要保护国王！”

此时，拉法叶特对国王仍存在着幻想。他命令国民自卫军守卫在王宫四周，自己只身觐见国王。当他跨入大厅时，有人说他是克伦威尔，他很有礼貌地说道：

“先生，我要是克伦威尔，就不会一个人进来了。”

确实，如果拉法叶特要是克伦威尔的话，那他早就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了。在拉法叶特看来，国王可以作为法国这个国家的象征，国王个人的权力在宪法范围内行使，不会形成专制。

拉法叶特见了路易十六，表示要以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身分前来保卫王室，维护秩序；同时，他也敦促国王满足人民的要求。

路易十六对拉法叶特又恨又怕，却无可奈何，只得接受人民的要求，宣布批准《人权宣言》和8月法令。

但是，群众们觉得国王在凡尔赛肯定还要做叛变革命的勾当，所以竭力要求国王回巴黎。拉法叶特尽力缓和群众的不满情绪，同时又去见国王和王后。他陪同国王、王后及太子来到大理石宫殿的阳台上与群众见面。群众齐声高呼：

“国王到巴黎去！国王到巴黎去！”

路易十六只得同意将王室迁往巴黎。

第二天，国王一家在拉法叶特的国民自卫军护送下乘马车回到巴黎。

王室从凡尔赛迁回巴黎，意味着国王从此只能在人民的眼皮底下活动，不得不接受人民的监视。

10月5日事件使拉法叶特的声望大增。从此，国王受制于他，由他左右局势。

1790年7月14日这天拉法叶特的声望和地位达到了顶峰。巴黎群众为纪念攻克巴士底

狱1周年，举行了40万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全国结盟节大会。

拉法叶特迈着骄健的步伐，第一个踏上了设在马斯校场中央的祖国祭坛，以他自己的名义，以国民自卫军和结盟军的名义，宣誓效忠“国民、法律和国王”。

顿时，礼炮声、欢呼声和音乐声响成一片。这位青年高级军官面对广大群众，频频地向大家招手示意。

当拉法叶特走下祭坛时，人们欢呼着拥上去，吻他，甚至吻他的衣服、长统靴、马鞍和马，有人甚至高声赞誉：

“你们看拉法叶特先生，他正驰向新纪元呢！”

此时，拉法叶特已是法国革命早期成果的象征。人民群众爱戴他，拥护他，实际上也就是庆祝自己取得的胜利。在人们群众心目中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国王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拉法叶特已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人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愿望，政府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整个法国将充满着自由、民主、谐和的

新鲜空气。

“把拉法叶特吊死在路灯杆子上”

然而，拉法叶特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在法国已无法继续下去了。

7月14日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完全被大资产阶级控制起来了，这些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巴黎的银行家、包买商、包税人、大厂主以及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拉法叶特想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国家的幻想很快破灭了。结盟节上，“国王与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热烈场面不过是暂时现象，路易十六的誓言只是为了欺骗人民，他决不甘心当一个立宪君主。当宪法快要完成，新制度即将在法国生根，将对国王进行限制时，路易十六便彻底背弃了自己的誓言。

路易十六利用否决权，不批准宪法，并以金钱收买制宪议会的议员。顿时，国内外的形势对革命十分不利。国内，在南方各省的反革命暴动不断发生；国际形势对法国也很不利，欧洲各国都仇视法国革命。英国首相庇特组织了一个国

际集团对付法国的革命；沙俄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对法国革命恨之入骨；普鲁士、奥地利对于法国革命采取积极干涉政策，它们不仅支持法国亡命者建立反革命据点，还积极地准备组织军队干涉法国革命。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之际，路易十六最初想收买议会议员，以压制革命。这一阴谋失败后，他便下决心企图逃往国外。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化装逃出巴黎，公开投靠反动势力，临行前还留下了谴责议会的宣言。这个反革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路易十六在边境被认出并被押回巴黎时，人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高潮。人们的呼声只有一个，那就是：

废除君主立宪，建立共和国！

7月17日，巴黎人民在马斯校场集会，要求推翻王权，建立共和国。但是，君主立宪派控制下的制宪会议则力图维护大资产阶级已经获得的利益，阻止一场新的革命。他们以为，如果保留国王，迫使国王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对他们更有利。

此时的拉法叶特竟然接受了议会的命令，

率领国民自卫军来到马斯校场，驱散在那里集会、签名的群众。在群众毫不退让的情况下，他竟下令开枪，当场约有5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愤怒的群众对拉法叶特的这一举动异常惊讶，他们醒悟过来之后，立即高呼：“把拉法叶特吊死在路灯杆子上！”

这一震惊法国的“马斯校场屠杀”暴露出拉法叶特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与人民民主要求之间的裂痕。

本来，法国人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封建气氛十分浓厚的法国，如果保留了国王，确实可以缓解革命与传统的矛盾；限制国王的活动可以使人民有申诉自己主张的余地。

但是，国王的举动已经明显超越了一个立宪君主的范围，出现了向封建君主专制倒流的趋向。这不仅与人民的意志相背离，而且与拉法叶特主张的君主立宪也大相径庭。曾经为自由民主而奋战于北美大陆的拉法叶特，完全应该，而且也有能力抵住这股逆流。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当一个人钻入思想的死胡同时，他根本不愿意去听别人的正确指引，

而继续向深渊迈进。当形势发展到只有推翻国王，才能保卫革命的时候，拉法叶特仍然抱住宪法和国王不放，这就使他处于人民的对立面。马斯校场事件后，他的威望迅速跌落，他再也不是受人民拥戴的革命领袖了。

不久，拉法叶特辞去了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

回家隐居两个月后，他又被召回巴黎，受任为某边境军团司令。之后，他又以中路军指挥的身分进入尼德利抵抗欧洲反动联盟。但此时的拉法叶特已失去了昔日的骁勇，他领导的中路军被欧洲联盟打败而撤退。

由于法国对欧洲反动联盟作战的失利，在议会中日益强大的吉伦特派提出，一切必须以国家存亡为重，而不必拘泥于宪法的条文。路易十六恼羞成怒，竟下令免去3名吉伦特派部长的职务。

国王的这一行动遭到广大革命人民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反对，而拉法叶特却依然站在立宪派的立场上，坚持维护“法制和王权”。

拉法叶特甚至召集他的国民自卫军旧部，准备采取武力行动来查封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

团体，可是，应召前来的还不足 30 人。

拉法叶特主张君主立宪在此时正是反动的行径，而他的这一主张竟然被国王冷落。宫廷只希望复辟封建制度，根本不希望立宪派取得胜利，重新掌权，因此对拉法叶特的行动不予支持。王后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很清楚，拉法叶特先生想拯救我们，但谁能把我们从拉法叶特先生那里拯救出来呢？”

拉法叶特成为众矢之的，腹背受敌。这表明，君主立宪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法国继续下去了。

1792 年 6 月，马赛义勇军 500 多人，以无比的革命热情，高唱着《马赛曲》开到了巴黎。他们把马赛市民提出的要求推翻君主制的请愿书递交给立法议会，然后开赴前线。

当法国革命处于非常危急之际，立法会议中占统治地位的斐扬派议员，仍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的革命。但是，人民群众在革命民主派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再也不相信立法议会了。

1792 年 8 月 8 日，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领导下，巴黎 48 个区的

委员联合宣布成立革命的巴黎公社，领导革命运动。

革命的巴黎公社，一方面递请愿书要求废黜国王；一方面组织了秘密指挥部，准备武装暴动。他们认为不废除国王，就不能战胜敌人和挽救革命。但立法议会无动于衷，仍然顽固地庇护国王。

1792年8月10日，在革命公社领导下，人民武装向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前进。经过一番苦战，王宫终于被人民武装占领，国王逃离立法议会。立法议会被迫停止了国王的职权，但仍想给他拨出一个王宫居住。

但是，人民群众对于国王已经深恶痛绝，终于把他逮捕起来，并把他和王后送入监狱。立法议会不得不同意人民的要求，宣布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公会，撤换旧内阁。当时议会任命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新内阁主要成员还是由吉伦特派分子组成的，民主派只有丹东担任司法部长。

拉法叶特此时还是站在革命人民的对立面，他建立了一个反动的政治中心。他认为，只要他率先起来反抗，那么人民将重新团结在国

王和宪法的周围。然而，事与愿违。当他把部队集合起来，要他们宣誓拥护宪法时，竟有整整两个营拒绝宣誓。他下令逮捕拒绝宣誓的人，但很多人不服从他的抓人的命令。他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

不久，巴黎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命令逮捕拉法叶特，理由是：

“担任北方军队司令的拉法叶特犯有鄙视法律罪、阴谋策划反对自由罪、叛国罪。”

拉法叶特个人曾是奋战于北美大陆的民主斗士，是追求自由的急先锋。但他回到法国之后不久就落后了时代步伐半拍，而又超前了传统封建势力半拍，既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也没有见容于国王，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其实，此时，身在法国的拉法叶特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一个象征，一个介于传统与革命之间的座标，在他的背后，有许多人象他一样，仍然固守君主立宪政体。或许，这也是此后法国革命多次出现回旋，逗留于君主立宪政体、徘徊不前的征兆。

但是，当时巴黎人民的8月10日事件，仍然代表了时代的主旋律，在法国历史上，君主制

终于被推翻，极端腐朽的国王第一次被人民拉下了宝座。

从此以后，革命的巴黎公社将起着监督政府的作用，并成为推动法国革命前进的决定力量。

第三章 布里索的革命——共和国与危机

在分裂中产生，在斗争中壮大

1789年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权，同时也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分裂。在革命的初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君主专制政权，实行宪法，所以能够在“不自由，勿宁死”、“忠于宪法”等极富鼓动性的口号下结合起来，为革命目标的实现而并肩作战。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他们之间凝聚力的因素也随之减弱和消失，加之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分本来就很复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大

资产阶级所实施的反民主政策的愤恨，矛盾不断地明显和扩大。

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开幕，雅各宾俱乐部从此结束了统一的历史，吉伦特派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别之一，开始登上法国历史舞台。

这部分中有一些新人物开始脱颖而出，直到1792年6月，他们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巴黎选出的议员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最著名的议员维尼奥。

人们当时称他们是布里索派，后来之所以被拉马丁改称为吉伦特派，是因为其中大部分领袖人物如维尼奥、玛格利德·埃利·费德、伊斯那尔等都是从吉伦特郡选出来的。

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原是律师或报刊作家，家境贫寒，但曾受过很好的教育。随着他们进入政界，他们不仅更加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而且对沙龙社交生活的雅兴也日渐增加，其中以孔多塞夫人和罗兰夫人的沙龙最为著名，它们甚至起到了顾问的作用。另一方面，吉伦特派与造船主、批发商和银行家等商业资产者过从甚密，而商业资产者所希望的是镇压反革命和

恢复指券的比价，即使挑起一场战争也在所不惜。

从其成员的社会出身和哲学信仰来看，吉伦特派似乎能接受政治民主，但他们的爱好和联系又决定了他们要求尊重财产和承认才能。布里索和维尼奥都不是无能之辈，但他们的性格比较软弱。

布里索最初以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是在“黑党之友”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帮助下才一举成名。他曾先后为奥尔良公爵和克拉维埃等投机商以及拉法叶特效力。有人认为他不够清白正直，但他临死时仍两袖清风。他曾游历英国、瑞士和美国，自以为对宫廷和平民均有了解，并以吉伦特派的外交家自居。言谈诙谐和平易近人使人们觉得他和蔼可亲；交谊宽广和精力过人使他成为吉伦特派中的“忙人”。可惜他容易冲动。虽然吉伦特派的政治浪漫主义同其大多数成员的年轻和阅历不深是完全合拍的，但吉伦特派之所以给人处事轻率和糊涂的印象，原因主要在他那里。

维尼奥的缺点更多地表现为软弱和犹豫。他诞生在利摩日的一个商人家庭里，经过长期

的摸索与徘徊之后，决定在波尔多开设律师事务所，并与葛瓦代、日索内、格朗日纳夫相结交。大革命发生后，他又与杜科、博瓦野—冯弗雷特等商人抱成集团，并成为该集团最好的演说家。他的演说往往采用充满激情的叠句形式，因而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他多次作为国民的代表慷慨陈词，申述吉伦特派的政策，要求革命做出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决定。但是，讲究风雅的文人习性却使他在紧要关头行动迟缓。

他们在万多姆广场都登夫人（一位已故包税人的遗孀）家的豪华沙龙里和餐桌旁会商吉伦特派的大政方针，他们非但不能明辨，而且往往被自己的巧言令色所迷惑，因而忘记做出应有的判断。

1791年的冬天，战争问题已经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了。法国各政治集团对于战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主战。布里索在11月31日说：

“进行一场新十字军东征的时机已经来到，这将是为世界争得自由的一场十字军东征。”

吉伦特派认为战争可以激起普遍的爱国

心，转移群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博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此外，吉伦特派还想把战争作为掠夺新市场以满足资产阶级发财欲望的手段。

军人们也主战，他们想借战争取得左右局势的力量。

国王与宫廷更公开地主战，他们希望法军在对外战争中失败，从而趁外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在法国恢复封建专制统治。

只有雅各宾派不主张立即对普、奥开战。他们认为要开战，首先必须肃清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必须把军队中的贵族将领清除出去，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罗伯斯庇尔对吉伦特派等主战派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演说，他说：

“谁需要战争呢？亡命者、宫廷阴谋家们需要战争。你们委托谁来进行这场战争呢？委托给行政权的代表们吗？那你们就是把国家的安全委托给那些存心毁灭它的人们了！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必须严防战争。”

革命民主派，尤其是罗伯斯庇尔等人，虽然不断地揭露主战派的阴谋，可是欧洲各国公开

反法的军事行动，已经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人民群众都倾向了吉伦特派，并团结在它的周围。

然而，正当全国各地的志愿军与外国干涉军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要求国王退位时，吉伦特派的主张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1792年7月以后，吉伦特派不仅公开反对罢黜国王，而且处处打击和迫害雅各宾派分子。他们对路易十六妥协，并秘密进行协商，企图让国王重掌政权。这充分地暴露了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的本质：它只是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来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并不是诚心诚意地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因此，正当革命人民力图贯彻吉伦特派的政策时，吉伦特派却与革命人民一刀两断了。

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注

1792年8月10日革命，结束了3年来的君主立宪政体，法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反革命的头子路易十六被监禁起来，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斐扬派被排

挤出政治舞台。从国民公会宣布工作时起，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由于掌握了军事力量，在前方又得到胜利，并取得了沼泽派的支持，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领导权。

1792年9月20日，国民公会开始工作。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了165个议席，其中主要的首脑是布里索、维尼奥、孔德塞等。在这一时期，由于斐扬派没有当选，吉伦特派成了议会中的右派。这一派对革命的态度是认为专制政体业已推翻，国民公会业已成立，因此革命任务就算结束。

总之，他们企图终止革命，不想把革命搞得更彻底些，只是想巩固资产阶级的秩序，保障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

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中占100个议席，代表中、小资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与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利益矛盾和政见的差异。国民公会开幕之后，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吉伦特派企图把革命就此停止下来，不想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不想肃清封建的残余势

力，也不想严格地限制工商业的活动；而只想建立一个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并企图与封建势力妥协。所以吉伦特派掌握了政权之后，并不马上解决革命的主要问题——战争问题、粮食问题等，反而宣布：

“凡是认为旧制度的残余势力还未肃清的人，凡是认为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并肃清农村中封建制度的人，都是破坏秩序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布里索在1792年10月曾写到的“第三个革命”实际上意味着要打倒雅各宾派。因为雅各宾派认为8月10日起义的成果，只有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从革命政权方面获得实际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够巩固，因此要求重分土地，把它分给广大的农民群众。但是，吉伦特派最怕重分地产，所以吉伦特派为了按照自己的目的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政权，它就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打击并企图消灭雅各宾派。

由此可见，国民公会成立之初，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一斗争反映了大

工商业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同时，这一斗争也就成了国民公会时期的历史的基本内容。

首先，吉伦特派把雅各宾派的丹敦从执行委员会中排挤出去，使执行委员会变成清一色的吉伦特派。这样一来，吉伦特派既控制了国民公会，又把持了内阁，所以更加飞扬跋扈起来。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不断地打击马拉。马拉每次在会议上提出应采取新的革命政策时，都遭到了吉伦特派的吼叫扰乱与侮辱；他们不让他讲话，甚至要求国民公会逮捕马拉，并要求国民公会建议选举人会议改选那些已经“丧失国民信任”的代表们，企图借改选的方式把雅各宾派议员撵出去。

当时吉伦特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工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各郡中，尤其是吉伦特郡；而雅各宾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革命的巴黎。因此，吉伦特派想凭借外郡的力量来压制巴黎。吉伦特派议员在写给自己选举人的信中污蔑巴黎的革命群众，企图以混淆是非的卑鄙手段来造成外郡对巴黎的仇恨。

吉伦特派为了保护国民公会并消除雅各宾

派的威胁，从吉伦特郡以及拥护它的其它各郡调来了郡警卫军。步什杜伦郡的警卫军于10月19日到达巴黎，11月3日，他们在巴黎的街上游行示威，并唱着：“要取马拉、罗伯斯庇尔及丹敦的头。”

吉伦特派以为有了武装力量，再也不怕雅各宾派及巴黎群众了，他们有恃无恐地取消了8月10日以后所创立的刑事法庭，并宣布改选公社。

对路易十六的态度是两派斗争的焦点。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迫切地要求迅速地组织法庭审判国王，可是吉伦特派一直存心拖延组织法庭的工作，用各种借口阻止对国王的审判，他们说：

“一旦把国王交付审判，怎么再能救他？国王出庭受审，他就必死无疑。”

他们对审判国王的恐惧溢于言表。

事实上，国民公会只有宣布国王有罪这一条路可走，除非它对8月10日的起义、它自身的存在、共和国的成立统统加以谴责和否定。但如果这样做了，就是革命成果的葬送。

罗伯斯庇尔于12月2日以不容置辩的逻

辑向国民公会指出：

“假如国王无罪，那么，推翻国王的人便是有罪……制宪会议就会禁止你们做已经做过的一切……你们就应该向路易十六跪下，恳求他的饶恕。”

在认定国王有罪后，国民公会很难不判国王死刑，因为他召请外国人入侵法国，而这是对法兰西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

为了救国王一命，必须不提审判的问题，这正是吉伦特派的愿望。这样，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注。

国民公会直到11月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拖到11月20日，从杜伊勒里宫的一个秘密的壁橱中发现了装有国王叛国的真赃实据。这是由于疏忽，罗兰没有先独自检查文件的内容，从而铸下了大错，使审判国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12月11日，路易十六出庭受审：他或者矢口否认，或者以宪法做掩护。他获准聘请了特隆歇和马勒谢尔伯为咨询律师。26日，德歇兹律师提交了辩护词：他也否认国王犯有叛国罪，但他主要指出国民公会无权审判国王，并强调国

王人身不受侵犯。

作为制宪议会，国民公会理应拥有全部权力，然而吉伦特派采取了阻挠的手段。他们要求将波旁家族一概放逐，其借口是：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人打算让已当选巴黎议员的奥尔良公爵代替路易十六。

这样，雅各宾派被迫为奥尔良公爵辩护，说吉伦特派就能指责山岳派是王党。

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吉伦特派又说，裁君将导致全欧性的反法同盟，使共和国再次处境危急。吉伦特派在如何处置国王这一问题上已走到穷途末路了。

投票在1793年1月14日开始，每一名议员都登台陈述理由。认定国王有罪，获一致通过，诉诸人民的建议被否决。决定国王生死命运的投票从16日开始，延续了24小时之久。在出席的721名议员中，有387人主张判处死刑，334人反对，但是26名主张判处死刑的议员曾经建议考虑缓期执行，其中梅勒最早想出这个巧妙的主意。如果他们以此为条件，真正主张判处死刑的票数只多半票，因此必须让他们明确表态，经过协商，决定就缓刑问题举行了投票，

议案以 380 票对 310 票被否决。这是梅勒的主意引出的一个小插曲。

1 月 21 日上午，公社在通向断头台的路口布置了国民卫队。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引颈受刑。

随着路易十六的头颅滚落，忠君思想受到了空前的涤荡：既然一个国王已象一个普通人那样被处决，君权也就永远丧失了“神授”的性质；同时，投赞成票和投反对票的两派议员间结下了不可解开的仇恨。吉伦特派在人们思想的巨大震动中，在与雅各宾派的别派争斗中维持着统治。

在内外交困中挣扎

自 1792 年秋季以来，吉伦特派在战争和最高限价两个问题中越来越表现得蹩脚，遭到雅各宾派和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

1792 年秋天，当法兰西共和国向比利时胜利进军的时候，国民公会虽然对占领地区采取了革命的政策，但是吉伦特派却把战争视做法国资产阶级征服其它国家和消灭巴黎革命势力

的手段，吉伦特派的将领更肆意劫掠占领区的居民。罗兰曾露骨地说：

“必须从巴黎打发数千人到边境上去。我们发给他们步枪，派遣他们到他们的脚可以走到的地方；不然，他们一定会回来割断我们的咽喉。”

吉伦特派的战争政策，使军心逐渐涣散，使士兵不相信自己的长官，也不热心作战。法军的战斗力于是便削弱下来。

自路易十六的人头落地，除了正在进行对法作战的普、奥外，英国、荷兰、萨丁王国、西班牙也都前后参加了反法联盟。

1793年2月，封建联军对法国展开了积极的进攻，吉伦特派的军事政策和消极的、错误的军事思想造成法军节节退却，前线情况日益险恶。

反革命派则乘机大肆活动。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爆发了保王党的叛乱。所有这些，并没有促使吉伦特派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对于法军的失败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暴动表现了冷淡的态度。实际上，他们畏惧巴黎的革命势力比畏惧反革命势力还厉害，他们甚至打算借暴动

来削弱日益增长的革命势力。

从1792年冬到1793年春，前线失利和国内反革命派的猖狂活动使社会经济情况急剧恶化，可是国民公会对这种严重的经济现象熟视无睹，没有提出与饥饿作斗争的任何办法。而在这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挽救革命，挽救祖国，提出了许多解决时局的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认为国家应限制贸易自由和粮食投机，认为应实行物价管制；同时，农村的劳苦大众迫切要求制定新的土地法，要求把农村公社中所有的土地分给贫农，使他们都能得到一小块土地。特别是最后一项，是衡量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准。

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一向把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视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坚决反对规定最高限价和制定土地法。

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遭到城乡劳动人民的愤恨和反对。

1793年春，革命的法国已经处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前方的失利、旺代的叛乱和粮食的缺乏都在威胁着革命。可是吉伦特派的国民公

会不仅不为革命着想，反而采取了许多反人民的措施。

雅各宾派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与代表贫苦市民的忿激派结合，这就加强了反对吉伦特派的力量。

雅各宾派力量的加强，更引起了吉伦特派的恐慌，使它更加趋于反动。

1793年3月底，倾向吉伦特派的将军杜穆里埃秘密与奥军统帅部谈判，企图与奥军联合进攻巴黎，推翻共和政体，恢复君主制。杜穆里埃的阴谋叛变没有成功，相反却使吉伦特派的威信一落千丈，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斗争的力量因而大为增强。

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愈来愈高涨，他们要求严厉地制止投机活动，解决土地问题，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要求是吉伦特派所不能接受的。3月间，忿激派曾要求把国民公会中22个吉伦特派首要分子赶出国民公会，5月间这一要求已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要求。至此，吉伦特派完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一时期，雅各宾派开始领导人民进行反吉伦特派的斗争。

5月31日，马拉在市政厅的钟楼上敲响了警钟。巴黎的革命群众和无套裤汉挤满了国民公会的会场，支持罗伯斯庇尔提出的逮捕12人委员会的委员和把20个吉伦特派分子送交法庭审判的要求。

国民公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只同意前者，但仍庇护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的首要分子。

6月2日，里昂吉伦特派与反革命派联合起来杀戮雅各宾派革命分子800多人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激怒了巴黎人民群众。10万多巴黎人立刻武装起来，包围了国民公会，强迫国民公会驱逐22名吉伦特派首要分子。国民公会至此才被迫屈服，开除了31名吉伦特派议员，并加以监禁。

从此，吉伦特派被赶出国民公会，从法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法国革命进入雅各宾派专政时期。

从1792年8月至1793年6月，吉伦特派在法国执掌政权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它的一举一动都是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维护它所代表的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吉伦特派作为法国大革命中过渡政权的掌握者，它上承君主立

宪政体时期，为过渡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吉伦特派所代表的利益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截然相反的，这就决定了其政权垮台的必然性，为雅各宾派登上法国政治舞台埋下伏笔。

第四章 罗伯斯庇尔的革命—— 血腥与辉煌

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1792年9月，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代表封建制度的国王仍留在国内，威胁着共和国。对于国王的处置问题，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当时吉伦特派掌握着政权，不希望革命继续深入，百般包庇国王。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从巩固共和国的角度出发，主张判处国王死刑。

吉伦特派为营救国王的性命，提出了两个

办法：即由国民公会审判国王或由基层议会讨论决定。罗伯斯庇尔对此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在共和国内，一个废黜的国王只有两种用处：要么扰乱国家安宁和动摇自由，要么加强安宁和自由。”

接着，他指出路易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前者，因此，他认为：

“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健全的政策该拿出什么样的办法呢？这就是要把对王权的鄙视深深地铭刻在人的心里，并使国王的所有拥护者惊慌失措。”

罗伯斯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路易才是真正的叛乱者，他勾结外国来镇压人民出卖祖国，已经被定罪，无须审判。否则，共和国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他斩钉截铁地指出：

“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在演说中，他还指出，主张审判国王的人怀有两个目的：第一，如果再审讯的话，国王就可能受到宽恕，可能定为无罪；第二，如果再复审，处死国王就会拖延下来，拖到第二年春天各国

专制政府对法国发动总攻时，国王就可乘机逃脱巴黎。所以，罗伯斯庇尔坚决反对审讯国王，反对拖延。他认为每一分钟的拖延，都会带来新的危险。

至于基层议会审判决定国王命运，那只能导致各基层议会发生分裂，导致拥护国王者和反对国王者之间自相残杀的内战。内忧外患必将断送革命。他揭露说，这种做法看起来好象是诉诸人民，实际上，真正的人民并不能出席这些基层议会。所谓诉诸人民只不过是诉诸反对平等原则的人。

罗伯斯庇尔以前曾在制宪议会大声疾呼要求废除死刑，但现在却主张处死国王。他对此解释说，这并不意味改变观点：

“按照自然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只有在死刑对人们或社会的安全是必要的时候，它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安全从来不要求对普通罪犯判处死刑，因为社会永远能够用其它办法来预防这种犯罪，并能使犯人不致危害社会。但是当国王被革命推翻而革命还远远没有用正义的法律巩固起来的时候，当仅是国王的名字就能给起义的国民招来战争的时候，国王的存在就

威胁着公共福利，监狱和放逐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所以，对国王只有处死这唯一的办法。他还说，他也可能对处死国王产生怜悯之情，但是，“为了犯罪行为而牺牲无辜的多情，是残酷的多情；同暴政妥协的仁慈，是野蛮的仁慈。”

1793年1月6日，国民公众投票，以361对360的一票多数，通过决议，判处路易十六死刑。21日，在震耳欲聋的“祖国万岁”的欢呼声中，国王路易十六人头落地。

吉伦特派在执政期间，对外未能有力地抵抗敌人。其将领杜木里埃背叛，巴黎屏障尽失。国内王党分子乘机作乱，革命的法国又陷入危机的境地。

吉伦特派无力解决危机，反而把斗争矛头指向雅各宾派，威信尽失。

面对危机，雅各宾派全力推动采取救国措施。丹敦倡议道：

“我们应当从前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立法议会没有办的事，我们来办！让我们变得可怕些，以便使人民不再显得害怕。”

吉伦特派指责这是独裁。马拉反驳道：

“我们必须通过暴力来建立自由。为了粉碎国王的专制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实行自由的专制主义。”

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斗争更加激烈。雅各宾派决心拯救革命。

5月26日以前，罗伯斯庇尔一直希望在议会范围内和吉伦特派进行斗争，解决问题，并劝告人民要冷静从事。自26日起，他的态度变了。他说：

“在一切法律都遭到破坏，专制达到极点，善意与廉耻都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暴动。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

雅各宾俱乐部立即宣布处于起义状态。

5月31日，马拉首先在市政厅的钟楼上鸣起警钟，起义于是开始了，武装人民出现街头。巴黎各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带来48门大炮，包围了杜伊勒里宫和国民公会的会场。

革命群众冲入会场，提出解散“12人委员会”和逮捕最反动的吉伦特派议员的要求。国民公会只同意解散“12人委员会”，其它问题不予讨论。当时，起义者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只是想对国民公会施加一些压力，结果这次起义没

有成功。

比约·瓦雷恩当晚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

“祖国仍未得救，还需采取更重大的救国措施，必须毫不迟延地把乱党彻底打跨。”

6月2日（星期日），运动再起。起义委员会命令昂里奥率8万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以便在国民公会拒绝满足巴黎公民要求的情况下，把乱党首领们当场抓起来。”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逮捕吉伦特派领袖。

经过激烈争吵，议长率领议员们企图突围。昂里奥下令：

“炮手们，各就各位！”

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只好退回议会大厅，被迫就范。

吉伦特派就这样灭亡了。它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如何进行这场战争；它废除了国王，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它请求人民支持它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统治；它促成了经济危机恶化，但又拒不能满足人民全部要求。

吉伦特派已经适应不了革命发展的要求了，不得不让位于更革命的资产阶级派别——雅各宾派。

残垣断壁下站立着罗伯斯庇尔，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法兰西

吉伦特派被推翻以后，上台的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安详之感，他是在一片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他面对的是危机四伏的法兰西。

罗伯斯庇尔在冥思：法兰西的出路在哪里呢？

法兰西，此时正在走向悬崖的边缘，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法国的大革命的凶猛火焰吓倒了欧洲的国王们，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要压倒、扑灭可怕的火焰。

1793年夏，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联军从四面八方把法国包围了起来。

普鲁士军队在7月23日攻陷了美因兹，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占领了康狄和伐仑西恩两个重要战略要塞。

西班牙军队推进到了佩皮尼场和巴荣纳。

萨丁王国也毫不示弱，趁火打劫在阿尔卑斯山采取了进攻。

联盟的头子英国则更加卖力，包围了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占领了地中海的科西嘉岛，8月26日，又占领了法国南部的重要军港——土伦。

法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也毫不怠慢，展开了积极地反革命的叛乱活动。

在英国金钱和军火的支持下，法国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到了极点。

保王党人在各郡抓紧活动，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象马赛、里昂等重镇完全落入了保王党人的手中。保王党人以此为据点，逐步扩大其军事行动。

吉伦特派在遭到失败之后，转而和保王党人联合，也在到处发动叛乱，矛头直指雅各宾派。

当时，在法国的83个郡中，只有23个郡拥护国民公会，其它各郡不是被反革命分子所盘踞，就是深受反革命分子的影响，都反对国民议会。

而在内忧外患斗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马拉的被刺在法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件事也

深深地刺激了罗伯斯庇尔。

在法国大革命中，马拉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政治家，伟大的革命领袖。他热情地呼唤革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同保王党和吉伦特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吉伦特派失败之后，对马拉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开始密谋杀害马拉。

吉伦特派和保王党分子恶毒地攻击诽谤马拉，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嗜血者”，是无恶不作的刽子手，他如果上台执政，肯定会在全法国进行大屠杀。

这些对马拉的诽谤感召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真的认为马拉是一个“杀人恶魔”，而吉伦特派的狂热信徒夏洛特·科尔黛则决心“拯救10万人的生命”，到巴黎去刺杀马拉这个“大恶人”。

当时马拉患了严重的皮肤病，每天都要几个小时浸在浴缸里缓解难忍的刺痒。一天，正当马拉坐在浴缸里工作的时候，潜伏在巴黎的科尔黛认为时机到了，便要求晋见马拉，向马拉报告革命的情况。马拉没有防备阴谋，他请科尔黛进来。

马拉坐在浴缸里细心地用笔记录科尔黛汇报情况，对科尔黛毫无戒备。于是科尔黛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匕首，猛刺马拉的胸膛。突如其来的变化使马拉目瞪口呆，他在瞬间看到了她充满杀机的秀目，未等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匕首已刺进他的身体。他手里还握着笔，倚在浴缸里，头歪在浴缸上，浴缸被鲜血染红了。马拉心脏被刺，当场停止了呼吸。

马拉被刺的噩耗迅速传遍了巴黎，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悲痛。

7月16日，巴黎人民为马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巴黎各处都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到处都是马拉的半身塑像。

马拉的被刺对罗伯斯庇尔影响很大，罗伯斯庇尔看到了他的敌人的凶残本性。确实，罗伯斯庇尔本身也受到了威胁，有好几次他几乎被暗杀。

内忧、外患，加上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罗伯斯庇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革命措施来镇压反革命，来拯救法国的革命和人民。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决定不再宽容反革命分子，而代之

以坚决镇压。

轰轰烈烈的雅各宾派执政高潮来临了，罗伯斯庇尔也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光辉的顶点。

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这样描述了吉伦特派领袖们的悲惨命运：

“……萨尔、加代、巴巴卢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被发现后，死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自杀了，人们在一块农田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已经被狼咬了一半。拉博—圣艾蒂安被一个老友出卖；罗兰夫人也被处死，她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的英勇气概。她的丈夫听到她被处死的消息后，离开了避难处所，在大路上自杀。孔多塞在6月2日后不久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在逃脱刽子手而被人发觉后，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

罗伯斯庇尔在处死敌人方面表现出了毫不手软。

1793年9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嫌疑犯法令：“凡谁的行为、交往、言论和著述表示同情暴君和自由的敌人者，即属嫌疑犯。”“奸细，叛徒，投机家，制造伪币、拒绝宣誓的僧侣，都

是嫌疑犯。”而凡是一切嫌疑犯，毫无疑问都要加以逮捕，对重者一律处死。

1793年9月5日，巴黎成立了一支由长裤汉（城乡贫民）组成的特别革命军，其目的主要是镇压吉伦特派分子和保王党人，同时监督各项革命法令的执行情况和协助做好首都的粮食供应。

对于反对派来说，法国变成了一座监狱，所有的反革命嫌疑犯都被拘捕，加以管制。而对罪大恶极者，则一律处决。

路易十六的妻子马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被判死刑。

吉伦特派的22名成员被处决。

立宪派的巴伊被送上了断头台。

.....

到10月底，这些人全都上了断头台。

为了使革命的措施得以顺利实行，罗伯斯庇尔没有忘记建立革命的民主专政。

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通过了成立革命政府的决议，终于确定了国民公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

国民公会下属两个委员会——公安委员会

和社会保安委员会。公安委员会掌握着国家最高行政权，负责军事、外交、公安、经济和教育等一切工作。罗伯斯庇尔具体领导公安委员会的工作。社会保安委员会领导警察，专司惩办奸细、阴谋分子、强盗、投机家和伪造货币者的主要罪犯。

此外，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公安委员会还有权派遣特派员到各郡及军队视察和指导工作。

在地方的政权是公社，这是革命政府的主要支柱。每一个公社又设有革命委员会、侦察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等。这些严密的革命组织有力地镇压了反革命活动，一切反动分子难逃人民的罗网。

1793年，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在执掌政权后，清楚地意识到了当务之急就是稳定问题。

这时的法国，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国贼叛乱。“前门打狼，后门拒虎”，罗伯斯庇尔心中比谁都清楚。但他也认识到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人心，把投机分子的猖獗气焰打下去。要想“救民于水火之中”，当务之急则是稳定全国的

物价。

从9月初，雅各宾派领导巴黎工人、贫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举行示威，要求国民公会应根据人民的呼声，制定全面限价等稳固革命成果的措施。

9月29日，国民公会终于通过了《全面最高限价法》，规定了对市民必需的39种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料实行最高限价。这一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商人们的嚣张气焰，使物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基本稳定，有力地巩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罗伯斯庇尔在进行了上述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后，又大刀阔斧地触及了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和宪法问题。

1793年6月在大革命刚刚成功之际，罗伯斯庇尔就认识到了应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这是保证雅各宾派取得农民支持的重要保证。

6月3日，颁布土地法令，决定开始拍卖在战争之际亡命者的土地，把土地分成小块进行拍卖，准许在10年内分期付款。

6月10日，雅各宾派又颁布法令：凡是地

主近 200 年内从农村公社夺去的公有地，都要归还给农民。同时，可以按人民的要求将土地按人口分配，使每人得到相等的一份。并且规定这些分得的土地，在 10 年内不能因为农民负债而被没收。

7 月 17 日，颁布法令：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义务和带有任何封建性的权利，并烧毁一切封建文书。

所有这些法令的颁布实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有力地巩固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将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一大步。

革命的另一重要举动就是制定宪法了。

6 月 24 日，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经过紧张的计划协商，在当时最民主、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宪法《一七九三年宪法》终于出台了。这部宪法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中可窥见雅各宾派革命的性质：

取消积极和消极公民的区别。凡年满 21 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不受财产的限制，并且实行了直接选举制。

赋予人民以最大的政治自由，保证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给予人民以义务教育权、劳动权、生活权和反抗压迫权。

.....

这部宪法受到了法国人民的极大拥护和支持。

“全国四万四千个公社的代表前来迎接宪法。他们在国民公会前被接见了。他们表示同意宪法。”

我们应当用大炮来向敌人表达我们的宪法！我们每个人誓死消灭一切暴君

抵御外侮，消灭叛乱——罗伯斯庇尔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罗伯斯庇尔没有退缩，他领导下的雅各宾派谁也不会退缩。“这些勇敢的人没有因处境危急而惊慌失措。”

雅各宾派的代表丹敦说：

“国民公会……现在有了全国的力量，我要求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授权给初级议会的代表向全国征集武器、粮食、军需品，号召人民踊跃捐输，发动公民的力量，征集40万人的军队。我

们应当用大炮来向敌人表达我们的宪法！现在是我们作最后的庄严誓言的时刻：我们每个人誓死消灭一切暴君。”

丹敦的呼吁在全法国引起了巨大回响，全国 4.4 万个公社的代表和公民即刻宣誓，时刻准备打击任何外来之敌。

雅各宾派的另一领袖巴雷尔则做了更为有力的演说：

“……每个公民都应当为它流血。总之，法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应响应祖国的号召，保卫自由。一切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一切政治手段或经济手段，都要为自由服务；一切金属，一切元素，都应用来供应自由事业之所需。希望每个公民都在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行动和军事行动中，坚守自己的岗位。年轻人要去效命疆场，男子汉要去制造武器，运送军需弹药，筹备军粮；妇女要缝制军服、帐篷，到收容所去看护伤员；儿童要用旧布改制绷带；老人要重新担负起前人担负过的使命，到广场上去，鼓舞年轻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痛恨和对共和国的一致拥护。公共房屋要改为军营，公共场地要变做工厂，地窖里的土要用来制造炸药；所有乘骑供骑

兵使用，挽马用于拖运大炮；所有猪场、装饰陈设枪、刀剑、长矛要供对内使用。共和国好比一个被包围的大城市，整个法国应当是一个巨大的军营。”

雅各宾派另一首领塞巴斯蒂安·拉克鲁瓦也发表了极富鼓动性的讲演：

“……让所有车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个人的工作，都去造枪托、炮架、辘重车、运输车吧！让锁匠、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铁工都放下工作，都去制造大炮吧！……让祖国之友们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让没有武器的人送弹药，让妇女们送军粮、做面包，让祖国的赞歌送来战斗的信号吧！”

全法国人民形成一股抗战的洪流。“让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们同时入伍吧！哪里有危险，人们就应当冲向哪里！”

雅各宾派充分利用这一大好的时机，终于在1793年8月13日通过国民公会颁布了征兵共50万的命令：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所有法国人都始终处于被征召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年轻人得奔赴疆场；已婚男人得铸造武器

和运送给养；妇女们得制作帐篷、军服和去医院服务；儿童们得去把旧布撕成绷带；老人们得去公共场所鼓动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国王們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也正如巴雷尔倡导的那样，法国确实变成了一座军营和一个工场。凡是年满18岁到25岁的法国人都武装了起来，共和国一下子就拥有了14个军，兵额达到120万。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雅各宾派对军队还进行了改组工作：

把贵族军官和士兵不信任的将官都撤换，大胆提拔一些下层的有才能的低级军官或士兵。

统一军队组织，把过去的常备军和义勇军结合在一起，使其服从统一规章和统一指挥。

积极组织军火生产，使法国军事工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积极创造新的作战方法。纵队形与散兵队形相配合，灵活多变。

.....

从1793年年底到1794年春天，雅各宾派领导法国人民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卡尔瓦多斯的叛乱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压制住了。在韦尔农初度交锋，叛军立即溃散。

马赛重镇被迅速收复。

冈城、波尔多等重要城市相继收复。

土伦和里昂经过了猛烈进攻后，也最终被收复。

胜利的形势在1793年秋天即已明确。

攻克里昂标志着联邦派叛乱的结束。

叛军中最大的是旺代叛军，也在人民的进攻下连连败北。

到12月底，旺代叛军也被彻底消灭干净。为了防止他们死灰复燃，革命政府就采取扫荡歼灭的极端手段。旺代叛军仅有的16个设防阵地，被杜罗将军全部包围，名为“凶狠纵队”的12个别动队，踏遍全境各地，搜索森林，纵火焚烧，驱散所有聚集一处的人，并且实行劫掠破坏，在这个不幸的地区造成了恐怖。

外国侵略军队也在人民的攻击下纷纷溃逃。从9月底起，法军就开始节节胜利：奥军被迫退出法国北部的领土；盟军被赶出阿尔萨斯。法军12月中旬收复土伦；在南部遏制住西班牙军队的进攻。

就是革命法国的敌人，这时也不得不承认法国的新军具有高度的战斗素质。

这样，到 1793 年底，入侵敌军已在全线撤退。

强盗们得势，共和国完蛋了。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正当革命在法国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雅各宾派却遭到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罗伯斯庇尔能够控制局势吗？

1794 年 2 月，他将忿激派首领雅克·鲁送上了断头的绝路。

1794 年 3 月 24 日，艾贝尔派被从雅各宾派中铲除掉。

1794 年 4 月，人民的“偶像”丹东在罗伯斯庇尔的命令下身首异处。

.....

“脑袋如板岩似的纷纷落地。”从大恐怖法令到热月 9 日的一个多月中，仅巴黎就总共有 1376 人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为了革命而恐怖，这一招是否

合理奏效呢？

忿激派是城乡下层群众利益的代表者。他们的主张是：人民不但要有政治上的自由，还应该经济上的平等；严格而普遍地加强对投机商人的恐怖政策；要求财产平等。忿激派鼓动人民起来反对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这时岂容他人作威作福？他攻击忿激派是“庇特的奸细”。

并且，罗伯斯庇尔毫不手软，1793年秋，国民公会逮捕了雅克·鲁。

1794年2月，将雅克·鲁交给革命法庭审判。雅克·鲁不愿受审终于自杀。

消灭了忿激派后，雅各宾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左派以埃贝尔为首，又称过激派。

右派以丹东为首，又称温和派或宽容派。

中派就是罗伯斯庇尔。

可怜的罗伯斯庇尔面临两面夹击之势：一派指责他不够革命，另一派则又称他革命过头。罗伯斯庇尔曾形容这两派“就象森林中的强盗，互相配合默契”。

埃贝尔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因犀利的言谈

在下层群众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埃贝尔远远走在了雅各宾派的前头。

埃贝尔的主张是偏激的。

宗教上他狂热地拥护和鼓吹非基督教运动。

战争上他认为应将革命进行到底，超越一切国界，组织万国联盟。

政治上他极力主张推行极端的恐怖主义。

经济上他主张严厉取缔囤积居奇者，打击投机商人，强化统制经济，实行最高限价政策。

.....

埃贝尔的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一切罪恶都是囤积居奇者造成的，唯一的治理办法就是断头机。

埃贝尔等人对罗伯斯庇尔的做法大为不满，他们因为罗伯斯庇尔采取中间立场，而对罗伯斯庇尔大肆攻击。“摩莫罗和埃贝尔公开进行粗鲁和伤人的影射讽喻。”他们说罗伯斯庇尔是“在革命中折断了腿”，“共和国中有人心力衰竭”。

1794年3月，埃贝尔派依靠科德利埃俱乐部，企图把巴黎公社发动起来，举行起义。但当

时的肖梅特不主张起义，他从大局出发，认为在国外敌人没有打倒以前，巴黎的任何波动，对于革命都是极其危险的。埃贝尔终于没有发动成起义。

当时罗伯斯庇尔正在病中，有人给他写信报告了埃贝尔的行动。“他们趁你生病之际大搞阴谋活动。我知道他们怕你康复后挫败他们卑鄙的阴谋和暴乱。请你原谅我对你的打忧。我们只有依靠你才能使自由事业和爱国主义获得胜利。”

罗伯斯庇尔听到这一惊人的消息大吃一惊。罗伯斯庇尔双手高举过头，象一头愤怒的雄狮吼道：

“革命是有它可怕的一面的！……总是要流血！……难道流的血还不够多吗？……难道要叫共和国自己吞灭自己不成？”

罗伯斯庇尔终于意识到“用法律之剑横砍”埃贝尔派的时机到来了。

3月24日，埃贝尔派被逮捕了。

罗伯斯庇尔说：

“如果埃贝尔胜利的话，就要推翻国民公会，屠杀所有的爱国者，法国社会重新陷入混

乱，暴力统治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同一天，公安委员会以“阴谋危害共和国”的罪名，把埃贝尔派送上了断头台。

丹敦派则又是和埃贝尔派截然不同的另一派。他们主张实行宽容政策。丹敦认为应改组两个委员会，立即缔结和平，废除恐怖政策，取消普遍限价法，敦促流亡者回国，释放嫌疑犯，宣布大赦。

1793 年秋天，丹敦派也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救国委员会。他们反对撤销贵族将军的职务，抱怨旺代省的战争太残酷，责备在王后案件和吉伦特派案件中逮捕的人太多……

在埃贝尔被处死后，丹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罗伯斯庇尔抛弃了左派，肯定会向右转。于是丹敦派开始加紧攻击罗伯斯庇尔和国民公会。

罗伯斯庇尔和丹敦是很友好的朋友。罗伯斯庇尔称自己是丹敦“热情友好、竭诚相待的朋友”。

在丹敦受到左派攻击时，罗伯斯庇尔经常为丹敦辩护。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两人之间的友情逐渐

破裂。

罗伯斯庇尔有一次这样说：“我也许把丹敦看错了，他和我之间的意见分歧促使我仔细观察，有时还非常愤懑，因为我不赞成他为人民效劳的方式。”

1794年风月30日，罗伯斯庇尔发布了一个锋芒毕露的演说：

“的确，一个企图分裂国家的乱党即将完蛋；但是另一个乱党却远未被打倒……如果国民公会摒弃成见，消除软弱，在战胜一个乱党之后再用它有力的臂膀击倒另一个乱党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国就会得救。”

第二天，罗伯斯庇尔更坚决地重复了他的意志：

“光消灭一个乱党是不够的；要打倒所有的乱党才对。要一鼓作气攻击那个残存的乱党。就象我们以前清算另一个那样。”

“是有那么一个乱党……它被揭露的时刻总会到来的，这时刻已经不远了。”

1794年3月31日，丹敦被逮捕。

罗伯斯庇尔做了一番讲演。“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

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敦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

当罗伯斯庇尔看到又有人对丹敦表示同情时，他暴跳如雷地抗议说：

“不！我们不要特权！我们不要偶像！我们今天会看到，在国民公会粉碎这个很久以来已经腐烂了的所谓偶像的时候，在这个偶像倒下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压碎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

1794年4月5日，丹敦终于被以“参加恢复君主制，企图颠覆共和国”的罪名处死。

4月间，残余分子如肖梅特、德穆兰的遗孀、埃贝尔的遗孀等全部被处决。

罗伯斯庇尔对左、右派的镇压，使他失去了依靠的基础，为以后的热月政变铺好了道路的基石。

“大革命冻结了。”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圣茹斯特不久以后这样写道。

罗伯斯庇尔赶跑了左派埃贝尔，处死了右派丹敦，现在的雅各宾派是纯洁的罗伯斯庇尔派了。

但是今非昔比，罗伯斯庇尔统治的重心这时已发生严重的倾斜了。

为了把全法国的一切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巩固革命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提出了一种新的宗教——对“最高主宰”的崇拜代替了“理性神”。崇拜的对象不再是天主，而是最高主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并将规定一些节日以提醒人们想到神灵和人的尊严。”

牧月 20 日被定为最高主宰节。

罗伯斯庇尔的这一举动在全国引起大的震动，人们完全被这种崭新的信仰所打动，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热，“贺信像雪片般地飞向国民公会”。

罗伯斯庇尔提出了大革命的新任务在于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罗伯斯庇尔通过救国委员会答应给工业企业及一切从事于沼泽排水与开矿的人们以奖赏和补助金，饬令粮食委员会大力奖励农业。

这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没有引起大资产阶级的多少好感，他们认为他们要求的更大的自由没有得到，他们对罗伯斯庇尔不是感

激涕零，而是极为不满。

罗伯斯庇尔也失去了下层人民群众。

他制定的劳动政策遭到了一切劳动人民的反对。农业方面，富农的地位得到加强，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却日益恶化，而为了限制雇农的劳动，罗伯斯庇尔用强制的手段压迫他们。城市政策上，罗伯斯庇尔依据《霞不列法》对工人进行强制劳动，而原先答应的一些革命待遇问题，巴黎人民却什么也没有见到。所有这一些，都使罗伯斯庇尔远远地离开了人民的支持。

罗伯斯庇尔显然意识到了人民的不满，他加强了统治机器，对人民进行强权统治。

对于大革命的敌人，“问题不在于惩罚几个典型以儆效尤，而在于消灭暴政的一切死心塌地的仆从”，“问题不在于惩罚他们，而在于消灭他们”。

1794年6月10日，罗伯斯庇尔援意颁布了牧月法令。这一法令的第六条列举了各种类型的大革命之敌，即：

“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

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

同时，对大革命之敌的审判手续大大简化。被告的辩护权和预审均被取消，规定了在缺乏证明材料时，法庭可以根据“内心的确信”决定案件。法庭只能在开释和死刑之间做出选择。

自从牧月法令颁布以后，在全法国地地道道的“大恐怖”开始了。每天都有“人民公敌”被送上断头台。巴黎的各大监狱都挤满了嫌疑犯。同时，恐怖政策也开始逐渐扩大、变质。如6月16日这一天中，处死了54个人，而其中却有39个工人和10个雇员。

罗伯斯庇尔此时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了。这无疑更加使他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公会中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们厌倦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方式，他们开始密谋推翻罗伯斯庇尔。

一切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人达成了一种和解，相互勾结起来。丹敦派、吉伦特派、埃贝尔派等残余分子通过大肆活动，逐渐在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保安委员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6月份，罗伯斯庇尔意识到了他身边潜在的危险，他试图重振雄风，再一次击败他的敌人，但是他发觉他这时已是无能为力了。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讲话时被逮捕。雅各宾派的主要成员圣茹斯特、古东等也被捕。

罗伯斯庇尔知道大势已去，站在讲台上大声感慨道：

“强盗们得势，共和国完蛋了。”

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古东和他们的19名拥护者被送上了断头台。

“黄昏时分，那个曾经一度是罗伯斯庇尔的人面色惨白，挺立在落日的余晖中，他的头象野兽在受到猛击时那样，发出一声狂叫，向法国人民诀别了。”

第五章 富人的王国 ——热月党 人与巴尔夫： 通向独裁之 路

“金色青年”与白色恐怖

罗伯斯庇尔被推上断头台，刀光一闪，热血飞溅。一双双无情、冷漠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狂热的革命热情随着罗伯斯庇尔身躯的倒下而冷却下来。“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热月党人终于控制了国民公会。

1794年7月，热月党人替代了雅各宾派，执掌了政权。热月党人是由在大革命中发了国难财而致富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极为不满，掌权后，提出向恐怖主义者复仇，治服无套裤汉，阻止恢复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热月党人利用富人们的不满情绪，组建了“金色青年”团伙。这些团伙由一些叛变的恐怖主义者如弗雷隆、格利安和梅兰等人从资产阶级青年中招募而来，而且还加入了一些军人和逃兵。

青年团伙的成员以其垂在两颊的发辮和衣服上的方领为标志。他们手持木棍，集合时喊着“打倒雅各宾派！国民公会万岁！”的口号。这帮“花花公子”们在平等宫向雅各宾派发动进攻，从而掀起了武斗事件。

在热月党人的支持下，“金色青年”很快耀武扬威起来。

雅各宾派在各种反对势力的进攻下，成了“一只无力的杠杆”。1794年10月，国民公会下令禁止各俱乐部相互串联和集体请愿，从而使雅各宾派的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变节的人愈来

愈多，“金色青年”的进攻也更加猖狂。11月“金色青年”对雅各宾派发动了第一次讨伐，卡里耶案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卡里耶曾于前一年冬天向巴黎解送来132名南特人。这些人被革命法庭开释之后，卡里耶受到了追究。卡里耶为了躲避追捕，向雅各宾派救助。弗雷隆乘机号令他的“金色青年”团伙：

“让我们到兽穴去突袭猛兽！”

当晚，他带着他们扑到奥诺雷街，直捣雅各宾派总部。两派之间发生了武斗，后由军队恢复了秩序。国民公会却命令雅各宾派关闭其俱乐部。随后，选举俱乐部也被关闭，遭到同样的命运。

雅各宾俱乐部和选举俱乐部这两个人民抵抗运动的中心被消灭后，热月党人对巴黎各区的征服便容易多了。“金色青年”开始介入各区大会，其另一个头头——朱利昂，成了杜伊勒里宫区的领导人。

“金色青年”搞垮了雅各宾派之后，又掀起了反恐怖主义运动，而这种反恐怖主义却是实足的恐怖主义。花花公子们在街上追打他们的政敌，进行所谓的“公民散步”。他们洗劫被认

为是雅各宾派的咖啡馆，并发动剧院战，强迫雅各宾派演员当众认错，禁止唱《马赛曲》，要求唱的是反对恐怖主义者的《人民觉醒歌》，接着又展开了对马拉胸像的围剿。

国民公会议会厅中勒佩勒蒂埃、马拉等自由殉道者的胸像，以及达维德表现他们遇难情景的绘画，在聚集在旁听席上的“金色青年”的掌声中被搬走。马拉的遗骸，以及为祖国牺牲的小英雄巴拉和维阿拉的遗骸，也被迁出先贤祠。

杀人的呼声此起彼伏。

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让以前被撤职的公职人员回到原定居的市镇，以便接受政府的监督，这实际上让他们去送死。

国民公会在“金色青年”的进一步压力下，逮捕了议会中不听话的议员，议会从此成为“金色青年”团伙的俘虏。“金色青年”的队伍则由于加入了日益增多的不服从征招入伍者、战场逃兵和急切要求收回被查抄财产的归国流亡者而变得更加强大。

在外省，白色恐怖早已开始。1795年2月里昂发生了第一起屠杀被拘押的原恐怖主义者的事件，整个东南部发生了对个人的谋杀。接着

出现了一些帮会，如耶稣会、耶字会或太阳会，专门迫害恐怖主义者、雅各宾派。国民公会驻各地的特派员对此都持放任态度。屠杀事件越来越多，在里昂，每天都有雅各宾派遭到暗杀；在尼姆，一批囚犯被人杀害。革命群众的血流遍了法国。

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反动。旧富人与新富人，时髦女郎与浪荡公子重新出现在巴黎大街上。共和主义严肃刻苦的精神已被荒淫放荡所取代。风行一时的无套裤汉装束——长裤、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头发和小红帽，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年轻的有产者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跳舞之风大盛，到处都在举行公共舞会。有一种“牺牲舞会”，就是只有那些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的人才能参加。参加者梳着蒂图斯式的发型，把脖子后的头发剪短，象刽子手给即将上断头台的人剪的一样，颈部系着一圈红丝线。

沙龙里的社交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卡巴吕斯被她的崇拜者奉为“热月圣母”。她住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俨然成为“时髦女郎”们的楷模。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

衣裙风行一时。

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占据了社会的首要地位。由此，统治阶级和那些在指券、国有财产和军需供应品投机中发财致富的人相互溶合，开始形成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极为混杂的群体。他们用钱支配着一切，维持着一切。

时髦女郎和浪荡公子，这些为数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颜无耻的骄奢淫逸和怪诞风气与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热月党人对雅各宾派所实行的“最高限价法令”尤为不满，因为这项法令堵死了他们发财的道路，粉碎了他们金钱世界的美梦。掌权后，热月党人放开了物价，解除了经济统制。但废除最高限价的后果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令人目眩。粮食投机肆无忌惮，愈闹愈凶。当劳苦大众陷于绝望的时候，当旧制度时代食利者资产阶级和被偿付以指券的债权人纷纷破产时，债务人和投机商人却迅速发财致富。一群利用通货膨胀和倒卖国有财产，以至承包军需供应而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冒险家，为旧资产阶级增添了新鲜血液。

在食品匱乏和货币失信的双重作用下，巴黎的食物和燃料价格迅速上涨。“穷人唯一的生计”——面包定量一再被削减。人民的失望变成了愤怒，人民的被迫害变成了反抗。人民的起义是再所难免的，新的革命风暴又一次骤起。

“金色青年”掀起的白色恐怖和革命风暴的再起，使热月党人恐惧万分，感到有必要加强政权。所以，热月党人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一面追捕“金色青年”，一面镇压人民的起义。

1795年8月，热月党国民公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了《一七九五年宪法》，并按宪法组成了督政府。督政府由5人组成，掌握行政权。

这样，到10月份，国民公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闭幕，代之而起的是督政府。

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

继热月党人之后，督政府企图稳定社会秩序，但督政府与热月党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政府将贵族和民众都排斥在外，再加上它的自由实践毫无成效，这些都注定它是不可能稳定的。政

府的双重排斥政策在国内遭到双重的反对，这使督政府的稳定政策已经受到损害。稳定政策反映了大资产阶级要求迅速恢复和平，但贪婪的富人却要让战争继续下去。征战在加紧，动乱也在爆发，一切都显得是那样急躁、愤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行动是再所难免的。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便产生了。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年）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时就外出打工，历经磨难。他在困苦的环境中刻苦自学，阅读了大量的启蒙时代的书籍，细心地研究卢梭等人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满怀热情地参加了革命，要求建立共和国，主张土地国有，废除封建制度。

热月政变后，巴贝夫创办了《自由新闻》，猛烈地抨击热月党人的白色恐怖政策，但这一举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相反，1795年2月被捕入狱。

在狱中，巴贝夫回顾了法国人革命的历程，心潮澎湃，他没有对革命失去信心；但接二连三传来的悲惨的消息，使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正如

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

“在这残酷的年代，我被监禁在监狱里。留下的妻子和三个可怜的孩儿，生活极度贫困，毫无支援。在监狱里得知我亲爱的孩子，我最亲爱的人，和众多的其他人一样倍受折磨，身体日渐衰弱。不久又听到令人心碎的消息：由于连续减少二两面包，我7岁的女儿悲惨死去。果月看到另外两个孩子时，他们萎靡不堪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正是这悲惨的境况促使他“坚决反对可耻的粮食囤积者，反对策划使人民破产，使人民堕落、为人民锻造各种锁链的设计者。”

1795年冬天，巴贝夫被释放出狱。政府的无能以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极端贫困，使得巴贝夫萌发了用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想法。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平等会”，并发表了一个《平等派宣言》。《宣言》集中地表现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以平等为核心的。以平等为指导思想的平等派于1795年冬天开始密谋武装起义。

平等派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小批主张共产

主义的人，以及前雅各宾派。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方面的。

1796年3月，平等派成立了起义委员会。和巴贝夫一起进入委员会的还有安托奈尔、邦纳罗蒂、达尔泰、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和西万尔·马雷夏尔。巴黎12个区各有一名宣传员，在他们领导下，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当时的条件很有利，因为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平等派密谋的政治组织采取的办法和这之前的民众运动截然不同。其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它紧密依靠为数不多的经过考验的分子。其外围是同情者、爱国志士以及共和二年意义上的民主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赞同新的革命理想），然后则是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平等派密谋的组织非常完备，但是和广大群众的必要联系似乎没有确实的保证。

面对巴贝夫等人的宣传，督政府发生了分歧。巴拉斯模棱两可，在各派之间调和；勒贝尔不知是否要象对付王党一样，进行一场反对雅各宾派的镇压；卡诺已一无反顾地转向主张专制保守的反动方面。根据卡诺的建议，梅兰被解除警察总部部长之职，由科雄接替。

4月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一切企图“复辟王政或恢复1793年宪法……，或者以土地法的名义进行掠夺、瓜分有产业的人”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然而，巴贝夫并没有被吓倒，继续加紧准备武装起义。他同国民公会的议员委员会进行接触，并在5月和他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将进入根据起义委员会的建议新选出的议会。但是，忠于起义的警察部队被解散。更严重的是，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格里泽尔已向卡诺告发了平等派密谋。

警察总长带领着一帮人奔向平等派密谋地点。当时巴贝夫正在和邦纳罗蒂等人讨论起义之事。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巴贝夫等人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巴贝夫等人并没有反抗，喊叫道：

“全完了，专制制度占了上风！”邦纳罗蒂忙着把一块纸头藏起来，但过了一会又交给了警察。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警长把撒在满房间的纸头收拢起来，分成几沓装进文件夹里，然后连同囚犯一起押到警察局。

平等派组织密谋就这样结束了。密谋者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的姿态，他们迅速被捕，

未曾引起任何困难。巴黎居民尚未觉察，只是次日凌晨，通过布告和报纸，他们才得知多亏了政府的“英明远见”，得以避免了一场威胁生命财产的可怕危险。被捕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再次被恐惧慑住了。

督政府对巴贝夫等人进行了审判。巴贝夫在法庭上义正严辞地说道：“我认为给我戴上密谋领袖的头衔太抬举我了。我声明我甚至只是个次要角色。密谋是神圣的合法的，因为密谋的目的是反对罪恶滔天的政府、篡权者、民权的破坏者。一切自由的人都有责任策划反对这样的政府。”

巴贝夫继续说道：

“共和国的陪审员们，你们愿意加速反革命的到来吗？你们愿意给大屠杀以可怕的信号吗？此乃国家命运之所在。法兰西将成为一个波兰，国家四分五裂，形形色色的强盗各霸一方。难道不是放弃恩怨、消除差异、集共和国全部力量于共同中心，严肃考虑一切（无论是从有利方面还是考虑到对姓氏的威胁），至少是再一次拯救受人尊敬的姓氏的时候吗？”

巴贝夫的雄辩的声音，久久回荡在罪恶的

法庭里，法官、检察官、陪审员沉默不语。审判完毕，平等派密谋成员被装在囚笼里送到了旺多姆。他们的妻子，其中有巴贝夫的妻子和他的长子步行跟在车队后面。1797年2月最高法院判决巴贝夫和达文泰死刑，邦纳罗蒂等人流放。巴贝夫听到判决后，试图撞死，结果负伤，经过医生的治疗得以“康复”，次日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

第六章 走向权力顶峰的拿破仑 ——从伟大到荒谬

最强劲的生命气息吹进并活跃了泥土造成的人，大革命的呼唤，战神拿破仑出世

1795年葡月13日（10月5日）这一天，在法国的首都巴黎，硝烟弥漫，大炮轰鸣，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不知内情的人从敌对双方的帽徽很快发现：这是政府军在镇压叛军。头戴三色帽徽的政

府军在一位年纪仅二十几岁的年轻军官指挥下，用猛烈的炮击，以阻止戴着白色帽徽的叛军进攻。看来形势很危急，政府军不足6000人；而叛军却有24000人，他们已经控制了巴黎主要街道，此时正在兴高采烈地在凯旋音乐伴奏下举着旗帜，向政府所在地——杜伊勒里宫进军。

情况对人数很少的政府军已经万分危急，但是，那位年轻的军官却镇定自若，不断下达着开炮的命令，每一炮都在敌人的核心部位开花，叛军被打得血肉横飞，在留下200具尸体后不得不仓皇逃窜。

这时，又有一股5000人的叛军在河的对面，正企图过桥，向杜伊勒里宫冲来。年轻军官沉着应战，及时下令调转炮口，给叛军迎头痛击，叛军很快溃散了。于是，青年军官身先士卒率领政府军立刻包围叛军指挥部圣罗克教堂。叛军负隅顽抗，战斗更加激烈。青年军官亲自燃放大炮，并对他的士兵说：

“士兵们，既然打仗是为了取得胜利，那么就不要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不应该吝嗇炮弹！”

的确，政府军没有吝嗇炮弹，叛军被炸得人

仰马翻，圣罗克教堂一片瓦砾。第二天，叛军不得不打出白旗，举手投降，政府军取得了辉煌胜利。

那么，那位指挥政府军的智勇双全的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后来横扫欧洲的军事天才法国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8月15日法国的科西嘉岛。该岛位于地中海西部，历史上多次遭到外民族的入侵，因此具有光荣的反抗压迫的传统。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大革命的精神领袖卢梭在1762年做了惊人的预测：

“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

7年之后，拿破仑就在这个小岛上诞生了。

9岁时，拿破仑被父亲送到法国本土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又转到巴黎军官学校攻读炮兵学。看来此生，他充其量做一名军官而已了。他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躲避社交，不和女人接近，不寻欢作乐，不知疲倦地工作，公余之暇就手不释卷。

他这个贫穷的外省军官，出身寒微的科西嘉贵族，总是遭到贵族同僚和贵族官长的轻视。

对于这样的命运，他是否真正满意呢？

当他还来不及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时，更不待说具体地考虑未来计划的时候，他准备登台演出的那个舞台就开始动摇了，并随之而损毁、崩溃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革命的漩涡也把这位科西嘉人卷了进来，不仅缩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距离，而且把拿破仑的命运与法国革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拿破仑把他生命的全部活力投入了法国的事业，使法国一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则为拿破仑提供了充分发挥才华的条件和场所，使拿破仑进入了世界伟大人物的行列。

然而，当初拿破仑并没有想到这场革命将使他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革命之初，对他来说似乎并不美妙。相反，生活开始困难起来了，一个大家庭完全破产了，年轻的上尉（拿破仑不久以前得到了这个军衔）需要负担母亲和7个兄弟姐妹的生活。起初他把他们勉强安置在土伦，后来又搬到马赛。贫困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挨下去，没有一点起色。然而不久，他的这种枯燥无味的服役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中断了。

在法国南部，爆发了反革命叛乱。1793年，土伦的保王党人赶走了革命政权的代表，并向航行在地中海西部的英国海军求援。于是革命军从陆地上包围了土伦。

这个包围由于部署不当，因而没有获得成功。这次包围是由一个叫卡尔多的人指挥的。这支军队的政治领导人很凑巧是拿破仑的旧相识、科西嘉人萨利切蒂，他曾平定过南方保王党人的暴动。他同拿破仑很要好。拿破仑去土伦附近的军营访问了这位老乡，并向他指出夺取土伦以及把英国海军从海岸赶走的唯一方法。萨利切蒂任命年轻的上尉为包围军炮兵首领的助手。

11月最初几天发动的攻势没有获胜，因为负责指挥的顿涅在关键时刻没有听取拿破仑的意见和要求而命令军队撤退。拿破仑相信，要不是犯了这个重大错误，法国人一定取得了胜利。他自己身先士卒，负了伤。

上级领导对这个突然出现在军营中的不知名的年轻人不很信任，对拿破仑的方案一再反对和阻挠，最后，新来的指挥官杜戈米埃终于同意实行他的方案。

拿破仑配置了渴望已久的炮兵，进行猛烈的轰击，然后实行冲击——他亲自参加了这次冲击，夺下了控制舰队停泊处的制高点，向英国舰队开火。

经过两天的猛烈射击，共和党人于12月17日向要塞发起猛攻。有7000人参加了这次冲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败下阵来。但就在这紧要关头，拿破仑带着后备队上来了，从而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所有英国人同意用军舰带走的人都开始从城里蜂拥逃窜。土伦向胜利者投降。共和党人的军队开入城市。英国舰队逃往公海。

“我真是无法向你形容拿破仑的功勋：他的知识非常丰富，智力极其发达，性格异常坚定，但这还不能够使你对这位非凡的军官的优秀品质有个最起码的了解。”

这是杜纪尔将军在向巴黎陆军部报告时所写的；他热烈希望陆军大臣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能够留下拿破仑，因为围攻土伦的整个军团都很清楚拿破仑在配备炮兵、巧妙布置包围、进行射击以及最后发起冲击的决定关头所起的重大作用。

这次冲击发生在1793年12月17日。这是拿破仑指挥并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战役。从1793年12月17日夺下土伦要塞，到1815年6月18日败北、法兰西帝国皇帝离开死尸遍地的滑铁卢战场，总共有22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血腥而漫长的历程。尽管拿破仑后来指挥过规模更大的、战绩更辉煌的许多战役，但是土伦战役的胜利在拿破仑的史诗中永远占有特殊地位。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和法国政坛两位关键性的人物发生了联系。一位就是当时正处在权力顶峰的雅各宾派专政的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另一位就是后来督政府时期握有实权的五督政之一巴拉斯。这两个人当时注意到了拿破仑的杰出才能，这对拿破仑的发迹产生了具有转机影响。

土伦战役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巴黎第一次知道了他。救国委员会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消灭了土伦的叛徒，从海岸上赶走了英国人。土伦曾被看成是无法攻克的堡垒，很多人不愿相信攻克土伦的消息，更不愿相信这一杰作会出自一个初出茅庐的默默无闻的拿破仑之手。胜利者幸运的是，罗伯斯庇尔弟弟作为特派员，占

领城市的时候，他也在场，他在给巴黎的报告中描述了事件的全貌。结果马上见效：他被破格提升为炮兵准将。这时他才 24 岁。这是他向权力顶峰的迈出的第一步。

拿破仑拿下土伦，当时正是雅各宾专政的极盛时期，这个专政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成功地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反扑，但是欧洲封建主的反法联盟仍然威胁着法国革命政权的生存。拿破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征服意大利以威胁奥地利。这种想法本身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来说还是不寻常的：不是靠防御而是用直接向欧洲进攻的方法，来制止欧洲反革命的干涉。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太莽撞了，尽管拿破仑说服了罗伯斯庇尔的弟弟，但是他的计划在 1794 年显然是注定不能实现的。然而他根本没有料到的突然爆发的政治危机使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为了亲自向自己的哥哥和救国委员会表示支持进攻意大利的计划，罗伯斯庇尔之弟前往巴黎。夏季来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在热那亚完成了策划进军的秘密使命以后，回到了尼茨。

这时突然从巴黎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不但遥远的南方省份，就连首都也大为震惊：在热月9日这一天，巴黎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有名的“热月政变”。雅各宾派内部的右派分子掌握了政权，组织了督政府，他们处决了革命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罗伯斯庇尔等人，紧接着就在全法国追捕已经倒台的政府主要负责人的亲信和被认为是亲信的人。

拿破仑因与罗伯斯庇尔弟弟关系密切而受到怀疑，热月9日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即遭到逮捕，被押到地中海沿岸的要塞。

幸好调查拿破仑案件的两个负责人之中有他的同乡萨利切蒂，经他从中帮忙，拿破仑14天后被释放。

拿破仑真是幸运之至，没有上断头台。的确，在热月党进行恐怖活动期间，许多罗伯斯庇尔派或与罗伯斯庇尔接近的人都遭到了杀害。不管怎样，拿破仑出狱以后马上就确信，时代已经变了，他那顺利开始的前程中断了。

他在获释以后仍然受到怀疑、排挤，因此一怒之下辞了职，来到巴黎。

拿破仑又开始过着贫困的生活。25岁的将

军因跟上级争吵而丢了官，囊中一贫如洗，心情郁闷地度过 1794 年艰难的冬天，度过了 1795 年更加艰难的饥饿春天。

1795 年 8 月，他在救国委员会地形测量部找到一份差事，但这也没有给他带来丰厚的薪俸。有时为了混顿饭吃，只有去很喜欢他的朋友家里去串门。

但忽然有一天他又时来运转了：共和国又需要他去跟过去在土伦交过锋的同一敌人作战了。

1795 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后，于热月 9 日却丧失了自己最锐利的武器——雅各宾专政。资产阶级走上反动的道路，一直不知道采取什么新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热月政变后一直由左向右转，实行白色恐怖。同时，国内形势恶化。一方面饥饿的下层人民无以为生，另一方面是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花天酒地。

下层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资产阶级却用血腥的屠杀来报复。

保王党人却在一边幸灾乐祸：“巴黎强盗”

自相残杀，复辟有望了。然而他们这回可大错而特错了。虽然资产阶级镇压人民，但是他们非常珍视资产阶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成果。1789～1795 年发生的事变意义就在于此，封建制度已彻底崩溃并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资产阶级已在法国历史的旧时期和新时期之间挖掘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保王党人永远理解不了这一革命意义，他们只关心采取行动来复辟。

1795 年热月党人的统治恰恰为保王党人发动叛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当时，资产阶级担心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进入议会，规定新议会成员 2/3 必须从原来议会中选举。上层资产阶级认为危害了自己利益，因此都起来反对。保王党人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在巴黎中心区突然举行了反对国民议会的暴动。

从葡月 7 日（9 月 29 日）起，当巴黎中心区传出惊人消息时，国民议会马上感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它知道自己没有谁能依靠，对革命雅各宾党人的杀害，对工人区进行的残酷无情的迫害，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 4 个月前的事。现在，国民议会当然不能指望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援助了。事实上群众仇恨它，它也害怕群众。如今只能指望军队了，而军队状况又如何呢？似乎并不妙，人数少得可怜，仅有 6000 人。这还不算。这次葡月事变参加者并不是王党分子，多数是富裕的资产阶级，虽然目的是复辟，但打出的是民权的旗号，士兵们很难说不糊涂。至于军官们的情况就更坏了。他们在镇压工人们反抗时，得到了显贵们的夹道欢呼。如今却要他们向曾向他们欢呼过、而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显贵们开枪，这就可太难了。于是干脆听之任之。

巴黎四面八方响起了喊叫声，保王党人弹冠相庆，似乎胜利在握。

但是这帮家伙欢喜得有些过早。国民议会决定进行斗争。

就在葡月 13 日夜間，国民议会將纵容叛乱的巴黎警备司令梅努将军革职并马上逮捕，任命热月政变的首领之一巴拉斯为巴黎武装部队总司令，准备镇压。当夜就得采取行动，以防止梅努被解职的消息激怒中心区大亨们，从而在议会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包围议会。但巴拉斯并不是一名军人，只是一个惯于耍手腕的政客，议员们对他不抱有信心。国民议会一片混乱，怀疑

自己能否继续存在。

必须毫不迟疑地在几个钟头内展开战斗，形势的危急已经不容人们过多考虑。巴拉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偶然地记起了一个穿着破灰大衣的最近几次找他帮忙的那个消瘦的年轻人。巴拉斯对这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微乎其微，只知道他是个退职将军，曾在土伦显示了突出的才能，后来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在首都穷途潦倒，薪俸微薄。巴拉斯对拿破仑能否胜任镇压叛乱这个艰巨任务没有把握，但是“有病乱投医”。巴拉斯命令把拿破仑找来，当即问道：

“将军，您能否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

“让我考虑几分钟再回答你。”拿破仑大脑飞速地想着如果他站到巴拉斯一边，他将会得到什么。因此他欣然同意，并且说：

“但是，谁也不能干涉我的指挥，”他说，“等大功告成以后，我才会放刀入鞘。”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面，拿破仑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信任，他被任命为巴黎卫戍部队司令。一夜之间，拿破仑成了不仅在军界，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中

都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成了巴黎督政府五个督政官中势力最大的巴拉斯的密友。机遇和幸运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从此拿破仑平步青云。这时，拿破仑和一个与上流社会有密切联系的寡妇约瑟芬结婚，于是在他脚下又展开了一条平坦的政治道路。拿破仑有可能当上督政官，在他面前展开了锦绣前程。

但是，此时的拿破仑年仅26岁，血气方刚。他不愿在巴拉斯等督政官手上做个驯服的助手，他也不愿意把自己埋没在巴黎轻佻的生活里，在他心中炽烈地燃烧着施展他军事才能的欲望——追求成为伟大统帅的欲望。他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渴望实现他早已梦寐以求的征服意大利的计划，而此时正是他实现理想千载难逢的机会。葡月的功勋使督政府重视拿破仑的计划，于是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开始独立指挥作战的生涯。尽管他对统率骑兵、步兵还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他尽管只具有指挥象土伦战役和葡月战斗这样小规模的实际战争经验，但他却信心百倍地决心要统率意大利军团到辽阔的战场上去立征战之功。他在巴黎和战场、舒适和艰险之间做出了常人难

于理解的选择。

1796年3月11日，27岁的拿破仑，在度过了两天的新婚生活后，告别妻子，带着他的忠实朋友马尔蒙、朱诺以及贝尔蒂埃、缪拉、迪罗克等军官，以意大利军团总司令的身分踏上征程，如雄鹰展开翅膀，到广阔的天空高高飞翔。

欧洲史上新的一章——20年的拿破仑战争揭开了。

1796年4月9日，一支破烂的法国军队在一个据说叫拿破仑的人率领下，正走在阿尔卑斯山的狭长地带上，说是去意大利打奥军，太可笑了！欧洲几乎没有一个人去看它一眼，然而就是这支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拿破仑从此声威远扬

1795年3月11日，法国意大利方面军新任总司令拿破仑带领他的副官朱诺和总传令官尚韦乘马车前往前线。途中汇合了他未来的妹夫勒克莱尔准将和参谋长贝尔蒂埃，于27日到达

意大利军团驻地尼斯，在这里建立了司令部。

拿破仑曾在意大利军团服过役，他自以为是比较熟悉的，可是，这次重回部队，发现情况之糟，竟比他想象的还要坏得多。拿破仑终于明白，为什么法兰西共和国最有势力的将军都不愿接受这项任命。军队简直象一群土匪。法国军需部门的各种偷盗和贪污行为，从来都没有象热月党国民会议最后几年以及督政府统治时期这样严重。确实，巴黎给的军需物资不多，但就这么点东西也很快地肆无忌惮地盗窃一空了。那么多人住在尼斯和尼斯附近的军营里，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衣服穿。这支军队仿佛被人遗忘了，物质生活一踏糊涂，造成纪律松弛，偷盗成风。

对于新来的司令官，军官和士兵并不尊重，更谈不到欢迎。他们编造了种种谣言，嘲笑和丑化这位年轻的、身材不高、貌似柔弱的年轻司令。

拿破仑面临着十分困难的任务：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有衣服穿，有鞋穿，要整顿纪律，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在行军期间，在远征过程中，在战斗的空隙时间来解决。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推

迟进军的时间。由于与所属军官奥热罗、马塞纳等人发生摩擦，他的处境越发复杂化。这些人只愿服从年长的或功绩更大的长官，但要承认27岁的拿破仑做他们的长官，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一种耻辱。

面对这种情景，拿破仑决定，先从整顿军纪入手。他制订军中规章制度，发布全军，严惩各种违犯纪律的现象，特别是从严惩处任何土匪行为。到任不久以后，他果断地惩办了一批企图哗变闹事的军官和士兵。

因此，人们发现，这位新来的司令，确实是一位令人生畏的铁腕人物。对待军官，拿破仑也毫不客气。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拿破仑仰头对身材魁梧的奥热罗说：

“将军，你的个子正好高出我一头，但假如你对我无礼的话，我就会马上消除这个差别。”

1796年4月，开始第一次远征的时候，拿破仑在自己军队的心目中，只是一个两年多以前在土伦初露头角的能干的炮手，在葡月向涌往国民议会的暴徒射击并因此得到南方军队指挥官职务的将军，如此而已。

他对士兵还没有建立起个人的感召力和绝

对的统治地位。因此，他决定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地向士兵们说明到意大利可能得到的财物。只有用这种办法来影响自己所统率的缺吃少穿的士兵。他说：

“士兵们，你们没有衣穿，吃得也不好，政府欠下你们许多东西，可是它什么也不能发给你们。你们在这些悬崖峭壁中间显示出来的勇气和坚强力量是令人惊叹的，可是这并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荣誉，它们的光辉并没有照到你们身上。我想带你们到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里去。富饶的地区和繁华的大都市将受你们支配。你们在那儿将会得到尊敬、荣誉和财富。意大利军团的士兵们，难道你们的勇敢精神和坚韧力量不够吗？”

士兵们报以热烈的欢呼，到处弥漫着狂热的战争情绪。

战争尚未开始时，督政府为了对热那亚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同意贷款，命令法军一部兵锋直指热那亚。这一行动震惊了奥军，他们以为法军将进占热那亚，同时这也打乱了拿破仑的部署。开始，拿破仑很不满，但很快就发现这将能够把奥军吸引到热那亚，有利于执行他的

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计划。所以，他又向热那亚增援部队以迷惑敌人。于是4月6日，在奥军中中了圈套的情况下，拿破仑率领大军冒着沿岸英国巡逻的舰艇的猛烈炮火奇迹般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有名“天险”，突入意大利。

当时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派去它著名统帅博利厄，战功赫赫，而且他所率领的军队实力也远远超过拿破仑的军队。但一开仗，他就棋失一着，错误地认为法军主攻方向是热那亚，因此兵分3路防守阿尔卑斯山脉。

拿破仑根据这种情况迅速做出判断，命令法军中间突破，兵锋指向奥军中路——驻扎在蒙特诺特的奥军。

12日拂晓，战斗在蒙特诺特打响了。这一天的场面颇为壮观。清晨，晓雾还没有被阳光驱散，近万名法军突然出现在奥军背后。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懵了，他们来不及做认真的抵抗，被迫纷纷逃命，以致很快就崩溃了。仅仅几个小时，奥军损失3000余人，其中2000人成了法军俘虏。

这时，博利厄正赶往热那亚以阻挡法军的进攻，可是根本就看不到法国部队的影子，只好

空手沿着来时的艰难的老路返回司令部。但他们在途中得悉，拿破仑已在蒙特诺特打胜，进入了皮埃蒙特。这已经是两天后的事了。

拿破仑接着命令马塞纳向代文前进，命令塞律里埃开往塔纳罗河谷以威胁切瓦，命令奥热罗向西攻击米莱齐莫的奥军。大军所向披靡，仅用2天就打开了通往都灵和米兰的两条道路。奥撒联军总司令博利厄在拿破仑迅速和突然打击下，失去了对其兵力的控制，现在只能龟缩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土纳两个要塞之间，以求守住波河的渡口。

博利厄在作战开始时拥有的兵力上的优势已经丧失，现在只剩下1.6万人，已经没有能力进行主动出击了。

在这之后，拿破仑的作战锋芒转向撒丁军队。他集中优势兵力，向力量比较薄弱的又失去奥军支援的撒丁军队猛扑。撒军在切瓦的营地顶不住法军的猛烈进攻，向都灵方向溃退。法军夺取了城市和所需的军需仓库。

接着，拿破仑又利用皮埃蒙特平原的地理优势，发挥骑兵的威力，对溃退的撒军猛追猛打，以扩大战果。孤军作战的撒丁军队在遭受沉

重打击之后，已无力抵御法军进攻，只得于4月28日签订停战协定。占领区的一切大炮和仓库立即移交法军，撒丁军队分驻各地做警备队，不得引起法军不安。这样，撒丁王国成了法军的后备阵地了。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拿破仑以惊人的速度，集中优势兵力，三战三捷，完全摧毁了敌人的优势兵力。

4月26日，拿破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士兵们！你们在15天内赢得了6次胜利，缴获了21面军旗和55门大炮，攻克了许多坚固的阵地，占领了皮埃蒙特最富饶的地区，俘虏了1.5万名敌军，杀伤敌人1万多名。……你们什么都缺少，却补充了一切。你们没有大炮却打了胜仗，没有桥梁而渡河，没有鞋而急行军，没有酒和经常没有背包而露营……。士兵们，祖国期望你们去取得重大成就，你们不会辜负祖国的期望吧？你们还有许多仗要去打赢，许多阵地要去夺取，许多河要去渡过。你们当中是否有人勇气低落呢？没有！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求和平，……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能说上一句：我曾经在战无不胜的意

大利军团里作战过。”

拿破仑的话给士兵恢复了人的尊严，激发了士兵的荣誉感。尽管同拿破仑在一起，意味着无休止的急行军，一个仗接着一个仗，但部队甚至在腹中空空、喉咙干燥的情况下也不抱怨，士兵们对拿破仑的话报以雷鸣般的欢呼。

拿破仑在击溃撒丁军队并使撒丁王国成为附庸之后，立即掉转方向，集中全力向奥军扑去。奥军被赶到波河边，并向波河东岸撤退，企图掩护米兰。

5月16日，双方开始争夺洛迪桥。傍晚时分，一场扣人心弦的战斗打响了。大约6点钟，奥军的炮火刚刚减弱，隐蔽在城墙后面的几千名法国突击队员突然打开洛迪城门，沿大路冲向桥头。法军的这一大胆冒险的举行使敌人惊慌失措，恐惧万状，他们急忙集中全部火力向法军猛烈射击。几十门火炮用霰弹扫荡着桥头和周围地带。法军顿时陷入混乱，畏缩不前。在这紧要关头，拿破仑打着旗帜，身先士卒冲向桥头，士兵们大受鼓舞，潮水般冲了上去，一举打下洛迪桥。掷弹队士兵们向拿破仑欢呼，亲切地称拿破仑为“小队长”。

拿破仑乘胜追击。5月14日法军马塞纳师和奥热罗师进抵米兰城下，2000名守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5月15日，法军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过欢迎的人群和高大的凯旋门，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开进伦罗底的政治首府米兰。

米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米兰的占领使奥军在伦巴第的防线彻底崩溃，标志着奥地利人在伦巴第的长期统治从此不复存在。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胜利，并且进一步激发法国士兵为彻底打败奥军而继续战斗的勇气和热忱，5月20日，拿破仑对沉浸在胜利之中的法国士兵发布了一个象号角一样振奋人心的动员令。他说：

“不朽的荣誉将归于你们，因为你们改变了欧洲这一最美丽部分的面貌。”

他在动员令中还激励士兵们继续战斗，消灭残敌，并且给这场战争赋予正义的美丽旗号，要解放意大利。

当然，作为征服者和自私自利的法国资产阶级代表者拿破仑是根本不会兑现自己的诺言的。不久以后，拿破仑就开始向当地人民征收税

款，勒索赔款，并无视意大利诸国的中立，任意掠夺，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珍品也被掳往巴黎。

6月4日，拿破仑又开始对当时欧洲最大的要塞之一曼图亚围攻。战斗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当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所向披靡的时候，法国另外两支由著名将军莫罗和茹尔当指挥的法军在莱茵河德国战场却一筹莫展。对比之下，拿破仑的战绩更加突出。波河防线的瓦解，洛迪之战的奇迹，米兰公国的陷落，博利厄元帅的败北，这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接连传到法国，使巴黎那些平庸无能的政客们显得黯然失色。他们开始把这位蜚声意大利战场的年轻统帅视为一种潜在威胁。

巴黎督政府的担心和猜忌不是毫无道理。早在洛迪桥战役前，拿破仑就给督政府写了一封傲慢的信，不许巴黎在军事问题上进行任何干预。因此，巴黎为了防止大将专权反戈情况出现，提出将意大利军团分为两部分的计划。这对防止个人野心也许有点好处。但在当时军事条件下这将对法军是致命的错误，因为奥军已经

增援意大利战场，法国分散兵力将走向灭亡，所以拿破仑坚决反对，要求督政府信任他，否则就辞去总司令职务。

为了平息拿破仑的愤怒，同时也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督政府终于收回成命，并安抚拿破仑说：

“将军阁下：对意大利的战役你似乎仍愿进行整个的作战行动，督政府在充分考虑这一建议以后，对之作肯定的行动，且对你的才能及对共和国的忠诚，都深为信任。”

从此以后，督政府除了批准拿破仑已经执行的或新提议的计划以外，一般不过问意大利军团的事情。至于那个肢解意大利军团的计划，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

7月份，奥地利王室为了加强意大利战线，任命维尔姆泽元帅接替博利厄。维尔姆泽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将军，他从莱茵战线抽调3万名精兵，这样意大利战场上奥军达6万人，在数量上再次超过法军。3万奥军迅速行军支援曼图亚要塞。

这个消息使所有受到法军侵略的国家欢欣鼓舞。的确，在1796年的春季和夏季，除了天

主教徒和意大利北部半封建的贵族憎恨法军带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同样憎恨拿破仑军队对他们的劫掠所造成的苦难。被击溃和被迫接受屈辱和约的皮埃蒙特可能在法军后方哗变，切断法军同法国的交通。

拿破仑派 1.6 万人来围曼图亚要塞，留下 2.9 万人作为后备，并等待国内的支援部队。先后被派去迎击维尔姆泽的优秀将军马塞纳、奥热罗都败下阵来。这对法军来说，情况已经有些绝望了。

维尔姆泽已经在预祝即将取得对凶恶的敌人的胜利，已经进入被围的曼图亚，并为它解了围。这时，他却惊骇地得知拿破仑率领全部军队去进攻在拿破仑与米兰之间的交通线另一支奥军，并在三次战斗中将他们击溃了。维尔姆泽听说这个消息，火速前往支援，一路上打败了法军的几支部队，最后与拿破仑相遇。拿破仑施展计谋派一部分法军深入奥军后方，从而使维尔姆泽遭到惨败。

维尔姆泽接二连三地遭到了新的失败，这以后他带着溃军残部先辗转于阿迪杰河流域上

游，然后又进入曼图亚。拿破仑对他重新进行包围。

奥地利宫廷虽然因查理大公不断发来的关于德国战线方面打胜仗的消息而兴高采烈，但是却懊恼地眼看意大利北部的丧失和维尔姆泽元帅的被困。奥地利宫廷意识到，老元帅维尔姆泽和许多参谋人员以及2万名饥饿的部队只能靠困守曼图亚来维持生路。他们既陷入绝境，又受秋季疟疾的传染和饥饿的袭击，可能很快会被迫打开城门向拿破仑投降。

奥地利王宫御前会议又从莱茵战线调集两个军团约6万人，交给阿尔文齐元帅指挥，命令他前去解救曼图亚和维尔姆泽。

奥地利王室的这一决定显然是非常陈旧和错误的。他们原可以利用莱茵战线的胜利，继续在莱茵方面猛烈攻击法军，这就很有可能使拿破仑离开意大利回援，从而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但是，奥地利王室为了维护王室的荣誉感，不顾阿尔卑斯山脉的险峭峡谷，不顾意大利北部不利于奥国的政治气氛，也不顾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上作战的卓越军事才能，顽固地一再派遣军队去解救曼图亚，使自己原可以取得

很多胜利的精锐部队一支一支地被拖垮在意大利战场上。

阿尔文齐元帅率领4万生力军，驰援曼图亚，夺取维罗纳，并与达维多维奇会合，后者尚有1.8万人的兵力，将由蒂罗尔进至阿迪杰河。

拿破仑再次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只有马塞纳和奥热罗两个师可以用来迎击阿尔文齐的攻势。法军有1.4万名伤员和伤兵还在医院里，许多著名的军官正患着疟疾。法军几乎得不到什么增援，士气十分低落。甚至连拿破仑本人也深为沮丧，他给正在米兰的约瑟芬写了一封调子悲观的信。

阿尔文齐在几次交锋中击退了好几支法军队伍。拿破仑命令法军从一些据点撤退，以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自己周围，准备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

拿破仑率领大军佯作后退，并采取大胆的迂回行动，迂回到阿尔文齐军的尾部，把他们诱进被辽阔的沼泽围绕的几条大路的战场上。11月15日到17日双方在阿尔科拉沼泽地展开血战。拿破仑从侧面猛攻敌人。战斗非常激烈，尤其是在阿尔提拉桥的争夺战，战斗继续了3天，

打得非常艰难，阿尔提拉桥三易其主，中间没有多少喘息时间，双方牺牲很大。奥军人数很多，且是奥地利王朝精锐部队，作战相当顽强。法军几乎难以支持。

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拿破仑亲自擎着旗帜猛冲到桥上，把旗竖在那里。法军得以重振士气，阿尔文齐的军队被击退并被粉碎了。

阿尔提拉战役结束一个半月后，奥军才恢复了元气，准备实行报复。1797年1月中旬，双方又展开战斗。1797年1月14日和15日在利沃里的三天血战中，拿破仑将军把奥军打得丢盔弃甲。

这次奥军也仿效年轻的法国统帅的榜样，集中了所有力量。阿尔文齐把自己被击溃的残部解救出来以后，再也不敢去解救曼图亚和被包围在那里的维尔姆泽的军队了。

利沃里战役结束两个半星期后，即2月2日，曼图亚守军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和疾病的折磨，终于向法军投降。拿破仑宽宏大量地允许维尔姆泽这个奥地利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元帅率500名步兵、200名骑兵和一个象征性的野战炮连，在假释宣誓后携带武器走出要塞返回奥地

利，而 1.6 名守军的其余部分则如数做了俘虏。

利沃里的胜利和曼图亚的有条件投降，使拿破仑成了意大利北部的全权统治者。他立即利用这一大好形势，继续追击阿尔文齐的残部，同时开始过问意大利中部事务。他派军队进攻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以迫使教皇庇护六世屈服。教皇被迫签订和约，割地赔款。现在，拿破仑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放手向奥国首都维也纳进军。奥地利皇室急忙将他们最杰出的最年轻的指挥官奥皇的弟弟查理大公从莱茵战场调来，以阻挡拿破仑的进攻。

但是，无论是查理大公的杰出军事才能，还是精锐的奥地利军队，或者是奥军在弗留利和卡林西亚的天然阵地，以及塔利亚曼托河的天然障碍和阿尔卑斯山卡尔尼克支脉的许多险要高地，都抵挡不住受到胜利鼓舞、斗志旺盛的拿破仑军队的胜利前进。法军强行通过了皮亚韦河、塔利亚曼托河和塔尔维齐奥狭谷、诺伊马克特狭谷等天然障碍，出现在离维也纳只有 100 公里的泽默林。曾在莱茵战场接连取得胜利的查理大公节节败退，最后逃往布林涅尔。整个欧洲都注视着拿破仑军队闪电般地向欧洲大陆封

建堡垒维也纳进军。

维也纳一片混乱，流言、议论和喊叫声汇成一片：汉尼拔兵临城下！拿破仑已经到了提罗耳！明天就要到达维也纳！奥国宫廷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宫廷贵重的物品和重要文件已经开始装箱，运往匈牙利。

当查理大公的军队遭到新的失败、全线溃退以后，奥国宫廷了解到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危险性。1794年4月初，拿破仑将军得到正式通知，说奥地利王弗兰西斯请求议和。拿破仑实际上也在追求在有利自己的时机结束对奥战争，旋即同意议和。

9月份，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签订和约。奥地利派了一个能干的外交家科本茨同拿破仑进行谈判。这真是棋逢敌手。科本茨在漫长的困难的谈判过程中，向本国政府抱怨说，很少碰到象拿破仑“这样的诡辩家和毫无良心的人”。拿破仑第一次表现出自己的外交才干并不亚于自己的军事天才。他虚张声势、威逼利诱，以获得自己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你的帝国是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你忘了，法国是战胜国，你们是战败国

……你忘了，你是在我的掷弹兵的包围中同我谈判的……”

拿破仑就是这样发狂地喊叫。他随手把放着贵重玉石咖啡盒的桌子摔到地板上，那只由科本茨带来的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送给奥国外交官的咖啡盒摔得粉碎。

“他象个疯子一样。”科本茨这样报告说。

1797年10月17日，在坎波福米奥终于签订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的和约。

拿破仑几乎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甚至在奥军根本没有被法军战胜的莱茵地区他也得到了。奥地利把比利时各省割让给法国，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地图上被一笔勾销，由法奥两国瓜分。条约承认莱茵河是法国东部疆界，法国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天然疆界”。

巴黎听到和平的消息以后，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法国期待着商业和工业的活跃，到处都在传颂着这位天才的军事领袖的名字。谁都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其他将军在莱茵河上屡遭失败，只有拿破仑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从而使莱茵河得了救。一家报纸写道：

“每提到拿破仑的名字，所有人都把帽子抛

到空中，狂热的情况难以形容。对幸运的和谈者名字，法国上下交口颂扬。”

“呵！伟大的自由精神呵！只有你才会产生……征服意大利的军队，才会产生拿破仑！幸福的法兰西呵！”共和国的督政官之一莱波在自己的演说中这样感叹道。

1797年12月7日拿破仑回到巴黎，12月10日在卢森堡宫受到了督政府全体成员的隆重欢迎。

无数的人群挤上巴黎街头。当他到达卢森堡宫的时候，数不清的群众聚集到宫殿前面，以暴风雨般的喊声和掌声欢迎拿破仑。在欢迎他的时候，督政府第一督政官巴拉斯、督政府的其他成员和诡计多端、最有眼光、足智多谋、卖身求荣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以及其余官员都发表了演说，广场上的群众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赞颂。

对于这一切，28岁的将军都以十分安祥的表情接受下来，好象完全理所应得、不足为奇的样子。他心里从来没有重视过人民群众的狂欢情绪。

“假如把我送上断头台的话，人民也会这样快地跑来看热闹的。”拿破仑后来这样说道。

拿破仑刚一回到巴黎，就通过督政府着手制定新的大战的计划：作为远征英国的将军，他决定，要有一个比英吉利海峡更能威胁英国的地方，因为在英吉利海峡英国海军比法国的强大。他提议占领埃及，在东方造成进一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的跳板。至于督政府的意见，它认为拿破仑此时“功高震主”，离得越远越好，乐得个顺水推舟。

他是不是疯了？——当欧洲许多人到了1798年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这样问自己。然而拿破仑喜欢的就是冒险。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领远征埃及的舰队由土伦扬帆出航。

扑朔迷离的政局，拿破仑神秘离开埃及。共和国鼓乐喧天，为的是迎接共和国的将军，然而它迎回的却是一位君主

我们这里放下拿破仑远征埃及不表，单说在他出征期间法国本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1798年底，俄、英、奥、西班牙、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策划

者和组织者是英国，军事行动的支柱是俄国和奥地利。武装进攻以奥地利粗暴地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动揭开序幕。法国根据坎波福米奥和约的规定，派代表参加拉什塔特会议。结果遭到奥地利军人的袭击，代表团成员被当着代表们的妻子的面杀害了。

与此同时，反法联军从意大利、瑞士、荷兰和莱茵地区四个方面同时进攻法国，主要战场在意大利。1799年初，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奥联军兵锋所指，法军不断溃败下来。法国著名将领儒贝尔战死，意大利北部重新被奥军夺回，俄国海军在希腊沿海打败法国舰队，8月底英军攻入荷兰。

在联军取得几次胜仗之后，战争面临着转入法国境内的危险。

对外战争的失利，法国国库空虚及国内政局动荡不定，使督政府的统治陷于不稳和动摇状态。

督政府在1796年镇压了下层人民的革命运动——巴贝夫平等派运动后，王党活动再度猖獗。1797年5月立法团选举中，王党分子组织了庞大竞选活动，将大批王党分子选入议会，

倾向王党的一个著名将军皮什格鲁被选为五百人院议长。在立法院中，王党分子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财政紧张，主张紧缩开支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企图煽动群众，为复辟开辟道路。他们在两院中匆忙制定了赦免反动教士和逃亡者法令，还企图恢复天主教旧日特权。一时间国内保王党气焰嚣张，反动贵族和逃亡教士纷纷回国，甚至报复购买国有资产的人。督政府一时不知所措。

正当此时，在意大利指挥对奥战争的拿破仑截获了有关皮什格鲁等人复辟阴谋的文件，并立即寄给督政官巴拉斯，同时送去了百万金法郎供政府镇压费用。于是督政府在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半夜3点钟，由巴拉斯下令大批逮捕保王党人，清洗五百人院和元老院，将大批王党议员流放。

保王党人被镇压后，新的督政府又将残存的雅各宾派人物拉在身边。这一时期，革命民主力量又大增。1798年4月议会选举中雅各宾派大获全胜，这又吓坏了督政府。花月（5月21日）22日，督政府又急忙宣布革命民主分子当选无效。

1799 年对外战争失利及强敌压境，使法国革命人民爱国情绪重新高涨。各种进步组织又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并且要求为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以及其他殉难者复仇。

雅各宾派革命民主运动的重新高涨，吓得大资产阶级魂飞魄散，并马上掉转枪口，迫害雅各宾党人。

反法联军一时得逞，助长了王党的复辟气焰。那些拒绝向共和国宣誓的牧师在全国各地煽动叛乱。督政府左右摇摆的秋千政策，反映了督政府政权出现了危机，无法再延续下去。

在强敌压境，内部动乱，督政府无力维持稳定统治的形势下，大资产阶级一心向往出现一个独裁者，一个恢复贸易的人，一个能够保证工业发展的人，给法国带来胜利的和平和巩固的国内“秩序”的人；中小资产阶级，首先是买了土地发了财的农民，也有这样一个愿望：这个独裁者，只要不是波旁家族的人，任何人都行。至于对工人来说，督政府带来的只是饥饿，无论谁向督政府进攻，他们都不想维护这个政府。他们喊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吃上饭的政权。”

督政府的密探不断把这些话报告给惶惶不安的上级。

人们对督政府失望了。里昂的企业主和丝织厂老板为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带来大量生丝而欢欣鼓舞，可是拿破仑不在的时候，却被督政府丢了。拿破仑 1796~1797 年从意大利运到巴黎来的几百万金币，都被督政府袒护下的官员和投机商侵吞了。法军在意大利被打得落花流水，法军总司令儒贝尔阵亡，自己的“盟国”分崩离析。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厌恶督政府，更加思念远征的拿破仑。

军队就更不用说，早就想念着已经去埃及的拿破仑，士兵们抱怨由于偷盗行为而使自己忍饥挨饿，并一再说白白让他们去送死。虽然后来督政府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没有恢复它的声誉。对绝大部分有产阶级来说，督政府没有效率；对城乡群众来说，督政府是有钱人从事强盗和投机的场所，是使工人、农民走投无路的政府；对士兵群众说，督政府是由一群可疑的分子组成的，他们不给军队鞋子和粮食，在几个月中间，就把拿破仑在几十次战役中占领的地方交

给了敌人。

人们需要铁腕人物，于是目光一齐投向一个焦点：拿破仑。

而此时，在埃及远征巴勒斯坦回来的拿破仑正躺在床上，副官拿着一大叠报纸进来。那是直到6月6日为止的英文和法文报纸。

“将军，给您报纸。坏消息。”

“发生了什么事？”

“舍雷尔被击溃。我们几乎丢失了整个意大利。”

“什么？意大利丢了？”

拿破仑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把抓过报纸。整个夜里翻着报纸看，不断地发出愤怒的喊叫：

“一群笨蛋！意大利丢了！我的一切胜利果实都丢了！我要去！”

他立刻做出决定，他要克莱贝尔将军统帅全军，命令赶快并且绝对秘密地配备4只船，运载他所选拔的500名士兵，于1799年8月23日开往法国。他给克莱贝尔留下了装备精良和大批军队、他所建立的正规行政管理制度和捐税制度，以及这个被占领的大国的吓呆了的默默无闻的被征服的人民。

拿破仑离开埃及时就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就是推翻督政府，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拿破仑对他的亲信和留在埃及的将领说：

“我决定返回祖国。……意大利已经丢失了，我们做出这么多努力，流了这么多的血，结果都是徒劳的。说实在的，把这些无能的人放在国家事务的首脑位置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中间除了不学无术、愚蠢自负和贪污腐化，就什么也没有。我单个地承受重担并用经常不断的胜利去支持这个政府，它自己无法维持它的生存。我走了以后，一切事情都变得这么糟。”

“我要回到巴黎去，我要驱散那样愚弄我们而不能治理共和国的律师。我将成为政府首脑，我要团结一切党派，我要恢复意大利共和国并且要稳固地占领这个美好的殖民地。”

“我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天职的责任感和国内发生的非常事态使我决定从敌人的舰队中间冲出去，回到欧洲。我的心永远同你们在一起。”

法国各阶层瞩目拿破仑。拿破仑也没有使他们失望，权力欲促使他一看到时机成熟就跃跃欲试。

实际上，拿破仑早就滋生了这个想法。那还是在意大利战场指挥法军节节胜利时就产生的。在屡次战胜当时十分强大的奥地利军队之后，这位年轻的将军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自己帐篷前面踱来踱去，第一次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难道今后他要永远为督政府、为“这些代言人”取得胜利，占领新的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是时候不到。

如今时候到了，拿破仑要偷渡地中海回国，推翻督政府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事业。没有督政府的命令，擅自离开埃及驻军，就可以治他死刑。抛开这个不说，4只小船载着拿破仑从密布英国舰队的地中海偷渡过去，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而葬身鱼腹。而拿破仑有一种赌徒的性格，常常做出惊人的举措。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事很多。在市中心使用大炮轰击叛乱者，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远征埃及，赤手空拳逃出第一次的流放地厄尔巴岛，未放一枪就赶走波旁王朝的复辟者等等。这不足为奇，拿破仑震惊世界的事太多了，而20年来使世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吃惊的正是拿破仑。

1799年10月13日（葡月21日）督政府向五百人院“满意地”通告说，拿破仑将军已回到了法国，在弗雷居斯登陆。人民代表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欣喜若狂的喊叫声和欢呼声中，全体起立，长时间地表示热烈欢迎。会议中断了。

当代表们走到街上，传布这个消息以后，据目击者说，首都兴奋得象发了狂一样，在剧院、沙龙、中央大街上，到处都在传颂着拿破仑的名字。

巴黎不断收到消息，说拿破仑将军在来巴黎途中经过中部和南部所有城市时，都受到当地居民规模空前的欢迎。农民们离开了农村，城市代表团接二连三地晋见拿破仑，把他当做共和国的最优秀的将军来欢迎。不仅是他自己，就是其他任何人也很难想象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规模的、意味深长的场面。别开生面的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得到拿破仑已经登陆的消息以后，奏着军乐走遍整个巴黎。很难完全弄清楚，是谁发出命令这样做的。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命令，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命令。

拿破仑一路上明显感到人们都把他当成了

“救星”。每经过一地，人们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发表感情激动的演说，张灯结彩，举行游行。外地的农民和市民都特意赶来欢迎他。军官们和士兵们兴奋地欢迎自己的统帅。所有这些在拿破仑面前象万花筒一样展开，但拿破仑心里还是没有底，究竟能不能成功。重要的是首都的表示。

10月16日，拿破仑抵达巴黎。巴黎卫戍部队兴奋若狂，拿破仑手中有了政变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拿破仑深知要使政变顺利进行而不引起大的社会震动，必须得到上层阶级的牢固支持。

拿破仑抵达巴黎后，即在贝尔蒂埃、蒙日和贝托莱的陪同下拜见督政官。拜会完全是礼节性的。猜忌的双方缺乏热情地拥抱，进行了十分拘束的谈话。

而在卢森堡宫的外面，激动的人群拥挤在图尔农街道上，想见埃及归来的将军，热烈地向他欢呼。拿破仑出现在人群中。他很轻松，微笑着，他穿的是一件半东方式的外国上衣，戴着高毡帽，一把马穆鲁克的弯刀挂在他的腰带上，头发比已往短了，非洲的阳光把他的皮肤晒得黝

黑。

拿破仑从抵达巴黎到政变的三个星期的热火朝天的日子里，看到许多人都在靠扰自己，他对这些人进行有益的观察。担任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塔利朗和警务署长的富歇也来投靠。拿破仑早就认识塔列朗，知道他是一个盗窃分子、贪污分子，毫无良心的但极聪明的追求名利的人。拿破仑知道，只要有人肯买，塔列朗会把任何可以出卖的人卖掉。但他看得很清楚，塔列朗现在不会把他出卖给督政官，相反，他会把他几乎直到最近还在其中担任外交部长的督政府卖给他。

塔利朗给他提供了许多极宝贵的意见，同时极力推动事情前进。将军完全相信这位政治家的头脑和观察力，并相信塔列朗会坚决帮助他，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次，塔列朗公开为拿破仑服务。

富歇也做了同样的事。拿破仑看到他也可以利用。富歇想在拿破仑执政时期留任警务署长，同时由于他以前是雅各宾党人，曾投票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因此他不会为了波旁王朝而出卖新政权。

大金融资本家和供应商公开拿钱给拿破仑。银行家科洛马上给了他50万法郎，未来的统治者暂时未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欣然接受，因为在这样艰巨的事业中是用得着钱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这个漂亮的打手和勇士，在30岁时就取得了这么多的胜利，攻下了这样多的要塞，超过了所有的将军，对政治事务和民政事务却不是十分了解的，所以要控制他是不会不成功的。直到政变发生前的所有日子里，拿破仑的交谈者和助手所想象的拿破仑都不是真正的拿破仑，而是另外的人。而拿破仑自己也想尽一切办法，使人们在这危险的几周内，把他当成别的什么人。过早锋芒毕露是不必要的。

在1799年露月整个上半月，他装出一副朴实、直爽、坦率，似乎相当单纯甚至眼光相当狭小的人；而且完全奏效。未来的奴隶认为自己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个偶然的方便工具。他们甚至没有掩饰对他的态度。他本人也知道，人们能以平等身分同他谈话的日子没几天了。使他们暂时还不疑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利用总司令职务之便，巧妙地布置，连市郊的工人都认为即

将来的事情，是从左的方面的政变，是把共和国从保王党人的手里解救出来。

“葡月将军从埃及回来，是为了再一次拯救共和国。”政变前后，人们都这样说。拿破仑把事情弄成了神话。

五个督政官中两个都参加了政变，另外两个被极端狡猾的、一心想要在未来的政权中谋得警务署长职务的富歇给欺骗了，弄糊涂了。剩下权力最大的巴拉斯总以为没有他不行，采取等待政策。议会中一些人知道密谋，但许多人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却对此表示同情，认为顶多是调动一下人事。政变进行得异常顺利。

历史上称拿破仑这次政变为雾月18日（即11月9日）政变。实际上政变发动于雾月18日，完成于19日。这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拿破仑凭借这次政变，在15年内处于法国最高统治者地位。

雾月18日（11月9日）凌晨，拿破仑的住宅和那一条街道都布满了将军和军官。大多数是拿破仑在意大利作战的亲密战友，也有特别邀请来的如著名的莫罗、麦克唐纳等人也在场。拿破仑通知他们“挽救共和国”的日子到了。将

领们都保证自己的军队不会出事。在住宅附近，军队已经排列整齐。

与此同时，拿破仑的代理人在元老院提出一个议案，说明威胁共和国安全的雅各宾阴谋正在进行，要求议会移到圣鲁克开会和任命拿破仑为首都及郊区武装力量总司令。提案随即通过，许多议员知道为什么提这个提案，但没有人敢反对。

早上8点半，元老院代表通知对拿破仑的任命。拿破仑随即带领一群显赫的将领来到元老院向共和国宣誓忠诚。接着又向集合在广场的部队讲话：

“共和国两年来的治理很糟糕。你们曾希望我的回国将会结束这么多灾难。你们一致祝贺我的任命，……自由、胜利、和平将把法兰西重新放在欧洲所占有过的位置上，……共和国万岁！”

部队向拿破仑欢呼。

正在此时，一直以为自己将是主角的巴拉斯见拿破仑久久不去找他报告而焦急起来，派一个叫鲍托的人来见拿破仑。

将军一看到鲍托，就以雷鸣般的声音在部

队前对这位督政府的代表喊叫道：

“我为你们缔造了一个光荣灿烂的法国。而你们把它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交给你们的是和平，而回来看到的是战争！我从意大利为你们运来了百万黄金，而我回来看到的却是掠夺性的法律和贫困！我为你们取得了胜利，但回来看到的却是失败！你们把我所熟识的、我的光荣的十万弟兄们弄到哪里去了？他们都牺牲了！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该是信任那些有权获得信任的国家保卫者的时候了。”

没有任何波折，也没杀捕一个人，共和国最高执行机关——督政府垮台了。参与政变的两个督政官自动退职。拿破仑又派塔利朗劝其他三个督政官。

最初巴拉斯漫不经心地听塔列朗讲话。可是当他踱到窗口，看到一群士兵时，便迅速回来在塔列朗交给他的辞职声明上签了字，自我解嘲地说：

“很高兴回到普通公民的行列。”

巴拉斯过去一直成功地欺骗了所有人，如今他突然发现自己被骗了。其他两个督政官见大势已去，也都宣布辞职。

拿破仑立即命令他的亲信将领控制巴黎的各个政治和战略要点，接着又起草文件安定人心。

在交易所，有产者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国家有价证券的行情看涨。

忙碌到半夜的拿破仑终于舒了口气：

“今天，事情进行得不错，我们看看明天情况怎样。”

第二天，睡了一夜觉的民主派议员们终于明白了昨天发生的事件的意义。

拿破仑一走进五百人院大厅，就响起了各种愤怒的叫喊声：

“打倒暴君！打倒独裁者！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立即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

一群代表向他涌来，若干手臂向他伸来，有人拉住了他的衣领，也有的人想要扼住他的咽喉。拿破仑几乎被打个半死。一些掷弹兵推开议员，把拿破仑救出大厅。

拿破仑在一度惊慌失措之后，恢复了他固有的坚毅和果断。他同五百人院主席、他的弟弟吕西安检阅军队。他对军队说，阴谋家聚集的五百人院，用手枪、匕首威胁我，实际上是威胁共

和国。拿破仑向军队直接提出问题：

“士兵们，我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吗？”

底下发出一片肯定的回答。

于是，拿破仑下达命令。缪拉和勒克莱尔率领士兵，敲着鼓，冲入五百人院。当时已是下午5时，夜幕开始降临。鼓声隆隆，代表们四散逃散。一个目击者说：

“正在上演滑稽剧！”

塔列朗则说：“该吃饭了。”

按吕西安的建议，拿破仑让士兵把部分代表抓回来，在刺刀的威胁下开会，通过解散议会的决定。元老院则驯服地继续议事，凌晨1时通过了建立执政府的法令，把共和国的权力交给三个执政者：拿破仑、西哀耶斯、罗歇·迪科。

接着拿破仑发布公告，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宣告了政变已经成功。

雾月十八日政变如此容易成功，说明这不是纯粹政治阴谋的产物，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法国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人民群众不满意，希望革命深入；欧洲封建主不满意，他们要恢复昔日的天堂。资产

阶级迫切需要稳定。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他们将拿破仑推上了统治者的宝座，并“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但在拿破仑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大革命的战斗，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法国已被踩到了拿破仑的脚下。虽然名义上仍是共和国，设了三个执政官，但实际上拿破仑是最完全的独裁者，其余两个执政官都是陪衬。1804年，拿破仑连这块遮羞布也扔掉了，正式宣布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内安法国，外和欧洲，拿破仑泪洒意大利，血腥的史诗并未结束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认为自己肩负伟大的使命，他说：

“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浪漫史，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写它的正史了。在应用伟大原则时，我们仅仅是着眼于那些实际的和切实可行的东

西。这里我们不是在进行抽象的哲学思维。”

歌德则这样评价拿破仑说：

“拿破仑摆布世界，就象洪默尔摆布钢琴一样。……在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就象洪默尔那样，无论演奏的慢板还是快板，是低调还是高调。”

在法国首都巴黎，卢森堡宫会议厅灯火辉煌，已经是深夜了，会议还在进行。大厅内争吵声不断，在夜深人静的巴黎夜晚显得尤其刺耳。这是拿破仑在和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新的宪法原则问题。

宪法起草人是西哀耶斯，这是一位大革命的风云人物。革命前写过《什么是第三等级？》，一举闻名全国，他还是督政府时期五督政之一。他自以为受过大革命风暴的锤炼，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控制一个从没有政治经验，只打过几次胜仗的年纪轻轻的拿破仑——这个一介武夫，将易如反掌。于是他费尽心思制定了一部想限制拿破仑专制权力的宪法草案。西哀耶斯想扮演首要角色，想在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当政时期充当幕后的老政治家。然而西哀耶斯低估了他的对手。

经过雾月政变后已经大权在握的拿破仑对西哀耶斯的笨拙想法，感到可笑。他明确地告诉说，法国职业的政治家是过时了的空谈家，他们不了解时代已经过去。

西哀耶斯在会上说：

“新宪法规定由元老院选出终身大选长，大选长选出两名执政分别负责战争和平，元老院有权罢免大选长。”

拿破仑认为这是一个徒具虚名的职位，他需要的是独裁。他嘲笑西哀耶斯：大选长“仅仅是消瘦的身影，是懒散君主的身影，您能指出世上有这样的庸人竟然低贱到甘心情愿去承受如此的愚弄吗？……从另一方面看，两个执政的状况又如何呢？一个拥有司法部长、内政部长、警察总监、财政部长、国库总监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另一个则管辖海军部长、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围绕着第一个人的是法官、行政官、财政官，等穿长袍的人员；而围绕着第二个人的则都是些带肩章的军人。一个为了军队需要钱，需要征兵，一个却什么也不给。这样的政府是畸形的造物。”

西哀耶斯指责拿破仑说：

“你是要做君主。”

双方争论激烈，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西哀耶斯等人明显已经疲倦不堪，相反拿破仑却精神抖擞，他凭着自己体力和精力的优势，故意把讨论时间延长到深夜，用疲劳来征服他的反对者。

最后，精疲力竭的西哀耶斯终于败给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拿破仑，放弃了大选长制，把文、武两个执政各自行使的职权几乎全部交给拿破仑。

“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正确。”这是拿破仑最喜欢的成语之一。强大的军队于雾月18日和19日为他赢得了法国，正象他们以前在他的指挥下占领了意大利和埃及，后来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一样，根据他的说法，谁也不能要求他加以说明，或者要求分掌政权。西哀耶斯带着失望的心情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雾月18日阴谋的其余参加者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随后所有的人也都认识到了。

诗人歌德对于拿破仑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权力对拿破仑来说，正象乐器对伟大的演员一样。他刚刚掌握了这个乐器，就立即运用它。他

首先是要停止法国西部的内战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南部和北部日益猖獗的匪患。他很着急，因为在春季以前，要把最紧急的事情做完，以便在春季恢复战争。

督政府末期，法国南部和西部有很多强盗集团。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拦劫马车，袭击乘客，接连几个小时用火刑拷问被捉住的人，人们把他们叫“拷人者”，过路人闻风丧胆。这些匪徒打着恢复波旁王朝的旗号，使王党分子有机可乘，迷惑了许多同情旧王朝的人。

拿破仑派出了一些军队，这些军队不仅毫不留情地镇压了直接的罪犯及其帮凶，而且镇压了那些对罪犯姑息纵容或者不采取强硬措施的警官。

对统治者来说，仁慈是有害的。拿破仑一直这样认为。有一次，在1806年被他任命为荷兰国王的他的弟弟路易在他面前夸耀，说他在荷兰很受人们的爱戴，结果这个哥哥严厉地打断他的话，说：

“我的兄弟，当人们说一个国王仁慈的时候，就说明统治没有成功。”

1811年4月，有一份报纸（《法兰西报》）

忽然热情有余地用一种娓娓动听的激动人心的口吻谈到皇帝的“仁慈”，说他由于生了一位继承人，高兴地满足了一位请求者的要求。结果拿破仑大发脾气，马上就给警务大臣写信说：

“罗维戈伯爵先生，是谁允许《法兰西报》今天发表这样荒唐的有关我本人的文章？”

他命令马上把编辑撤职，因为“这个人做的蠢事太多”。“撤除他的报纸编辑职务！”

看来，假如是散布一种相反的议论，说他是野兽，那还会比给他加上仁慈这个不白之冤好些，还可以得到宽恕。这个倒霉的编辑拍马屁没拍成，拍到了马腿上。

实际上，早在1792年8月10日人民群众攻打杜伊勒里宫时，他就表露了这种哲学。拿破仑也在场，当他看到被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吓破了胆的路易十六戴着象征支持革命的红色弗吉尼亚帽走到窗前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时，鄙夷地说道：

“真是一个懦夫！怎么能够放纵这群无赖！应该用大炮消灭五六百人，其余的人就会四散逃命了！”

“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只有本

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具有伟大才能的人。拿破仑确实有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选用的人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役。

雾月 18 日后，在讨论富歇是否继续担任权力很大的警务部长时，发生了分歧。西哀耶斯反对任命富歇，他认为富歇不可靠，又是巴拉斯的心腹。拿破仑主张富歇留任，他说：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时代，对于过去，我们应该仅仅记住好处而忘掉坏处。时间、实际活动和经验造就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并且改变了这些人的素质。”

拿破仑不但重用富歇，而且也重用象塔列朗那样的人。其实拿破仑很熟悉这两个人的为人，明白他们俩都是搞阴谋的能手。拿破仑说：塔列朗轻易不露声色，简直窥不见他的城府；拉纳和缪拉开玩笑说，当塔列朗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如果背后有人踢他，他也是不露声色的。1809 年 1 月 28 日，当拿破仑发现塔列朗有背叛行为时，他大声斥责塔列朗说：

“你无人不出卖，你心中没有神圣不可侵犯

的事，你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出卖的！你只配我把你打得粉碎，如同我打玻璃一样！”

对于富歇，拿破仑有一个正确评价：

“富歇这个人，一定要玩弄阴谋，如同他一定要吃饭一样。”

但是，拿破仑欣赏他们准确的政治判断能力和警务方面的突出才能，并可以为他的帝国服务。拿破仑充分估计了他们在大革命中的经历，认为他们不会把自己出卖给旧王朝，可以有限度地使用他们，但他同时又经常提醒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有一次，他突然对富歇说道：

“你不是也赞成判处路易十六的死刑吗？”

“完全正确！”富歇象往常一样，一面深深鞠躬，一面这样答道，并说：

“这是我给陛下建立的第一个功勋。”

这是一种有深远意味的对话：富歇提醒皇帝，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都是从革命中得来的，虽然这种地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是占据了路易十六空出来的皇位以后，就扼杀了革命；另一个是竭力帮助他做到这一步。现在，1799年，拿破仑特别需要富歇，因为后者非常

熟悉他所背叛的和被他卖给新主子的那些同僚。所以，拿破仑始终有效地控制使用他们，委塔列朗以外交大臣和侍从长重任，封他为本尼托亲王；委富歇为警务大臣，封他为奥特朗托公爵。拿破仑的用人政策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使他在国家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得心应手的执行者。

1800年5月8日，拿破仑在稳定了国内统治、在实行政变以后第一次离开巴黎去进行战争的时候，自己非常清楚，他在法国的专政的未来命运完全取决于正要开始的战争的结局。

拿破仑上台的时候，法国还处在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包围之中。拿破仑在重点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向英、俄、奥三国君主建议尽快停止军事行动，但遭到三国的拒绝。英国是法国最大的敌人，但由于隔着英吉利海峡，法国没有强大的舰队来运送法军直接进攻它。于是拿破仑认为首先应战胜承担主攻任务，对法国威胁最大的奥地利。

奥地利之所以拒绝和谈的建议，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在军事上他们认为有取胜的把握。梅拉斯所率领的奥军已经重新占领了意大利并

准备从意大利发动对法国的进攻。在意大利的法军被切为两段，法军马塞纳的部队被困在热那亚，危在旦夕。

拿破仑面临的对手是一位正规军的将军、司令部的参谋，曾被拿破仑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些正规将军中的一个。这些将军总是痛苦地证明，拿破仑打仗全然不按规则办事。这一次，拿破仑又不按“规则”了。

奥军集中在意大利北方战场的南部，都朝着热那亚那一个方向部署。梅拉斯认为拿破仑不可能从瑞士经过圣伯尔纳峡谷这条险峻的道路进军，因而没有在那里部署重兵设防。然而，第一执政却正是选择了这一条路。

雪山的酷寒，脚下的万丈深渊，雪崩，雪中宿营，暴风雪。对这一切，拿破仑的士兵们于1800年在阿尔卑斯山领略过了。

走在前面的是拉纳的先头部队；跟在后面的，是悬崖峭壁之间展开漫长的行列的拿破仑的全军。

5月末，拿破仑的全军击退弱小的奥军守护峡谷的部队，一个师跟着一个师通过阿尔卑斯山峡谷，突然出现在奥军后方。

拿破仑抓紧每一小时的时间，直奔米兰。1800年6月2日，就进入伦巴底的这个首府；然后又向纵深发展，到处击败了根本没有料到会从这个方向实行主攻的奥军。

梅拉斯急忙离开热那亚去迎击从北部袭来的法军。

亚历山大城和托尔托纳之间是一片大平原。这个平原中间有一个小村庄叫马伦哥。早在1800年初，当拿破仑在巴黎宫里研究意大利北部的详细地图时，就用手指着地图上的这个地方，对自己的将军们说：

“我们应该在这里击溃奥军。”

1800年6月14日，双方主力正是在这个地方相遇。

这个战役在国际政治上，特别是在拿破仑的经历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巴黎和整个法国都感到不安。保王党人每天都在盼望拿破仑会葬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深渊里；人们都知道奥军非常强大，它的炮兵要比法国厉害。传说英军很快就要在旺代登陆。保王党人不仅认为波旁王朝的复辟已经肯定无疑，而且很快就会实现。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信号：拿破仑阵亡或法军战败

的消息。

就是保持中立的欧洲，也密切地注意着事态的发展。那里也在期待着奥军战胜的消息，以便加入反法联盟。波旁王室准备前往巴黎。

拿破仑及其将军、军官和士兵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和遭到失败的可能性：这一次，奥军人数要多得多。当拿破仑在进行越过圣伯尔纳峡谷的艰苦行军的时候，他们就在意大利的城市和乡村以逸待劳。拿破仑身边一共只有约2万人，他在5月间带着越过大圣伯尔纳峡谷的炮兵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因为大部分炮兵用于包围和进攻奥军山地守卫部队，这一部分炮兵现在还在路上。而梅拉斯的部队有3万士兵和弹药充足的强大炮兵，约有大炮100门。即使只有这样少的炮兵，拿破仑还把其中一部分交给了德塞将军，这样一来他就只有15门大炮来对付奥军的100门大炮。

1800年6月14日晨，两军在离马伦哥不远的地方拉开了战幕。奥军从开头几个小时起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威力。法军边战边退，虽然给了敌人重大的打击，但自己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下午2时左右，法军的战斗看来已经完全失败。下午3时以后，欢喜若狂的梅拉斯派了一个信使前往维也纳，报告奥军大获全胜，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已被击溃，以及战利品和俘虏的数目。

法军总部陷入混乱。拿破仑还很镇静，一再强调必须坚持，战斗尚未结束。在4点刚过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德塞将军的师及时赶到，这一个师是被派往南方切断敌人从热那亚撤退的后路的。现在，完成任务后在紧要关头赶到战场。

德塞师的出现大出奥军所料。奥军十分确信自己会获全胜，所以军队在这个时候整批整批的去休息和用午饭。在从天而降的德塞师的打击下，加上拿破仑全军的蜂拥而上，奥军被完全击败。德塞将军本人在攻击开始时被击毙。拿破仑在这一战斗——平生最大的凯旋之一的晚上，含泪说道：

“如果今天能够拥抱德塞，这一天该有多好啊！”

在此之前几小时，当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有人通知他，德塞被打死，从马下掉了下来，当时他说：

“我为什么哭不出呢？”

拿破仑的战友只看见他在战斗结束以后掉过两次眼泪。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若干年以后，当拉纳元帅被炸断了双腿而在他的手上死去的时候。

正当维也纳宫廷收到梅拉斯的第一次使人兴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紧接着第二个信使来到了维也纳，说第一个信使刚走不久，就遭受了很大的失败……奥军又失去了意大利。看来，这一次是永远失去了，危险的敌人看来又是不可战胜的了。

意大利方面的消息是6天以后，即6月20日才传到巴黎政府的。但消息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城市里，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消息。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战争失败和拿破仑阵亡的消息。突然在下午1时，响起了礼炮声，一下、两下、三下；这时，一个信使带来了正式的消息：奥军被彻底粉碎，一半奥军炮兵被俘，成千的俘虏、成千的奥军士兵被杀。意大利又被法国占领了。

这一次，不仅是资产阶级区，就是工人区，情绪也都很高涨：圣·安杜安郊区很久以来就

未曾有过这样热烈的场面了。

在巴黎，在交易所附近，在银行的出纳处附近，在大街上的人群中间，人们欢腾的情绪更加热烈，因为是拿破仑这位于雾月政变扼杀了革命的人得胜了，他现在争得了完全巩固的地位，并且有可能用暴力来镇压“无政府状态”和一切侵犯有产者和私有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不让贵族封建君主制度复辟。

但也有一些人并不高兴：一些最坚决的雅各宾派沉默不语；保王党人表现消沉。但由于首都和外地的高昂的兴奋情绪，这两种人暂时都不被人们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人由于自豪而陶醉，对军事爱国主义得意忘形，许多一直比较清醒的人也患了狂热病。

这一切的狂热当拿破仑回到了巴黎时，就达到了顶点。数不清的人群去欢迎他，甚至有谁对拿破仑表示一点冷淡，都会被群众认为有保王党的嫌疑。

“那里住的是贵族？为什么这所房屋没有张灯结彩？”——群众这样喊道，并打碎房子的玻璃。数不尽的人群整天停留在杜伊勒里宫的周围，用欢呼声呼唤拿破仑。但他没有走到凉台上

去。

法国同奥地利的和平谈判在洛林省的吕内维尔举行，谈判断断续进行了4个月，到1801年2月9日吕内维尔和约签订。莱因河左岸全部归属法国，法国还获得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瑞士、热那亚、伦巴底、皮埃蒙特等地的控制权。

奥地利由于在战场上的失败，不得不接受拿破仑所给予的相当苛刻的和约条款。但是正象它不甘心于1797年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一样，它对吕内维尔和约也是不甘心的。它毕竟要等待时机，来改变这种形势，并再一次出来同拿破仑较量。

由于拿破仑在战场和谈判桌上所取得的胜利，反法联盟已经瓦解，现在只剩下了孤单单的英国。英国既然在作战中失去了所有的盟国而又不能继续用英镑和舰队唆使他人打仗，而自己火中取栗，只能放弃战争手段，接受和谈。1802年3月27日，双方代表在法国东北部的亚眠召开的和平会议上签订了和约。

亚眠和约是延续1/4世纪的英、法战争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和约。和约的要点是：英国归还大部分占领的殖民地、撤出马耳他和干涉荷

兰、德意志、意大利的内政。这对英国很不利，只是由于孤立，才被迫做出了这样重大的让步。

统治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在9年中间用了几百万经费去装备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军队，派遣了许多舰队去各大洋，难道就是为了签订这样一个和约吗？英国并没有战败，拿破仑也知道英国很快就会破坏和约的，并做好了再次战争的准备。

尽管如此，亚眠和约结束了欧洲的十年烽火，确立了法国在西欧的优势。现在的欧洲，无论在大陆还是海上都没有军事行动了，出现了连续几年的和平时期。

胜利和和平使拿破仑成为一位受到普遍颂扬的英雄。为了表彰拿破仑的业绩，1802年8月2日法国议会做出“全民决定”，宣布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

科西嘉怪物来了，惊呆了的欧洲屏息细听。英国弄巧成拙，沙皇痛哭流涕，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热烈拥抱，相见恨晚

亚眠和约只给战争带来了短暂的间隙。1803年3月，拿破仑又拔剑出鞘，一直到他的长篇血腥史诗的结束。

和约曾经给英国大资产阶级带来美好的希望，他们欢喜若狂，以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商品就可以打入广大的市场，然而他们失望了，拿破仑控制的欧洲大陆根本就不允许他们染指，而且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存。醒悟过来后，英国就毫不犹豫地撕毁和约。

但不仅在英国，就是在巴黎，亚眠和约也开始动摇并遭到破坏。拿破仑原以为，英国在签订和约以后就不会干预欧洲事务了，最终同意他在欧洲大陆上的未来的霸权。但他突然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要英国对拿破仑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是办不到的。

3月13日，拿破仑恫吓英国大使说：

“英国人想要战争，但是如果他们先拔剑出

鞘，那就让他们知道，我要最后一个插剑入鞘。”

最后拿破仑又威胁说：

“要么归还马耳他岛，要么就是战争。”

英国政府对他这个恫吓的回答是加强扩充海军，大力进行备战活动，组织第三次反法联盟。血腥的屠杀又一次笼罩在欧洲的大地上。

英国准备战争的同时，又拿出自己的卑鄙的杀手锏——暗杀拿破仑。

1803年8月一个漆黑的夜里，叛乱头子卡杜达尔及其同伙乘坐一只英国船在诺曼底海岸登陆，然后立即前往巴黎。英国人给了他们大量的金钱，供他们活动。

正当密谋紧锣密鼓进行时，拿破仑的警察局发觉了，逐日向第一执政报告所发现的新情况。

那些天，拿破仑几乎一直大发雷霆。他知道这是英国人指使干的，他也知道波旁王族的人在密谋中起领导作用。他已经知道卡杜达尔将军在1803年夏末就被英国人送到了法国，他是带着英国的钱和路易十六的弟弟指令来的。拿破仑有一次发脾气时说道，波旁王朝以为他不会对他们的谋杀活动进行报复，那是妄想。

这个吼声，塔列朗也听到了，他为了阿谀奉承，同时为了自身安全，向憎恨他的保王党人报复起见，便向拿破仑说：

“显然波旁家族以为，您的血没有他们的血那样高贵。”

这句话把拿破仑气得简直达到发狂的程度。这时第一次提到了当甘公爵的名字，这是拿破仑唯一可以找到的波旁王室的重要成员，当时正旅居中立国巴登。狂怒的拿破仑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决定去绑架当甘公爵。

当甘公爵住在巴登的埃登海姆城，根本没有参予谋杀拿破仑。拿破仑不管这些，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通过波旁王室一位著名人物的鲜血来为自己的被刺报复。

1804年3月14日，一队法国宪兵马队闯入巴登，绑架了当甘公爵。法国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当甘公爵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请求交给执政。庭长想以法庭名义给拿破仑写一份呈请减刑的报告，但宫里派去监视的将军一把夺过笔，声称：

“您的事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应该由我办了。”

凌晨3点，当甘公爵被拖出监狱，被枪杀。

当甘之死震惊法国，震惊了全欧洲。保王党人、著名文学家夏多勃里昂已经同意为拿破仑政权服务，并且接受了一项外交职务，现在却提出了辞呈。他写道：“这个杀害一开始就以恐怖僵冷了所有人的心。人们害怕罗伯斯庇尔的重现。巴黎又一次看到了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那一天。波拿巴的部下、他的朋友和亲属都为他的行为惊骇丧胆。”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当甘公爵的处死而拍手称快。保民院议员居雷说：

“我很高兴，波拿巴与国民公会同样是材料制成的。”

他的意思是，拿破仑与处死路易十六的法官一样，也是一个弑君者，既然是弑君者，也就不必害怕拿破仑会和旧王朝的合作了。

枪杀当甘公爵引起了旧世界的仇恨，加速了新的反法联盟的建立，但也给拿破仑带来了与旧制度斗争坚决的声誉，为他建立波拿巴王朝铺平了道路。

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通过决议，最后又由全民投票批准：

“法兰西共和国把全权委托给一个皇帝，他的称号是法兰西人的皇帝。”

经过如此伟大的大革命洗礼的法国人民以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拥护拿破仑为自己的皇帝。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拉法叶特说，他所感到震惊还不是一个人的篡权，而是举国的驯服。

对于英国和保王党谋杀拿破仑的阴谋和拿破仑登上皇帝王座，当时巴黎有句妙语：

“他们来到法国是想给它一位国王，而结果却给了它一位皇帝。”

英国人弄巧成拙，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英国一计不成，二计又生：用英镑代替暗杀，组织大陆其它国家进攻法国。拿破仑眼看第三次反法联盟正在逐步组织起来，于是上台伊始就在布伦港附近建立庞大的军营，积极准备先横渡英吉利海峡，打败法国最凶恶的敌人。几万工人不停地建造新军舰以及登陆所需的一切。英国紧张得不得了，日夜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对岸热火朝天的工地。

1805年秋季到来了。拿破仑亲临布伦军营

向海军将领宣布，现在已经不是需要三天，而是两天，甚至只需一天。如果英吉利海峡风平浪静，他就可以在英国登陆。但突然几乎是在同一天内，正在布伦军营中的皇帝接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个是海军上将维尔纳夫不能很快执行他的命令，一个是俄军已经出发前来与奥军会师，奥军准备对他以及他的德意志盟国展开进攻，敌军正在向西方推进。

拿破仑立刻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新的决定：立刻召见自己的总务官达律，要他向各军团司令官传达事先拟定的新的作战部署：不是进攻英国，而是进攻奥国和俄国。这是8月27日的事。

“即使我十五天以后不能在伦敦，也要在11月中旬在维也纳出现。”拿破仑早就做好了应变准备。伦敦得救了，但维也纳却要为此付出代价。

接连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的作战部署。他向一切方面发出命令，要募集新兵来补充后备力量，要军队在经过法国和巴伐利亚去迎击敌人期间保证供应。信使带着新的外交指令、恫吓、命令、建议和诱饵，前往柏林、马德里、德

累斯顿、阿姆斯特丹。

巴黎呈现出一片惶惶不安和某种惊慌失措的景象：有人向拿破仑报告说，商人、股票经纪人、工业家都在暗中抱怨他这样热衷于吞并他国领土和他的不顾一切的对外政策，认为全欧发起新的大规模的反法战争是他的罪过。尽管这种抱怨是私下发出的，不敢公开表示出来，但确实已经存在。

尽管如此，几天以后，拿破仑还是利用了他所建立的严密的军事组织，动员了庞大的布伦军营，安排好了准备远征的军队，用新的编制加强了这支军队，从英吉利海峡岸边出发，经过整个法国，开往与法国结成联盟的巴伐利亚。

拿破仑进军非常迅速，从北面绕过了驻扎在多瑙河上的奥军。

第三次反法联盟的主要成员早在1804年中就原则上决定成立这个联盟，过了一年半，即在1805年秋才走上战场。原因一个是没准备好，另一个是内部的矛盾性。

普鲁士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既害怕法国革命向它境内蔓延，一心想扑灭法国革命并乘机掠夺它的领土，又害怕在反法

战争中承受法国打击力量的主要压力。此外普鲁士对英国的支援很表怀疑，对奥地利的复苏存有戒心。

奥地利在两次反法战争中失利之后，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处心积虑地加强和改组自己的军队，此时已恢复了元气，想乘着拿破仑埋头于横渡英吉利海峡出征之机，在多瑙河打防御战，而在意大利作最猛烈的攻击，以便夺回在意大利失去的阵地。

拿破仑看出了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决定集中力量击溃奥地利，极力促使普鲁士中立。

8月29日，拿破仑命令帝国大军17.6万人从海峡沿岸用强行军前往多瑙河。法军以惊人的速度渡过莱茵河，将奥军部队前锋主力包围在乌尔姆高地。围守乌尔姆的奥军陷入绝境，10月20日，3.3万名奥军在自己的统帅麦克带领下投降。拿破仑的士兵忘掉了连日来在泥泞中急行军的疲劳，向自己的统帅欢呼：

“我们的皇上创造了新的战争艺术，不用武器，而用我们的双腿来作战。”

士兵们对自己的统帅非常爱戴，还给他起了许多亲热的、温存的、可爱的绰号。拿破仑是

威震四方的恺撒，欧洲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皇帝们在他面前匍伏跪拜，但士兵们把他看成一名士兵，他们在私下交谈中间，称他为“小伍长”、“小和尚”等。

1805年10月，即当麦克困守乌尔姆，准备投降和已经率领全军投降的时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正在柏林敦促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拿破仑宣战。

威廉战战兢兢，犹豫不决。他既害怕亚历山大，又怕拿破仑。亚历山大甚至想用威胁的口吻暗示俄军将强行通过普鲁士领土。但当这位国王出乎意料地强硬并表示准备反击时，亚历山大又采用软攻。

恰巧这时又传来消息说，拿破仑军队经过普鲁士南部领地。破坏中立已经成为事实，国王一方面因为受到拿破仑的专横的侮辱，另一方面又受到拿破仑必然失败的舆论影响，就同意站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方面来，投入战争。双方订立秘密条约，普鲁士向拿破仑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接着演出了极端荒唐的一场戏：威廉、王后路易莎和亚历山大来到弗里德里希二世陵墓

里，在他的棺木前宣誓永远友好。这出戏富有当时流行的那种多情善感的情调，具有绝妙的讽刺意味。俄国以前就同这位弗里得里希二世打过7年的仗，不是弗里得里希打俄国人，便是俄国人狠狠地打弗里得里希，并且占领过柏林，险些迫使国王自杀。而这样可笑地表演俄德永恒的热烈的友谊之后，亚历山大就离开了柏林，直赴奥地利战场。

在英国和奥国，人们欢欣若狂：如果普鲁士出现在战场上，那么拿破仑军队就会完蛋。当报纸欣慰地谈到俄普两国在弗里得里希大帝灵前的感人的誓言时，人们就是这样估计的。

拿破仑取得乌尔姆战役胜利后，马不停蹄迅速向维也纳推进。11月19日，拿破仑以缪拉的骑兵队为先导，在近卫军护卫下，进入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住进富丽堂皇的皇宫。惊慌失措的奥皇弗兰茨请求媾和，被拿破仑拒绝了，因为奥地利战役还没有结束，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等待拿破仑去打赢。

奥皇弗兰茨逃往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会晤。拿破仑在维也纳获得丰富的补给，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命令缪拉、拉纳、

苏尔特三军加速追击敌人。11月19日，缪拉在布尔诺东面的13英里的奥斯特里茨村前方高地与奥军相遇。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上称为三皇会战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就要在这个地方发生了。

形势对拿破仑并不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二世都在这里。俄军7万人，奥军1万人，而且俄军的补充队伍源源不断地向这里开来，奥军司令部也已决定从意大利战线抽调大部队到这里增援。更危险的是，在法军侧面集结的10余万普军正蠢蠢欲动，伺机从西北部向法军发动猛烈进攻。

远离本国的拿破仑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时间越来越对拿破仑不利。拿破仑充分估计到面临的种种危险，急于在俄奥援军到来和普鲁士参战前在这里进行一场大会战。此时拿破仑已经知道普鲁士的豪格维茨正带着最后通牒来见他，因为他进行决战的心情更为迫切。拿破仑象演员一样，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张皇失措、软弱无能、尤其害怕作战的人。他必须使敌人相信，正是在这个时候容易粉碎法国军队，这样就会驱使俄军立即向他发起进攻。

他着手实行自己的计谋，命令前哨开始撤退，又建议与亚历山大单独会面，请求议和，并派一全权代表进行谈判。

俄军司令部一片欢呼：拿破仑胆怯了！拿破仑打得精疲力尽，要完蛋了！现在主要的是不要放过他。

实际上，拿破仑的这些行动和他本人这样地不相象，这样地反常，这样地有失身分，以致使人觉得，这位傲慢的皇帝、世界上第一名统帅，假如不是事情逼得他非如此不行，他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想到要这样做的。

亚历山大拒绝与拿破仑会见，派了道戈路柯夫公爵去见他。道戈路柯夫表现很傲慢，态度强硬不可一世，把法国皇帝当成了“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贵族”。拿破仑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见时，这样挖苦说。

拿破仑继续天才地表演着这个喜剧，装出一副不安和忧伤的样子。同时他也知道，不能表演过火，世界上的一切，包括道戈路柯夫的愚蠢，也是有限度的，他在会见的最后时刻声称，不能同意放弃意大利和其它占领地的条件。但这个拒绝本身是以这样一种形式表达出来的：

它加深了而不是削弱了有关拿破仑信心不足和胆怯的总的印象。

在道戈路柯夫兴奋地报告了他的印象后，联军军营中的一切动摇现象都结束了：决定立即向正在退却的、削弱的、张皇失措的拿破仑进攻，把他打垮。

1805年12月2日，恰恰是在拿破仑加冕一年以后，在奥斯特里茨村以西、维也纳以北120公里的普拉琴高地周围的丘陵地带，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大战。这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战之一，也是拿破仑史诗上最著名的大战之一。这次大战自始至终都是由拿破仑指挥的，突出地表现了他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非凡才能，并使拿破仑赢得了欧洲第一名将的荣誉。同时，这次战役也是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光辉典范，他成功地利用了外交手段，积极影响形势发展，为自己胜利创造条件。

大战前夕，普鲁士的使节豪格维茨到达了法国军营。他是捧着普鲁士国王给拿破仑的最后通牒赶来的。也许，当时拿破仑并不清楚最后通牒的具体内容，但他立刻意识到普鲁士使者选择这个时间来将对法国不利。因此，他在一切

安排就绪之前，避而不见豪格维茨，使普鲁士国王的最后通牒一时没有送到拿破仑手中。为了运用外交手段，拿破仑指示，把普鲁士使节送到维也纳去，由外交大臣塔利朗与他周旋，以便拖延时日，借此达到使普鲁士暂时无法破坏中立的目的。

大战前一天，拿破仑向士兵们发布动员令。在这个动员令中，拿破仑一反常态，公开把自己的意图暴露给敌人，并让战士们知道他的打算。这样做的结果是：敌人以为他又在玩弄花招，企图迫使联军改变作战计划，从而更加坚定了从南翼实施主攻的决心；而法国士兵听到这个动员令，则认为是统帅对自己的信任和鼓舞，对拿破仑更加忠诚和爱戴。

晚上9点钟，拿破仑偕少数随从视察大战前的部队。士兵们点起火把，把矮个子统帅围在当中，欢呼着，跳跃着，大声高喊：

“拿破仑万岁！大军万岁！帝国万岁！”

无数的火把照亮了夜空，高昂的欢呼声响彻大地。这时，老兵们一个个地走出来，恭恭敬敬地请求皇帝：不要站在火线上，不必亲临前线战斗，而请他以旁观者身分观看战斗。拿破仑感

到很诧异，问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夺取敌人的军旗与火炮来庆祝陛下的纪念日。”一个老兵脱口而出。

士兵们马上意识到，明天正是皇帝加冕一周年的纪念日，情绪一下子激昂起来。

拿破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在返回大本营的路上，多次对侍卫人员说道，这是他有生以来最荣耀、最有意义的一夜。

1805年12月2日，世界近代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一页揭开了。

东方刚刚发白，浓雾笼罩着战场，而7.3万名决心以死效忠的法国士兵，已经准备就绪，正在严阵以待。早上7时左右，穿灰色衣服的俄军和穿白色衣服的奥军，各自排列成密集的队形，展开在大约12公里的正面上，向法军发起进攻。

战线南段，联军进军非常迅速，主要原因是其兵力是法军的4倍，很快就突破拿破仑事前的预料地点。拿破仑迅速调整，将位于该段的第二线的第三军投入战斗，联军主力被迫后退。刚

愎自用的沙皇按捺不住，没有征求联军将领的意见，便命令占领普拉琴高地上的这个军放弃阵地，前去增援南翼的联军。

上午9时左右，拿破仑透过逐渐消散的浓雾，看到俄军正自动撤离普拉琴高地，他立即意识到敌人犯了放弃中央高地的严重错误。拿破仑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于是他立即命令两个师占领高地，从而把敌军切成两段。俄军侧面遭到攻击，立时大乱，向四方溃逃。法军控制高地以后，全面发起进攻，把俄军几团人逼入半冰冻的池塘里，有的在池塘里淹死了，有的被法军的霰弹击毙，其余的当了俘虏。

弗兰茨和亚历山大两位皇帝在全军覆灭以前就逃之夭夭。他们的侍从人员，也顾不上皇上的安危，而把两位至尊丢在路上，各自逃命。两位皇帝从战场慌忙逃跑，很快就骑着马各奔一方了。

短暂的冬日已近黄昏，整天发出耀眼光芒的太阳下山了，亚历山大和弗兰茨在昏暗中得救了，没有被俘。亚历山大象得了疟疾一样，全身发抖。他已经不能自己，哭了起来。他飞快地跑了好几天。

受伤的库图佐夫也险些被俘。

夜晚降临了。一切都结束了。拿破仑在一大群元帅、近卫军将军和副官的伴随下，在从四面八方跑到皇帝面前来的士兵的热烈欢呼声中，不断地踩着难以数计的人和马的尸体，穿过广阔的平原。俄军和奥军损失近1.5万人，2万人左右被俘，几乎全部炮兵被消灭，而最重要的是，俄奥联军事实上已被消灭：其中3/4都四散逃命，丢掉巨大的辎重队、全部弹药和粮食。法军损失不到9000人。

不久，奥国皇帝弗兰茨就向亚历山大表示，继续进行战争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大对此表示同意。

弗兰茨给胜利者寄去一封信，要求个人会面。拿破仑就在离奥斯特里茨不远的自己的野营里，接见了。拿破仑很礼貌，但要求俄军残余部队立即撤出奥地利，只和奥地利和平谈判。弗兰茨当然无条件同意。

欧洲列强的第三次反法联盟就这样宣告解体了。

此时，远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伦敦，首相庇特正以十分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决战的消息。麦

克在乌尔姆的覆灭，拿破仑进入维也纳，库图佐夫的狼狈逃跑，都使庇特感到十分苦恼。但普鲁士表示同意加入同盟，又使他生了一线希望。

然而，没过几天，希望就破灭了。英国从荷兰的报纸上看到了致命的消息：第三次反法联盟在奥斯特里茨血战中可耻地崩溃了。英国朝野大哗。反对党要求庇特下野，议员们大声谴责他使英国蒙受耻辱，谴责他耗费几百万黄金建立起来的联盟落得个土崩瓦解的下场。庇特经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就此一病不起，过了几个星期便一命呜呼了。

正象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奥斯特里茨战役也把庇特这个拿破仑的最顽强、最有才干的敌人送上了天。以福克斯为首的新内阁决定同拿破仑媾和。

普鲁士的外交使节豪格维茨带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最后通牒，经过很长时间终于来到维也纳，但他急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忘掉此行的目的，面带着甜蜜的微笑拜会了拿破仑。他对拿破仑深深鞠躬，对他击溃所有对手表示祝贺。

拿破仑打断豪格维茨的祝贺：

“这是命运女神把你祝贺的对象改变了！”

拿破仑责备普鲁士背信弃义，并乘机逼迫普鲁士与法国结盟，普鲁士的部分领土交给法国及其盟国，而法国则把汉诺威交给它。

然而到了1806年春，普鲁士国王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拿破仑的军队仍然驻在汉诺威，根本没打算给普鲁士。威廉三世正在这时又获悉，庇特之后的英国福克斯政府正在巴黎与法国议和。拿破仑曾向英国表示，只要在他所希望的基础上订立和约，他就把汉诺威还给英国。普鲁士宫廷和政府都看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欺骗。特别是那些在1805年一年当中白白劝说威廉倒向第三次联盟的人对此更为愤恨。他们断言，当时如果这样做了，便可以预防奥斯特里茨的失败，也不致于使普鲁士今天在同拿破仑面对面斗争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时，拿破仑决定把自己对法国西部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统治固定下来，为此他把16个西部和南部的德意志小邦组成莱茵联邦。

拿破仑把新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的新的掠夺行为，使普鲁士王室和政府大为震动并深感不安。莱茵同盟使拿破仑的权力深入到德国

的心脏，直接威胁了普鲁士的完整。特别危险的是，拿破仑建立莱茵同盟的同时，又任命了一些重要官员。

这些人不是封臣，而是拿破仑的全权代理人 and 总督。整个欧洲都清楚这一点。

法英和约没有进展，欧洲却突然传遍了一个消息：英国唯一的一个竭力主张同法国议和的外交大臣福克斯于9月13日逝世了。

普鲁士的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中间，不满和气愤的情绪非常厉害。他们责备国王是胆小鬼，谴责豪格维茨是叛徒。贵族仇恨拿破仑，只把他看成是破坏旧秩序的直接罪人；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不安地看到，拿破仑高筑自己附庸国与普鲁士的关税壁垒，为了法国工业利益而任意损害其它各国的工业利益。普鲁士的军官和将军们热血沸腾，竭力要对自己遭受的侮辱、欺骗以及拿破仑到处公开表示的那种鄙视进行报复。

普鲁士国王也认识到，不管你对拿破仑怎样让步，他都是要发动战争的。因此他下决心对法开战。普鲁士军官在法国大使馆台阶上磨刀霍霍，王后骑马到各团检阅，鼓舞士气。

拿破仑密切注视着普鲁士的备战活动。他计划诱逼普鲁士首先出来挑战并极力安抚和拉拢战败的奥地利，促使奥地利效法普鲁士以往的做法，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1806年夏季，欧洲已不怀疑一场大规模的普法战争即将爆发。

一队队高唱着爱国歌曲的普鲁士军队经过柏林和马德堡，向西方开去，路易莎王后出来迎接，并成了示威的中心人物。国王威廉检阅军队，并向拿破仑发出照会，要求法军调离普鲁士边境。拿破仑对这个照会的回答是亲自率领自己的大军越过了驻有普鲁士军队的萨克森边境。

拿破仑空前迅速的闪电般进军速度惊呆了普鲁士，他们难以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两种不同经济结构、两种不同的军事组织的差异。拿破仑的军队是革命的队伍，而普鲁士的军队是封建农奴制的军队，士兵们坚信，不管他们作战多么勇敢，多么努力，都根本不会改变自己农奴的命运，军官之所以成为军官，只因为他是贵族。

而更为可笑的是，普鲁士上层统治集团对

他们这支过时军队赞扬备至。他们问，拿破仑到目前为止打败了些什么人？还不是胆小的多民族的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埃及近卫骑兵这种野蛮人，软弱的意大利人，以及同土耳其人和近卫骑兵几乎一样野蛮的俄国人。如果拿破仑同弗里德里希二世建立起来的军队交锋，他的荣誉不就会烟消云散了吗？

宫廷官员、军事长官、将军、上流社会人士、路易莎王后及其仆从，所有这些人的轻率、幻想和大言不惭的情绪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他们不愿考虑到拿破仑不仅可以从法国而且可以从他已经征服的几个富庶大国索取资财；他们以为，只要普军给法国勇敢一击，拿破仑就会垮台。普军年老的总司令——一个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农奴主，甚至荒唐地认为，只要自己发一个威胁性的宣言就会使法国君主制崩溃，保王党在后方发动暴动，把拿破仑推翻，使波旁王朝复辟。牧师们毫不费力地保证说，一贯对霍享索伦王朝友好的上帝一定会保佑普鲁士。

看来，上帝这次并不太友好。法军开始同普军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小的接触，普军损失微乎其微，但不幸的是路易亲王被打死。这些消息传

到柏林时，却产生了地震式的效应。整个社会气氛发生彻底的变化。不仅自吹自擂的声音消失了，而且很快就张皇失措、胆战心惊了。

1806年10月14日，决定普鲁士命运的决战在耶拿城拉开了。战斗在拂晓时开始，到下午时普军就全面溃退了。普军伤亡特别大，士气高涨的法军骑兵大肆屠杀，不听求饶的呼喊，也不抓俘虏。普军全军覆灭了，少数残余部队保存了士兵的外貌，其余的全部被打死或被俘，或者下落不明。

刚得到耶拿惨败消息的普王惊魂未定，就又从逃兵中得知，普军又在奥埃尔施泰特遭到不幸，奥军在那儿又被拿破仑麾下元帅达乌击溃。

10月14日这一天，普鲁士军队在两次战斗中被拿破仑和达乌元帅击溃，几乎全军覆灭。欧洲任何一个人，甚至普鲁士的死敌，都根本没有预料到结局会这么快就到来了，这只是拿破仑入侵后6天的事情。

普鲁士的残余部队跑得更乱了。法军继续追击，并且沿路收集了满载粮食的辎重车、马车、马匹和完全能够使用的大炮，以及逃命者沿

路抛弃的一切东西。

拿破仑率军长驱直入柏林。

整个普鲁士充满了一种失败的情绪。拥有大量军事物资的坚固堡垒斯潘达，在拉纳元帅向他们提出投降要求时，就毫不抵抗地投降了。什切青，这是普鲁士一个坚固的堡垒，驻有一个炮队和大批守卫部队（6000多人），城堡里存有丰富的食粮，周围有很多大炮护卫着，但在法军骠骑兵将军拉沙尔的要求下，也不发一枪地向一门大炮都没有的法军投降了。各处普鲁士军队残余部队的将军、军官和士兵立即充满了最绝望的惊慌心情。称颂一时的纪律荡然无存，普鲁士士兵成千地向法军投降。

将军和军官们是那样的泄气，连胜利者都觉得这种泄气现象是空前未有的。似乎这些人不是两个星期以前十分傲慢而自信地要消灭拿破仑的那些人了。

1806年10月27日，即战争开始后19天，拿破仑率领着帝国的元帅和士兵得意洋洋进入柏林。市长把首都的钥匙交给拿破仑，并且请求他赦免柏林。拿破仑下令商店继续营业，生活照常进行。

市民们怀着恐惧和尊敬的心情迎接皇帝，表现出绝对地服从。

普鲁士国王、路易莎王后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小朝廷到处流浪。拿破仑命令在法国报纸上刊登文章，尽情地讥讽和恶毒地嘲笑路易莎王后，称她为使普鲁士遭到不幸的罪魁祸首。

胜利者的这些恶毒敌对行为并未妨碍弗里得里希·威廉三世写一封充满敬意的信给拿破仑，国王在信中，表示他希望，拿破仑皇帝陛下会满意波茨坦王宫中舒适的设备，会满意那里的一切。

这个曾夸耀弗里得里希二世的传统的军队，这个有着最完善的行政机构的国家，其文化水平并不低于当时欧洲任何一国，突然变成了一堆废物。整个欧洲都极为震惊。德意志各国就更不用说了：赶快相继派人到波茨坦宫向拿破仑表明自己是完全顺从的。

在10月和11月的日子里，拿破仑生活在幸福愉快的气氛中，每天都有关于要塞投降和普鲁士残余部队投降的消息传到柏林和波茨坦宫来，很多人在他面前跪拜，祈求宽恕和庇护，选侯、公爵和国王向他阿谀谄媚，保证自己有一

片忠诚之心。

越是这样，越是触动了拿破仑的心头病，自己最可恨的敌人英国还没有顺从，必须给它以致命的打击。现在占领了普鲁士以后，拿破仑认为，这种打击可能实现了。于是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在柏林签署了著名的大陆封锁令，对英国实行封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封锁，目的是饿死英国人。

欧洲以沉默的、恐惧的顺从态度接受了封锁法令。在普鲁士被击溃以后，还没有谁苏醒过来，很多人都惶恐地计算着自己的日子，等待着灭亡的到来。

英国知道，现在的斗争是殊死的搏斗。于是它又去找它在1798年和1805年两次找过的那个大国。它又答应亚历山大一世说，如果他再恢复同拿破仑的斗争并且企图拯救普鲁士的话，它就给他财政上的支持。英国内阁也去找奥国，但是奥国还没有从可怕的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的惨败中恢复过来，并且幸灾乐祸地看着普鲁士的毁灭，因为普鲁士在1805年没有参加第三次反法联盟，也曾以同样的态度看着奥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的灾难。

尽管这样，而在德得堡，发动战争的工作还是充分准备就绪了。

拿破仑通过自己在彼得堡的间谍知道英国金钱资助下的沙皇军队正蠢蠢欲动。拿破仑在柏林组织了一个临时管理巨大帝国的中心机构之后，就立即着手解决两个困难的任务：第一，制订实施刚宣布的大陆封锁的措施；第二，准备军队在最近的将来同俄国军队进行战斗，因为俄国军队一定会去援助被击溃的普鲁士。

拿破仑下令占领古老的沿海的商业城市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法军沿着德国海和波罗的海海岸前进，占领了城市和沿海的村庄，逮捕了遇见的英国人，没收了英国商品，在各处设立守卫的岗哨和骑兵侦察队，以便破获英国的走私活动。

同时拿破仑大力准备侵入波兰，并向已经开到东普鲁士边境的俄国军队发动进攻。

俄国人怀着惊恐的心情注意到了普鲁士空前迅速的灭亡，意识到面临着多么强大的敌人。同时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谁的真正的援助：因为这时，1806年年底，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彼得堡派出了 10 万人和大批炮队以及若干哥萨克团队去与拿破仑作战。

双方在波兰进行了激烈的艾劳会战，损失都很惨重，均未取胜，俄军退往弗里德兰。于是在 1807 年 6 月 14 日，法俄两军在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5 天之后俄军打起白旗请求停战。

此时正在提尔西特的沙皇亚历山大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认为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了。6 月 14 日夜晚，他还亲自离开提尔西特去迎接俄国后备部队，那时正是俄军在弗里德兰附近的阿勒河的波涛中被淹死的时候，而从 15 日早上起，提尔西特已经流传关于遭到惨败的初步消息：俄国近卫军 1/3 在弗里德兰附近被消灭了。宫廷已经惊慌失措了，不知该怎么办。流言被准确的消息代替了：俄军在弗里德兰遭到的可怕毁灭，几乎与 1805 年在奥斯特里茨的遭遇差不多；拿破仑率领大军可以立即侵入俄国。在俄军高级人员中间充满着一片恐怖气氛。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似乎再过半个小时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拿破仑同意了俄国签订和约的建议。他的

作战目的已经达到，普鲁士已被完全粉碎，而俄国可能同意接受大陆封锁政策，从而进入拿破仑所领导的政治体系。他暂时对于亚历山大已经别无所求了。

亚历山大暂时住在沙弗里。在使者还没有带回停战和约的那些严酷日子里，亚历山大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那种心情比奥斯特里茨战斗之后更坏。

是的，整个欧洲这时都吓得失魂落魄、诚惶诚恐。

在沙弗里聚集在沙皇周围的宫廷人员，都象白杨树叶似的在那里发抖，害怕拿破仑先头部队攻来。

当亚历山大及其随从人员知道拿破仑同意停战和签订和约的时候，都欢欣若狂。亚历山大仿佛得到大赦似的告诉法国皇帝，他亚历山大热烈地希望和拿破仑订立亲密的联盟，并且只有法俄联盟才能给世界带来幸福与和平。在批准停战条款后，他渴望与拿破仑亲自会见。

1807年6月25日下午两点钟，两国皇帝举行了第一次会见。为了使亚历山大皇帝不必走到法军所占的涅曼河岸，而拿破仑不必走到俄

国的涅曼河岸，在河中心安置了一座木筏，上面设有两个富丽堂皇的亭子。

在法军占领的岸边，排列着拿破仑的全部近卫军，而在俄国的岸边，排列着亚历山大的为数不多的侍从人员。

在场的每一位俄国人眼睛盯着对岸，屏住呼吸，诚惶诚恐。这是会见最伟大的统帅、政治家、立法家、行政官和征服者，他打败了全欧洲的军队，并且已经两次打败了俄国的军队，如今就陈兵于俄国的边境。这是会见一个具有绝对统治一切与他有关的东西的才能的人，一个具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人。这样一位巨人，怎能不令他们恐惧而又崇敬呢？终于盼到了，哪怕只看一眼，也能使他们宽心，自己究竟是败在一个什么样的人手里。

等待着，等待着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啊！看见了，看见在自己老近卫队排列成的两行人中间飞驰过去的拿破仑，热情的欢呼声和喊叫声在他周围震响，连站在对岸引颈长视的他们也感到震耳欲聋。他的警卫队和随从人员至少有 400 名骑士，威武雄壮。

在这一刹那，盛大的场面战胜了一切情感。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河的对岸，投射到一只船上，这只船载着一位奇人，一位从亚历山大大帝和朱理·恺撒以来空前的统帅，他的多种多样的才能和征服文明国家的光荣使他大大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

拿破仑来了，连俄国诗人普希金也不禁赞叹：

他，在奥斯特里茨平原上
用手赶走了北方的民兵，
俄国人第一次在死亡面前逃命，
他，在提尔西特
带着胜利的条约
也带着和平和耻辱，
站在年轻的沙皇面前……

当两位皇帝同时登上木筏，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热烈拥抱后，开口就问：

“皇帝，我们为什么打仗？”

亚历山大回答道：

“我和你一样痛恨英国人，在你反对英国人的一切活动中，我将成为你的助手。”

拿破仑高兴地说：

“这样，一切都可以解决了，和平已经完全

确立。”

两位皇帝在木筏上的亭子里停留了1小时50分钟。等在俄军所在的涅曼河岸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始终抱着希望，以为他也会被召去。拿破仑只是在第二天才允许同他会见，并且以十分鄙视的态度对待他。分别的时候，法国皇帝邀请亚历山大共进午餐，没有邀请普鲁士国王，只是勉强地对他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过身来。

6月26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再次会面。拿破仑对他说：

“我当你的秘书，你当我的秘书。”

亚历山大请求拿破仑给普鲁士留下点东西，尽管它有些应该受到惩罚的毛病。拿破仑毫不客气地申斥和痛骂威廉：

“卑下的国王，卑下的民族，卑下的军队，这个国家欺骗所有的人，它不值得存在下去。”

吓得魂不附体的普鲁士国王决定使用一切手段。他决定利用自己妻子的美色，于是特别写信叫路易莎王后这位著名的美人到提尔西特来。

拿破仑是在骑马蹀躞之后直接到宫中来会

见她的。他身穿普通的轻骑兵的制服，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子，而王后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盛装出迎。他们的会见由他们单独进行了很久。

最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再也忍受不住他自己在注视着他的群臣前的可耻境地，大胆地走了进去，皇帝和王后的亲密谈话被打断了，路易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如果普鲁士国王再迟一点走进房间来，我就会不得不让出马德堡。”拿破仑后来对自己的元帅们开玩笑说。

1807年7月8日，终于签订了使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感到屈辱的提尔西特和约。

拿破仑走上了他的顶峰。欧洲心灵深处永远除不去的印迹刻下了这样一幅场景：

突然一下，惊骇中的欧洲屏息细听，大军源源开拔了，炮队纷纷滚动了，长江大河上建立了浮桥，狂风中驰骋着漫山遍野的骑兵，叫喊声，号角声，所有的宝座全震动了，所有王国的国境线全在地图上摇晃起来了，人们听到一条超人的宝剑的出鞘声，人们看见他屹立在天边，手里烈焰飞腾，眼睛里光芒四射，霹雳一声，展开了他的双翼……

惊人的举措，维也纳举行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伊比利亚却高奏拿破仑的丧歌

1810年3月11日，在维也纳一座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教堂里，正在举行着盛大的结婚仪式，奥国皇帝、整个宫廷、所有的外交使团、大臣和将军们都出席了。这是18岁的公主和拿破仑皇帝举行婚礼。

新娘从来没有见过新郎，甚至在结婚的这一天也没有见到他，因为据说他认为即使是象自己结婚这种特殊的情况，自己亲自去一趟维也纳也是多余的庸人自扰。但是维也纳容忍了这种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贝尔蒂埃元帅和查理大公两人共同完美地做了新郎应该做的一切仪式。

读者一定会问并且会有些惊异：怎么可能由两个人来代替缺席的新郎呢？

当时不熟悉皇帝婚礼的细节的人们也会感到吃惊。贝尔蒂埃元帅被拿破仑派往维也纳去代替他，正式向玛丽亚·路易莎公主求婚。按照拿破仑的请求和直接邀请，查理大公应该在教

堂出现，这两个人共同扮演拿破仑与新娘完成一切仪式。然后新娘带着大批嫁衣和仆从前往法国。

在巴黎不远的地方，这对夫妇有生以来才第一次见面。

新娘玛丽亚·路易莎公主是奥国皇帝弗兰茨同他的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女儿，年方十八。她身材较高，四肢纤细，上身丰满，胸部过于肥大。在玲珑的手腕上长着美丽的双手。金色的头发松软轻柔，目光暗淡无神，生性腼腆，谈不上有什么风度，走路的样子很难看，笑起来也很稚气。尽管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讲6国语言，会弹钢琴，善于绘画，然而她却不谙世故。她清白到了这种地步：她从来没有接触过雄性动物，只玩过雌猫、母狗和雌性金丝雀。她只读删节过的书籍，只做字谜游戏。她是个受监禁的大姑娘，温柔、虔诚、多情、无欲。

她厌恶法国，因为法国曾使她的姑妈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亚·安东尼特丧了生，使她的外祖母卡罗利娜失去了那不勒斯的王冠；法国杀害了牧师，不承认上帝。在她看来，拿破仑这个可恶而可怕的科西嘉人，是从大革命的血污

和泥潭中钻出来的基督的敌人。这是个不信神的暴君，他折磨自己的妻子，毒打他的大臣。他三次战败了奥地利，两次把她心爱的父皇赶出维也纳，夺走了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使他屈膝称臣。她一提起拿破仑，就深恶痛绝。她在给女友的信中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如果要我去见这个人，那就等于叫我去忍受比任何折磨都痛苦的肉刑……如果要我同拿破仑的元帅一起吃饭，那我会压不住心头的怒火……”

当拿破仑离婚的消息传到维也纳，当人们开始提到她有可能成为新娘的人选时，她又给女友写道：

“我任凭大家去议论，我自己一点儿也不担心。哪一位可怜的公主被他选中，我只能为她惋惜，因为我可以肯定，我决不会成为他政治的牺牲品……”

在她写信的时候，她父亲已经决定牺牲女儿。他不敢同她面谈，却给她写了封信，然后派驻法大使梅特涅去找她。

“我父皇是否同意？”公主简单地问道。

大臣辩解道，皇帝并不愿意强迫她。可是，

如果她拒绝，这么大的好处眼看就要丢失！她不再抗拒了，顺从了，然而不无尊严地说道：

“我只听从我责任感的支配。至于我父皇的利益，应该去征求他的意见，别来问我是否愿意……”

拿破仑根本没有怀疑她本人会不愿答应同他结婚。但是他对奥地利向他表示出来的那股热心劲感到高兴。现在，他一心一意地想着新婚之喜。自豪——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使他头脑发热。一个“小贵族”，一个雅各宾士兵，将要同欧洲最古老的、最显赫的皇族结亲。“恺撒家族的姑娘”将睡在瓦朗斯的副官床上！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巨大的能力和福气。

世界帝国正处于光辉、强大、富足和光荣的顶点。

但拿破仑丝毫不怀疑，以后还要发生很多次战争，正如法国任何人都不怀疑一样。而一颗将会杀死他的子弹已经铸造出来了，这也是十分可能的事。拿破仑把他作为法国的君主而在法国所做的一切和为法国、为“旧省份”所做的一切，与他作为西方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莱茵同盟的保护人等等所做的一切，很清楚地区

分开来。他认为前者是永远的，具有长久的生命，后者是他活着的时候才能维持的。需要传宗接代，需要一个继承人，最好是一个与正统皇朝有关系的继承人。况且，约瑟芬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必须改选妻子了。

拿破仑离婚的目的，只是为了另娶新娘，并让新娘早日生下皇嗣。

“我要娶一个能怀孕的肚子。”他说。

他起先向俄国求婚，沙皇迟迟没有答复。他很焦急，于是想起了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乐于充当媒婆角色的约瑟芬十分赞同这门亲事。她召见了当时在巴黎的奥国驻法大使梅特涅的夫人，让她给维也纳写信。

梅特涅高兴地跳了起来。如果能与拿破仑联姻，他就可以在最近签订那份条件十分苛刻的和约时，获得一些宽容。他请求奥皇弗兰茨征求女儿的意见。没等奥皇答复，梅特涅就叫夫人转告约瑟芬，奥地利乐意献出公主。他甚至还说，奥地利对她善意的撮合将感激不尽。

维也纳非常愉快地迎接拿破仑的新决定的消息。在1809年的惨重失败和损失之后，这场婚姻好象一场拯救。

这次事件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议论。

“现在战争要结束了，欧洲取得了均势，孕育着幸福的时代。”汉撒同盟各城市的商人这样说，他们相信英国已经最终丧失了在大陆上的支柱奥国，一定会前来表示和解。

“几年之后，他一定会和两个大国中没有立刻给他新娘的那个大国作战。”法国大臣第一次会议后外交官们就这样说。

在不稳固的世界形势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拿破仑与俄国的结盟的任何加强都威胁着奥国王朝本身的存在，而拿破仑与奥地利的任何接近都会使他在对俄关系上放手大干。某些奥国贵族，如年老的梅特涅公爵（在巴黎的奥国大使的父亲），当他们知道正在准备中的婚礼时，高兴得哭起来了；梅特涅公爵的儿子，小梅特涅并不掩饰自己的高兴。

“奥国得救了。”奥地利皇宫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在彼得堡笼罩着慌乱不安的气氛。玛丽亚·费多罗夫娜——亚历山大的母后却欢欣若狂，因为投给“人身牛首怪兽”去吃的，不是她

的女儿，而是奥皇的女儿。但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大臣们以及所有法兰西联盟的敌人都有些惶惑不安。他们觉得，奥国完全追随了拿破仑的政策，在大陆上，俄国单独一国面对着可恨的欧洲征服者。

拿破仑如今可谓如愿以偿了，攀上了正统皇朝的姻亲，娶到年轻而美貌的公主做妻子，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然而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满心欢喜挽着新娘子，随着欢快而热烈的结婚进行曲步入洞房的时候，伊比利亚半岛已经奏响了他的丧歌。

拿破仑抱定的目的是要靠大陆封锁政策从经济上窒息英国。但要做到这一点，法国必须控制欧洲的全部海岸。虽然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封建王朝都奴颜婢膝表示执行拿破仑的命令，但是对于封锁——这个会使自己国家破产的政策都力图假装看不见。

于是拿破仑从 1807 年冬天起就源源不断派大军进入西班牙、葡萄牙，并用卑鄙手段软禁了西班牙王室的主要成员，而册封自己的长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

军事占领和政治诈骗激起了西班牙人民的

极大愤慨。

在这里，拿破仑第一次碰到了完全不同的敌人，并且是使他军事天才无法施展的敌人。拿破仑打败过欧洲所有强国的正规军队，如今他在西班牙却对一群身穿破烂衣服，手持大刀长矛、猎枪的山野村夫无能为力、一筹莫展。

西班牙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殊问答》：

“你是谁？”

“上帝恩赐的西班牙人。”

“谁是你的敌人？”

“拿破仑。”

“他从哪里来？”

“他从罪孽中来。”

“法国人怎样了？”

“原来是基督教徒，现在是异教徒了。”

“西班牙人为他们服务将会怎样？”

“那就是叛徒，应该一律处死。”

“杀死法国人有罪吗？”

“不，按上帝意旨，罪有应得。”

西班牙的怪事越来越多，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们不理解，当然也不可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拿破仑最得意的元帅拉纳在西班牙碰见了从未有过的场面：每一栋房屋都变成了堡垒，每一间茅舍、马棚、地下室、顶楼都必须经过战斗才能占领。这个激烈战斗，在这个已经被占领，但是继续抵抗的城市里进行了整整3个星期。拉纳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一切人，甚至杀死妇女和儿童，但是，只要士兵一疏忽，妇女和儿童也会杀死他们。法军屠杀了2万名守卫部队和3.2万名城市居民。

拉纳元帅是一位强悍的骠骑兵，世界上的一切他都无所畏惧，他参加过拿破仑所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他不知道“神经”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而他却被无数并排躺在屋内外的尸首，那些漂浮在血泊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尸体的景象所震动。当他和随从人员沿着死寂的城市的血流成河的街道走过的时候，他对随从人员说：

“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我们被迫要杀死这样勇敢的人们，即使他们是最疯狂的人们！这场胜利只能使人感到忧伤！”

拿破仑在西班牙有10万人。他命令再派去1.5万人。

“皇帝陛下很快就会使野蛮的西班牙流氓恢复理智。”欧洲的报纸尊敬地说道。

“看来，这个强盗最后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普鲁士、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汉撒同盟各城市、威斯特法利亚王国、莱茵同盟各国的报纸的很多读者在读到有关报道后这样窃窃私议。

西班牙人的行动对欧洲、尤其对奥地利、普鲁士和其它德意志国家产生了震动人心的影响。西班牙人的行为同德国人的奴隶般的屈从的对比，使人感到激动、困惑和羞耻。

一切都表明，这曲从西班牙吹起的拿破仑丧歌就要响遍全欧洲了。

第七章 走向深渊的拿破仑——从皇帝到囚徒

“开过三年，我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1812年拿破仑如是说。然而，莫斯科却为他造好了囚车

当拿破仑与安娜·巴夫洛夫娜女公爵的亲事未获成功的时候，整个欧洲第一次谈到即将临近的这两位皇帝的激烈争执。拿破仑与奥皇女儿的亲事被解释为法奥联盟代替了法俄联盟。

当然，推向法俄走向战争深渊的原因不可能是仅仅因为一门婚事的告吹，究其主要因素应该归结为法俄争霸的矛盾。对拿破仑个人来说，推动他孤注一掷地向北方大国开战的主要

动机，是他不能容忍在他的帝国边界上还有一个不驯服的国家存在。拿破仑确信沙俄帝国从各个方面同他进行争夺并采取各种措施破坏他的大陆封锁体系，并有可能抛弃法俄联盟而同英国结盟，所以他决定惩罚这个不称意的同盟国。拿破仑曾多次战败过俄国军队，所以认为有把握再次胜过它。他一旦把俄国打败，他就可以成为欧洲大陆名副其实的全权主人。他对富歇说：

“我要把仅仅还是计划中的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公爵先生，这就是唯一理想的结局。”

1812年春末，拿破仑基本上结束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准备工作。整个附庸的欧洲顺从地准备对俄作战。

后方已有保障，道路已经打开，拿破仑手中的兵力比以前各次战争中的兵力都要多好几倍；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敌人，他已经痛击过好几次了。

外交家们预见到将有一场大灾难。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最聪明的人如梅特涅，最谨慎的如哈登堡，最恨拿破仑的如梅斯特起，都以为这场灾难将使俄国灭亡，因为它遭受到的这种威胁，是从鞑靼人进攻以来在它的整个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

在听了所有这些推测之后，巴伐利亚的将军符雷德仍然还是胆怯地向拿破仑指出，最好放弃对俄国的战争。“再过三年，我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拿破仑这样回答道。

1812年6月22日，拿破仑的远征大军到达了涅曼河畔。拿破仑签署了对大军的命令，命令中先是谴责沙皇破坏盟约，然后说：

“俄国劫数难逃：它的命运应该完结了。”

命令最后号召全军将士们说：

“前进吧，渡过涅曼河，把战争带到俄国领土上。……结束五十年来俄国对欧洲事务的毁灭性的影响。”

大本营的全体军官集合完毕。在巨大的蓝白两色御营前面，上校、将军和元帅们骑着法国最漂亮的骏马，一字排开，恭候着御驾。光灿灿的天空下，饰着五颜六色翎羽的各种军帽和缀

着五光十色星饰的各式军服相映生辉，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战争画面。头裹长巾，身套宽大短裤的马穆鲁克骑兵为这幅画面增添了几分东方色彩；而身穿绣金蓝色军服、神采飞扬的年轻贵族则给它揉进一种巴黎情调。

拿破仑神气活现地跨上他的坐骑弗里德兰，这匹举世无双的纯种马仿佛插上翅膀，乌黑闪亮的雄健身躯飞奔向前。皇上用不着化装成波兰军官了，达乌元帅的人马已于昨夜越过森林屏障，到达涅曼河畔。拿破仑拿着望远镜，身着灰色军礼服，从部队前面急驰而过，频频举起望远镜。

俄国对这种虚张声势的举动无动于衷，回答法军的欢呼只是几只乌鸦的低空盘旋。对岸，看不见一个士兵的影子，望不见一缕野炊的青烟。拿破仑愀然不乐。他的沉默传染给所有的随行人员。50个叱咤风云的战将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垂头丧气，心烦意乱，就象是去参加葬礼似的。

“这些先生们懊丧极了，因为没有枪声为他们的午餐伴奏。他们就象为缺雨而苦恼的园丁一样，是吧？”一位老兵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

不失时机地教诲身边这位初出茅庐的新手。

6月23日早晨，拿破仑的副官欧仁遐思遐想，任凭胯下的坐骑欢蹦乱跳地向前飞奔，他不知不觉闯入圣驾的行列。而谁能进入这个行列本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大事。一道道愤怒的目光向他刺去，一张张恶毒的面孔企图使他怯步。但他还是旁若无人地独自来到拿破仑的身后。拿破仑此刻正在一块麦田旁骑马前行。

突然，麦田里窜出一只野兔，象箭一样从弗里德兰的腿间穿过。高贵的御马异常气愤，略一闪身。虽然这只是轻微的一动，但是已经酿成大祸。

欧仁一直注意皇帝骑马的姿势——大家都说皇上骑马的姿势不好，这时他看到皇帝短小的手臂一扬，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随行人员大骇，急忙勒紧自己的马，勒得马头朝天仰起。

“一群笨蛋！一堆废物！这个时刻竟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欧仁，机会来了！”欧仁的坐骑在马刺的刺激下向前扑去。

当欧仁跑到拿破仑身旁跳下马时，拿破仑已经站起来，正在拍打衣服。皇上的目光落到欧仁的身上，欧仁做了唯一可做的事，拾起那顶荣

耀的小帽，单膝跪地，脸上浮着自豪而谦卑的表情，双手捧给皇帝。

5分钟后，汗流浹背的欧仁回到队尾。一位长期跟随皇帝的仆人对欧仁说：

“可怜的孩子！陛下落马时，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这是起码的分寸和谨慎，除非确信他伤筋动骨。在这种情况下跪到他的脚下，捧起他的帽子，真是不识时务！”

那顶小帽被皇帝一把从欧仁手中夺走，飞进20步开外的麦田。皇帝光着头，坐上马鞍，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沉默，过分的沉默，亲随们吓得缩成一团，噤若寒蝉。突然，万钧雷霆落到宫廷副官长的头上；

“我已经三令五申，把这些闲杂人员给我打发走！我说过，我的司令部必须精练！为什么象在枫丹白露狩猎一样，把这么多人堆在我身边？就因为他们是贵族？是吗？记住，只有带着4个贵族标志的人才配在我身边，4个真正的贵族标志，也就是说，在战场上负过4处伤。我永远不能容忍那些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纨绔子弟呆在我身边……”

“由于落马，他的心情坏极了，”老兵向欧仁

小声解释说，“他把很多事都看成不祥之兆，这是科西嘉人的怪癖。你听，人们正在议论：‘凶兆，……如果是罗马人就要止步不前了……’今天人人晦气。”

6月24日，进军开始了。几十万大军将在同一天跨越涅曼河：一半部队在这里过河，另一半部队由博阿尔内统率从上流过河。皇帝正确选择了渡河地点。这里是涅曼河的弯曲部，伸入河心的平缓滩地和林木稀疏的河岸构成了理想的登陆地点。为了掩护渡河，拿破仑部署了五、六百门大炮，但是今天一门也没有派上用场：没有敌人。

大军有秩序地通过浮桥。各式各样的兵器密如丛林，五光十色的军服竞放异彩，数不清的将军驰骋于万军丛中，军号嘹亮，动作敏捷，号令声响若雷鸣，“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似山呼海啸。

啊！1812年！30个国家，100种语言，一个皇帝，一个人民：整个欧洲在行动。

法军过河以后，急速地向纵深挺进。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在荒漠无垠的涅曼河东岸，在地平线的尽头，竟没有看到俄国军队的影子。拿破仑

在有山有河的意大利战场上运用自如的军事才能在荒凉而广阔无际的平原上已无法施展了。敌人不顾一切地后退，不给拿破仑以围歼的机会。

拿破仑军队令人惊叹不已的强行军在广阔无垠的荒漠上失去了意义，他们在没有摸到敌人动向时就已精疲力尽。相反，随着进军的深入，战线的延长，法军的补给情况进一步恶化，部队大量减员。

8月中旬，在斯摩棱斯克发生遭遇战，双方损失都很重。俄军烧毁街市，于17、18日之间的黑夜撤走。

拿破仑无法找到俄军主力而一举歼灭之。战争违反拿破仑的意志而出现了长期战争的迹象，这对与自己的本土远隔万水千山的法军显然是不利的。拿破仑自己也很清楚，他在占领斯摩棱斯克后，把自己的佩刀扔在桌子上说道：

“1812年的战争结束了。”

从军事角度上讲，此时最好的选择是撤退，因为取胜已经遥遥无期了。但撤退不符合拿破仑的性格，于是决定继续前进。拿破仑当时还深信，打进莫斯科必将迫使亚历山大一世求和，但

为此必须在占领莫斯科之前进行一场会战，这是拿破仑无论如何要达到的目的。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当时俄军统帅是德国人巴克莱，面对法军的优势和气势汹汹的进攻，他认为唯一理智的选择是大踏步后撤，用漫长的战线拖垮拿破仑。他也是这样做的。但俄国沙皇和皇室贵族非常不满这种后撤。

恐惧，无法克服的和日益加剧的恐惧逐渐笼罩了俄国上层社会的一部分人。难道一切都毁灭了吗？难道不加抵抗就交出俄国吗？为什么斯摩棱斯克战斗不进行到底呢？为什么要撤退？德国人巴克莱是不是叛徒？

亚历山大撤换了巴克莱，任命了库图佐夫。库图佐夫认为巴克莱做得对，远离基地，不可能在一个离开法国几千公里的、荒芜的、贫穷的、充满敌意的大国中进行成年累月的长期战争。缺乏粮食，不习惯俄国的天气，这一切都会拖垮拿破仑。但是库图佐夫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有俄国人的名字，皇帝还是不会让他不进行决战就放弃莫斯科的，正如以前不让巴克莱这样做一样。于是他决定进行这场他坚信是不必要的

战斗，正如当时他违背意愿进行奥斯特里茨战斗一样。

这场战斗在战略上是多余的，但从道义和政治上说来是必要的。巴克莱的撤换，拿破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信号，俄军要进行最后决战了。

9月7日，拿破仑与库图佐夫在莫斯科城下的一个小村庄博罗迪诺展开决战了。

就在大战的前一天夜里，拿破仑病了，患了重感冒，外加排尿困难。由于发烧，他浑身哆嗦，不停地喝水，他不时地询问时间。他很少显得如此忧心忡忡。天色刚破晓，他的副官就看见他坐在绿幔小床上，双手捧着脑袋，陷于沉思之中。

“战争是什么？”他低声地嘀咕着。“野蛮人的职业。它的全部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超过对手。……”

他是否气数已尽？看来他是在怀疑。他问拉普——他的一位将军是否相信能取得胜利。

“是的。”将军回答道，“不过是血腥的胜利。”

天亮了，他的恐惧感消散了。

“这是奥斯特里茨的旭日。”他高兴地对将

领们说道。

战斗打响了。双方打得很久，难分难解。拿破仑沿着一条壕沟缓步行走，默默地用马鞭抽打着野草。他不让自己的近卫队参加战斗，让内伊、缪拉和欧仁随意袖手旁观。毫无疑问，他心神不宁。他的目光黯然失神，他的意志也同样在消沉，这也许是俄军打得太顽强了，使他丧失了必胜的信心。整个战役中，大家只见他举棋不定，延误战机，只相信将军们发挥出超绝的威力。

黄昏的时候，战斗结束了，俄军有秩序地撤退了，法军胜利了。然而这是怎样一个令人恐怖的胜利呵！拿破仑的数万名士兵尸体包括47位战绩赫赫的将军横卧在战场上，乌鸦在低空哀嚎，鲜血在地下流淌……

“在我一生中的作战，最令我胆颤心惊的，莫过于莫斯科城下之战。”拿破仑后来曾就这次大血战不无余悸地说。

俄军不战放弃了莫斯科。9月13日，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拿破仑和他的随行人员登上了波克隆山，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欢喜：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美丽的景色震惊了。在他面前

的这个巨大的、在阳光下闪耀发光的城市，是让他
他的军队休息的地方，而首先是一定能迫使亚
历山大缔结和约的保证。博罗迪诺的可怕的情
景立刻被这些景色和这些展望遮掩了。

9月15日法军开进空无一人的莫斯科。拿
破仑住进克里姆林宫后，马上就投入了繁忙的
工作，他向亚历山大提出和平的建议。在等候回
音期间，为了显示他心神平宁，还下诏改组了法
兰西歌剧院。

然而沙皇一直不给回音。

拿破仑终于醒悟了。占领莫斯科，就能迫使
沙皇屈服，拿破仑一直心存幻想。进占莫斯科城
前，他安慰那些信心不足的将军们说：

“和平就在莫斯科。一旦我军胜利地进占他
们的首都，就会迫使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看清形
势，同时也逼迫俄国的大贵族们正视现实。他们
将会重新考虑是否要把战争延续下去。倘若我
解放俄国的农奴们，那就会使俄国巨大的财富
遭到毁灭！”

现在拿破仑已经明白了，莫斯科并不象他
想的那样，并不是俄国的心脏。他逐渐看到，那
个原始机体并无心脏，它的生命无形中广布于

无数村庄，过着单调的生活，与莫斯科或彼得堡都不相干。因此他向莫斯科这个古都进军，无异抽刀断水，白费功夫。事到如今，赢得胜利的唯一之路，就是解放农奴。这样做，就会使由农奴组成的俄国军队瓦解，千千万万过着非人生活的农奴就会起而攻击沙皇。

这一着，可是俄国沙皇和上流显贵们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拿破仑也知道，但他不愿这样做。他已经不是土伦作战时的年轻军官了，而成了欧洲主宰，他要从帝王的利益来处理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不想纵容人民的自发暴动，不想在俄国造成一种不能和任何人签订和约的局面。作为皇帝，他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同农奴制国家的主人沙皇打交道。这就注定了拿破仑的命运。

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在放弃莫斯科之后，不在继续向后撤退，他把部队移到莫斯科西南卡卢加，并在那里改组其军队，准备反攻。拿破仑实际上已被围困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占领者成为莫斯科的囚徒了。

然而莫斯科也不能住了。俄军撤退时，放了把火，并且把救火用的一切器具都运走了。9月

17日早晨当拿破仑巡视克里姆林宫，从窗户中往四处环顾，到处都是一片狂暴的火海的时候，皇帝面色苍白，久久沉默地望着大火，后来才说道：

“多么可怕景象！这是他们自己放的火……多大的决心！怎样的人啊！这是野蛮人！”

克里姆林宫部分已经着了火，有些大门已被火舌控制，元帅们请求拿破仑立即搬到城外彼得罗夫宫。他没有马上同意，但这几乎要了他的命。最后离开克里姆林宫时，火星已溅到他和随从人员的身上，呼吸也感到了困难。拿破仑的一位侍从人员说：

“我们在燃烧着的天空之下，在燃烧着的地上，穿过两旁的火墙走。”

冬天来临了，寒潮渐紧，必须撤退了。10月19日，远征中的残存的军队走上了返回波兰的道路。路过博罗迪诺时，双方的几万具尸体仍然没有掩埋，这个惨景给士气本已低落的法军又一个打击。

对于撤退的法军，库图佐夫并不主张积极同它进行决战。他认为，只要不断地以骑兵进行骚扰，主力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把法军“护送”

出境就行了。

即使是这样，饥饿、疲劳和不断袭来的哥萨克骑兵的打击，也已经把法军弄得溃不成军，而暴风雪的来临，更使它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数以千计的士兵一批批地倒毙在风雪中。

历尽千辛万苦，留下一长串尸体后，法军终于摆脱追兵，渡过了涅曼河，退出了俄境。可怕的向莫斯科进军，以拿破仑的惨败宣告结束了。法军先后调入俄国的部队共约60万人，而回来的已不足3万人，它丧失了所有骑兵和几乎全部炮兵。

在法军离开俄国边境前的一个星期，即1812年12月6日，拿破仑决定离开军队立即返回巴黎。因为他得知，马莱将军谋反。马莱是法国的一位将军，1812年10月乘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在巴黎发动政变，谎称拿破仑已死，造成很大混乱。政变虽然很快被粉碎，但已经说明帝国统治已经不稳。

元帅们来送行，拿破仑和科兰古坐上雪橇，在12月傍晚的朦胧雪雾中消失了。坐在上面的那个人毅然决定，不经过激烈的决战，决不让出被他征服的欧洲任何一寸土地。

山河飘零，拿破仑挥泪退位。英国报纸说：“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雄史诗结束了——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可拿破仑注定还要震惊世界

在12个昼夜中，拿破仑先是坐在雪橇上，后来是坐在轻便马车上，跑过了波兰、德意志，回到了法国，于1812年12月18日早晨到达杜伊勒里宫。

此时，皇后路易莎刚看完一出小戏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皇帝走了进来，皇后好不容易才认出他。

拿破仑身着貂皮大衣，头戴貂皮高顶帽，下巴颏上黑茸茸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他一把抱住玛丽亚·路易莎，他激动万分。

第二天清早，他就投入了工作。现在，他感到根基不稳了。当马莱宣布他的死讯时，整个帝国几乎分崩瓦解。他显得闷闷不乐，辛酸凄苦。为了巩固他的王朝，他想同罗马帝国的恺撒一样，让儿子共同执政，并让教皇为皇后加冕。

他上枫丹白露找到囚禁的年老教皇，同他

拥抱，亲热得叫教皇晕头转向。然而，那些红衣主教们监护着教皇，庇护七世刚刚做了允承，又收回了诺言。

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晋封玛丽亚·路易莎为摄政皇后。他认为这样就能稳定奥地利，使奥地利“不敢对自己的血亲开战”。他一边招兵买马，重建军队，一边连连举行庆典、宴会。皇帝想蒙蔽法国和欧洲其它各国，但无济于事。就在巴黎城内，他行经之处，人们都议论纷纷。

英国鼓动着怯懦的普鲁士，一个新的联盟正在形成，企图在春季打垮拿破仑。

在这段阴郁沉闷的日子里，他的儿子是他真正的、唯一的欢乐。孩子活泼可爱，虽然好使性子，但心地柔和。拿破仑常带着他参观阅兵仪式，到近卫军的驻地，到河边的平台上散步。为了逗儿子高兴，他给儿子做了好几套小小的军服。孩子已显示了对军事的爱好，老是骑着玩具大马，舞动战旗、战马、战鼓。他的小伙伴是一位服侍他的宫女的儿子。他们之间完全平等相待，这两个无拘无束的顽童，高声喊叫，相互扭打。皇帝希望如此，孩子长大后应该具有男子汉的气魄。

小国王还具有很多天赋的资质。一天，他来到皇帝的书房，国务会议接近尾声。大臣们三三两两地侍立左右，还在商议朝政。孩子跑向父亲，目无旁人。

拿破仑一声断喝，叫孩子站住，并严肃地，几乎是严厉地对他说：

“您没有行礼，殿下。行啦，向这些先生们致意吧。”

孩子并没有惊慌。他转过身来，向大臣们欠身行礼，并把手放在嘴上，给他们一个飞吻。皇帝圣颜大喜，把儿子抱在怀里，在大臣面前走了一圈，仿佛在举行检阅。他笑道：

“啊，瞧，先生们，我希望大家别说我忽视了对儿子的教育。”

现在既然儿子已经长大，拿破仑经常把他带到书房，一呆就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同孩子一起在地毯上玩耍，让他用一些切削得平平整整的小木块建造房屋和小塔。这些木块是皇帝筹划军阵用的，每块代表一个军或一个师。有时，孩子就在他的膝头呼呼入睡。

决定帝国命运的德意志战役于1813年5月1日拉开了序幕。魏森费尔斯一仗，拿破仑虽

打赢了，可是正直坦率的贝西埃尔在战斗中阵亡。拿破仑痛苦万分，他写信给玛丽亚·路易莎说：

“这对我是十分痛苦的打击。他为什么要到狙击兵那边去。第一颗炮弹就把他直挺挺地击倒了。对他可怜的妻子宽慰几句吧。”

更使他震惊的是杜洛克的阵亡。在鲍岑战斗结束后，法军追击普鲁士的后卫部队，忽然有人对他说，杜洛克也中了炮弹。他开始不相信：

“杜洛克？你搞错了，他刚才还在我身边。”

一位军官证实了这一消息。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马上去看望杜洛克。当德鲁奥将军请他下令准备下一场战役时——下一场战役就是莱比锡！他烦躁地把德鲁奥推开：

“一切都明天再说！”

他走进一个茅屋，杜洛克的肚子被炸开了，已奄奄一息。他拥抱着将军，试图安慰他。神智清醒的杜洛克感谢他，把女儿托付给他，祝他赢得胜利，赢得和平。拿破仑心神恍惚，抓住他的双手，说不出话来。最后，杜洛克求拿破仑给他一些鸦片，并说道：

“走吧，陛下，走吧，这景象对您说来太惨

了。”

拿破仑痛苦地站起身来，垂着双肩走了出去，口中说道：

“永别了，我的朋友，我们会见面的……也许用不了多久……”

走到门口，他摇晃了。他一直忍住的泪水，这时夺眶而出，沾湿了衣衫。

他在一堆木柴上坐下，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呆了一阵子。近卫队的一条狗来到他身边，舔他的手，他也没有察觉。

一连几天，他萎靡不振。他向玛丽亚·路易莎倾诉悲凄的心情：

“他是跟随我达二十年之久的朋友，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我给军队造成的最大损失。”

他买下了杜洛克去世时的屋子，委托村里的牧师在那里建立一个纪念碑。

如同上一次战斗时期一样，拿破仑几乎每天给皇后写信，总写得情意缠绵。现在，他真正让摄政皇后同政治联系起来了。他催促她在感情上对她父亲施加影响，以阻止奥地利加入反法联盟。

写自埃尔富特的信中说：

“我求你写信给爸爸弗兰茨，叫他别随波逐流。”

寄自博尔纳的信中说：

“费兰茨老爹的行为不太好，他从我这里撤走了他的部队……如果他听信谰言，他必将自食其果。”

后来他从德累斯顿给妻子写信讲述了关于同奥地利首相无休无止、怒气冲冲的会谈：

“我同梅特涅谈了很久很久，把我累得精疲力尽。不过，我的身体很好。你提到对小国王的妒嫉使我哑然失笑。我真想见到他。替我亲亲他。你在植物园里见到大象了吗？我希望要不了几天，我们能开始议和。我渴望和平，但必须是体面的和平。再见，我亲爱的，一切都属于你。”

年轻的皇后顺从地遵循他的指示。但是，她用什么消除敌人的刻骨仇恨呢？拿破仑的对手们看到巨人已摇摇欲坠，都相信这一次能把他们摧垮。拿破仑失策了，长时间的停战使敌人得以从容地积聚力量。

事态急速发展，奥地利宣战了。从此，拿破仑要同 50 万军队作战。

他在德累斯顿打了胜仗，他往日的政敌莫罗被一颗法国炮弹炸死。但是新交的盟友们背叛了他，那些被打得精疲力竭的将领们接二连三地被击败，敌军象钳子一般夹攻莱比锡。

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法军与联军在莱比锡展开了一场整个拿破仑时代的最大的血战，双方参战人数近50万，萨克森军队哗变，拿破仑受挫，向莱茵河撤退。

在最后的20天中，他只给玛丽亚·路易莎写了一封信，而且并不坦率。他想瞒她到最后一刻，后来实在瞒不住了，才悄悄告诉她：

“你可以在战报中得悉战局。”

在这存亡攸关的危急时刻，缪拉在同敌人谈判投降的条件，而拿破仑还得对付路易。他的这位弟弟回到法国后，竟向他讨回荷兰王国。拿破仑叹息道：

“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居然叫我严厉地惩罚他，他逼得我太紧了。他真是疯了。”

他写信给皇后说：“可怜我吧，我竟会有一个那么讨厌的家庭，而我却给了他们多少财富！”

他嘱咐将士们牵制住敌人，自己则去努力

重振法兰西。

11月9日，他来到圣克鲁。走进宫里，在门厅中见到妻子。她一头扑在丈夫怀里，热泪纵横。拿破仑对她温存了一番，然后又抱起儿子，儿子兴高采烈。尽管父亲离家很久，孩子还是认出了他，并热情地迎接他，孩子小小的双臂围着他的脖子，他走进了书房。

冬季的4个月内，他布置防线，以抵御敌军咄咄逼人的侵犯。他很少见到皇后。

1814年元旦过得很凄凉。奥军在巴塞尔渡过莱茵河，普军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缪拉在议降。

约瑟芬被赶出西班牙，来到巴黎藏身，她重新恢复了法兰西第一亲王的头衔和特权。

立法议会已经公开反对拿破仑，他暴跳如雷地斥责道：

“你们想把污泥扔在我脸上。记住：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就是这么个人。他们肯定能在三个月之内得到和平，不然就是我死！……”

1月23日，他把路易莎和小国王托付给国家卫队的军官们。

“你们能向我担保吗？”他问：“你们会保护

他们吧？”

他们热情地做了保证。拿破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了。但是，在出发去抵御潮水般涌来的外国军队之前，他似乎不抱任何幻想。他说：

“如果敌人打到巴黎，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尽管他不抱希望，这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克敌的能力。

在杜伊勒里宫度过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呆在书房里，把孩子带在身边。他在观看地图，焚烧秘密文件。儿子在他周围玩耍、蹦跳、唱歌。有时，拿破仑站起来，凝望着儿子……

24日晚间，他温存而凄然地向路易莎告别。这一走，他再也吻不到她那柔媚的桃腮，再也握不到她那娇弱的玉手了。皇后低声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

拿破仑在回答前迟疑了一阵子。他终于开口了，噪音低沉：

“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上帝的天机。”

过了一会儿，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小国王的卧室。容貌英俊的孩子在淡淡的灯光下平静地睡觉，握着小拳，张着小嘴。保姆惊骇地站起来，拿破仑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他小心翼翼地

避免把孩子弄醒，轻轻摸了摸儿子的额头。然后，默默地转过身，永远地离开了这无疑是在他世界上最心爱的骨肉……

这一次，要么驱敌出境，要么战死疆场。这时，他得知缪拉已经背叛，十分激动。

“这一切，”他愤愤地低声说道，“终将导致波旁复辟。”

与此同时，他在征战，一直转战疆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心中又闪现了一线希望：

“我现在离维也纳比奥地利皇帝离巴黎更近。”

3月23日，他犯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过失。拿破仑思念着妻子，为了使她放心，不顾一切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了作战计划。不幸被联军截获。他们得悉：法国首都空虚。联军迅速扑向巴黎。拿破仑得到情报为时已晚，他策马回援时，得知巴黎已经投降。

起先，他颓丧气馁。后来，在他藏身于枫丹白露时，他那童话般的幻想又使他振作起来。元老院废黜了他，但他信任自己的士兵，他们肯定会跟随他转战四方。可他的元帅们同他激烈争吵，与他闹翻。这位多少年来一直载着重担的汉

子感到了极度的疲劳。他的腰背一下子压弯了，压垮了。

“这些都是没心肝的家伙！”他凄然说道。“与其说我被命运战胜，不如说是被我战友的自私无义断送了。”

开始，他同意让位给儿子；后来，当马尔蒙也倒向联军后，他不得不宣布无条件地退位。马尔蒙可是他最心爱、最得宠的青年时代的一位伙伴啊！他感到肝胆俱裂：“我对他视同孩子。”他对科兰古说：

“我相信，是野心把他毁了……。”

拿破仑已是众叛亲离。他的臣僚，他的将帅，都投奔了波旁家族。他原以为，一旦同妻儿团聚后，还可以过小王子一般的生活，或者去厄尔巴岛，或是去意大利。可是，人们告诉他，他在枫丹白露苦苦等候的皇后，已经去朗布依埃了，已落入盟军之手。她听从了身边贵妇们的意见。拿破仑知道她是多么脆弱，他已预见到，她不久就会被奥地利夺走。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子，也见不到他的孩子了……这时，他第一次真正感到灰心丧气。

半个月以来，他的一个个幻想在一天天破

灭。他做出牺牲想让儿子继位，他儿子没能登基；他以为不至于同儿子分离，敌人却夺走他的爱子。他的士兵叛离了他的营垒，属国的君主们都背信弃义。他任凭胜者摆布。他们要侮辱他，折辱他，也许想杀害他。想到人们的卑躬屈节，他痛彻心肺。

他想到了死。

从俄罗斯撤军以来，为了防止被俘，当时他从尤万医生要来一小瓶毒药，从此一直随身携带，4月12日夜间，他服下了这瓶毒药。然后上床睡觉，以为会长眠不醒。

药性迟迟没有发作，他叫来始终对他忠诚的最亲密心腹科兰古，交给科兰古一个红色公文包，里面放着所有路易莎给他的信，以及他留给皇后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平静地写道：

“我同意你去朗布依埃……你父亲简直丧失了理智。待我们太狠心了。不过，他在你和你儿子面前，将是一位慈父。永别了，我的好路易莎，你是我世上最珍爱的人儿。只有当我想起我的灾难给你带来的不幸时，我才感到痛苦。你将终身眷恋我这位最温存的丈夫。替我亲一下儿子。永别了，亲爱的路易莎，一切都属于你……

拿破仑。”

屋子里烛光幽暗，科兰古看不清他的脸容。他叮咛了几句，声气微弱；呻吟了几下，噪音哽咽，这使科兰古警觉起来。他尽管铁石心肠，也潸然泪下。拿破仑把他拉近身旁，拥抱了他。

“祝你幸运，你应该得到好运，我亲爱的科兰古。”

痛苦的折磨开始了，科兰古想要跑出去喊医生，拿破仑请求不要这样做，甚至愤怒地命令他不准叫任何人。打嗝更加厉害，四肢渐渐发僵，他咬紧牙关，不肯呕吐。

当他平静时，又请科兰古把他的大公文包送给他的前任皇后约瑟芬的儿子、他的继子欧仁亲王做纪念，并把他最漂亮的马刀和浮雕肖像留给科兰古。

“您要告诉约瑟芬，”他又说道，“我很想她。”

强烈的痉挛又发作，科兰古跑回去叫来了尤万医生。

皇帝轻轻地责备科兰古打扰了他临终的安宁。

“……想死是多么困难呵！”他痛苦地说道。

“大夫，”拿破仑对医生说，“请再给一剂更强烈的毒药……这是您的职责，这是所有忠于我的人应该替我做的事。”

尤万拒不从命，他不能杀人。由于皇帝一再要求，他只得晕头转向跑出宫门。拿破仑一手捂着肚子，似乎疼痛难忍。

“唉，”他叹息道，“我要是战死在奥布河畔的阿尔西该多好！”

毒药由于储存时间长失了效，拿破仑并没有死成。

“我得活下去，”他说道，“因为死神不肯收留我。再说，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浪之后，我也得鼓起勇气忍痛活下去。我要编写勇士们的青史……”

他要求不要张扬此事，免得他自杀未遂，遭人嘲笑，给儿子造成不良影响。他对自己的退位没有要求任何代价，他为自己的亲族，为一切同他有关的人们，甚至他的仆从，也提出了详细的条件。至于拿破仑本人，只是由于他的谈判代表极力要求，他才成为厄尔巴岛的领主，年金200万法郎。可以带上旧卫队一营士兵，作为“仪仗和护卫队”。

他的岳父弗兰茨皇帝向拿破仑宣布，他邀请路易莎回娘家小住“几个月”。这就是说，皇后要带孩子去维也纳——这是拿破仑最害怕的事情！年轻的皇后居然答应了。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倍感凄凉，受过他多少宠爱和恩惠的亲人之中，居然没有一个前来看他。当灾难临头时，大家都各人自扫门前雪了。他的仆人们也抛弃他，贡斯当之辈更是趁火打劫，窃取了她的财物之后，挟资远遁。他身边的亲信已寥寥无几：马雷、科兰古、德鲁奥、贝特朗、康布罗纳。在枫丹白露的最后一个星期，宫中更显得空荡寂寥。4月20日，拿破仑走下铁蹄形楼梯，向集合在大庭中的老卫队士兵告别：

“士兵们，你们是我的老战友，我始终同你们走着光荣的道路，现在我必须同你们分别了。我可能还会留在你们当中，但是那就需要继续残酷的斗争，也许，除了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之外，还要自相残杀，我不能再去撕裂法国的胸脯了。享受你们应该得到的安宁吧，你们会幸福的。不要惋惜我。我负有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同意活下去；这个使命就是向后代述说我和你们共同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想拥抱你们所

有的人，但是，还是让我吻这个代表你们全体的军旗吧……”

拿破仑不能讲下去了。他的声音哽咽了。他拥抱和吻了旗手和军旗，不忍再看见他们，用手捂住眼睛，登上马车而去。近卫部队高呼“皇帝万岁！”很多近卫士兵象小孩子一样哭了。

英国报纸长舒了一口气：“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雄的史诗结束了——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

但是，从1793年12月在土伦开始的20年来的史诗，实际上1814年4月在枫丹白露根本还没有结束。

拿破仑注定还要震惊世界，而20年来使世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吃惊的正是拿破仑。

厄尔巴岛的囚徒，天涯乡思，欧洲再次惊呼：“拿破仑回来了！”百日黄粱梦，滑铁卢不尽的遗憾

对于一位曾经拥有整个欧洲大陆并在欧洲所有最华丽的宫殿中养尊处优过的君王说来，厄尔巴岛仅仅是一块连海浪也能击碎的小小岸

礁而已。尽管如此，拿破仑来到岛上后的最初日子里，显得很知足。他建立了小小的国家机构，整修了港口，建立了一支小型舰队；他为自己在那儿建造了一所城市住宅、一所田园别墅；他还修建了大路，使铁矿投入开采；他通过操练、检阅和演习，使近卫营的 800 名老兵的体质和意志保持良好的状态。

每天早晨，他带着几名军官，纵马驰骋，跑遍了岛上所有的道路。他以前很少如此好动。舞台越小，他的动作就越多。他还津津有味地组建了自己的小朝廷。

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不断地思念着他们。他现在得不到他们的音讯，理所当然地觉得这太残酷了。他请英国的特使向伦敦转达他的抗议：

“人们在当代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野蛮、如此不公正的例子，这种做法是毫无理由的……人们从我手中夺走我的儿子，就象过去人们从战败者手里夺走他们的孩子一样，为的是点缀征服者的胜利。”

他对自己的熟人兴奋地回忆起孩子说过的使他高兴或吃惊的话语，回忆起孩子离开他时

依依不舍的情景。他经常使用镶有儿子肖像的鼻烟盒。有一天，他失手掉在地上，不顾身体肥胖，跪下来拾起烟盒，并多次念叨：

“要是不慎摔坏了小宝贝的脸容，那我就太难受了。”

孩子是他心中的全部懊恼和怜情。

12月底，贝特朗将军的兄弟带着他在罗马买的一些浮雕来到岛上。前皇帝派人把这些浮雕安置好，细细观赏。突然他定眼注目，脸色发红，以一种颤抖的声调喊道：

“那是玛丽亚·路易莎！”他的声音是那么凄楚，大家听了一齐忧惧地望着他的脸。他觉察到自己失态，忙竭力纠正脸上的表情，平静地谈起艺术家的才华。他拿起下一幅浮雕，上面是小国王的肖像。

“我的儿子！”他以一种令人断肠的柔情低声叫道。他把浮雕蒙在脸上，仿佛在吻它。

“我的儿子。”他又叫了一遍，几乎是声泪俱下。周围的人们都屏气敛息。

拿破仑在深深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走进书房，独自闭门呆了半个小时。他出来时，脸色苍白，衣冠不整，对谁也不说话，登上了马车。一

连好几天，他愁眉不展，面无笑容，沉默寡言。

在法国，波旁王朝实在愚笨，找不到它旧日强盛的根基。王朝的复辟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危及了人们的利益。法国一位前革命者来到岛上，向拿破仑证实，当前人心浮动，军心难忍。拿破仑思考了整整一夜，下了决心。他要碰一下运气。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自身、夺回妻儿。接连几天，他守口如瓶。后来，他向贝特朗和德鲁奥透露了计划。贝特朗表示赞同。他和他的夫人，同所有跟随皇帝的臣仆一样，在岛上快憋死了。

拿破仑在最后一刻才告诉母亲，这位科西嘉老太惊骇得全身发僵：

“让我暂时做一个母亲吧，过一会我再回答你。”

经过长久的沉默后她回答说：

“出发吧，我的儿子，遵循着你的使命。也许，你会遭到失败而马上丧失你的生命。但是你不能留在这里，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悲哀。我们希望，在这么多战斗中都保佑你的上帝再一次保佑你。”

说完，她紧紧抱住儿子。

她在马尔尚面前，忍不住哭了起来。妹妹波利娜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件事，还在准备一次狂欢，闻讯后惊呆了。某种预感使她预见到一场灾难。她哭着把一串钻石项链交给马尔尚：

“皇上遇难时会用得着的。倘使如此，马尔尚，您千万别抛弃他！好好照顾他……”

2月26日黄昏拿破仑带着一只小小船队等待起风张帆。第二天黎明，起风了，船队扬帆出航，带着拿破仑，走上他一生的最后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他要掀翻一个世界，与其说为了夺回他的皇位，不如说他想夺回妻子儿子。

第二天，英国人来查看空无一人的拿破仑在岛上的居所时，在他卧室的床头柜上，看到一本查理一世的传记，正翻到“让位”的那一页……

拿破仑奇迹般地避开了在他的航道上穿梭巡逻的英、法舰艇，1815年3月1日凌晨在法国南部儒安港登陆。奔跑的海关卫兵看见拿破仑，就脱帽向他大声致敬。

拿破仑立即向巴黎进发，沿途居民爱国热情一如既往，热烈欢呼拿破仑归来，一群群农民也跟在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后面，送了一程又一

程。

拿破仑用生命做赌注，不许开枪，仅靠他的威望，“雄鹰带着三色国旗，要飞越一个又一个钟楼，一直到巴黎圣母院的尖塔上。”

波旁王朝派来抓他的一营士兵排成战斗行列，拿破仑解开上衣，指着自己胸膛，叫士兵开枪。士兵们却把枪放下，跪倒在他脚下，吻他的衣服和双手。拿破仑感动得热泪盈眶。

现在，他已稳操胜券。法国无法抵挡这位曾经统治过它的人物，哪怕他单枪匹马，法国也无法抵挡。法国有一个国王，有许多亲王、大臣、将军、省长，但是，只要拿破仑一出现，这部强大的机器就整个拉朽摧枯般地坍塌了。将军们给他献上一队队士兵，市长们献上一座座城池。没多久，圣路易的后裔，患足痛风的国王就不得不逃之夭夭，就象一个耻辱的可怜虫在荣誉的幽灵前拔腿逃跑一样。

拿破仑赤手空拳仅用 20 天就夺回了失去的政权，全法国为他欢呼，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派去一队队拦截的士兵全部倒向拿破仑。正象巴黎当时出现的大幅宣传标语说的那样：

“拿破仑致路易十八：国王，我的兄弟，不

必再给我派遣部队，我这里已经完全够了。”

形势发展之快，令与王室宫廷接近的巴黎报纸也大出洋相。

第一个消息是：

“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

第二个消息是：

“吃人魔王向格腊斯前进。”

第三个消息：

“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

第四个消息：

“波拿巴占领里昂。” 第五个消息：

“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

第六个消息：

“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所有这些拿破仑的绰号都是这几天内登在同一的报纸上，出自同一个编辑部之手的。

1815年3月20日晚上9点钟，拿破仑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被巴黎人民抬进杜伊勒里宫。

此时，拿破仑更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早在他向巴黎行进时，即3月11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路易莎：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在巴黎啦……带着我的儿子来找我吧，我希望在3月底之前能拥抱你。”

拿破仑与路易莎感情极好，虽然起初路易莎并不愿嫁拿破仑，她相信盟国的宣传：拿破仑是吃人魔王。婚后她发现拿破仑殷勤体贴，她对他已经一往情深了。然而拿破仑被流放以后，长期的别离，奥地利的年轻的副官追求，使她移情别恋了。

拿破仑到了巴黎才知道真相，他目光茫然，面如土色，痛苦万分。儿子成了囚人，妻子遭人勾引，现在再进行这可怕的竞争又有什么益处？

回到巴黎不久，他就开始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以此来忘记痛苦。而且他心中还有一线希望，即只要战胜了敌人，就会夺回自己的妻儿。他深知与盟国必然要决一死战，因为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

不错，正在维也纳为了争夺战利品而争吵不休的反法联盟的国家立即停止争吵，共同惊呼：拿破仑回来了！惊呆之余，第七次反法联盟毫无争议地成立了。盟军又一次潮水般扑向法国。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率领大军与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展开大战，这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后一次战斗。战斗开始时，双方都在等待援军。拿破仑在等待格鲁希元帅，他是前一天被拿破仑派出去追击溃败的布吕歇尔的普军的；联军在等待布吕歇尔。

法军非常勇敢，一次次冲锋，即使剩下一个人也不惊慌。有一个时候，英军统帅威灵顿认为一切都完了。

拿破仑亲自带领进攻，胜利已经在望。正在这时，在法军右翼传出了喊声和射击的轰响声：布吕歇尔带领3万普军摆脱了格鲁希的追击赶到战场。拿破仑继续坚持战斗，他相信格鲁希很快就会随后而到。然而，拿破仑失望了，格鲁希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来，法军毫无挽回地溃败了。

第二天，当格鲁希元帅赶来时，他看到的只是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战场，在战场上躺着2.5万名死去的和受伤的法国人，以及2.2万死去和受伤的英国人及其同盟者，烧焦的旗帜，鲜血浸透的土地；他听到的只是乌鸦的哀鸣声，伤员的呻吟声……后人为拿破仑遗憾了一代又一代。

6月22日，拿破仑被迫第二次退位。

历史的重负，海岛遗恨，拿破仑魂归故里

1815年6月29日，拿破仑与母亲惜别。这位坚强的科西嘉母亲泪水缓缓流下双颊。她只说了一句：

“再见了，我的儿……”

“再见，我的妈妈，”拿破仑回答。

母子俩紧紧地拥抱了。周围的人们怀着凄楚的敬意，目睹了这一场面。然后，拿破仑上楼进了自己卧室。他脱去制服，穿上一条蓝色长裤、一件栗色上衣、一双马靴和一顶宽边圆帽。

10月16日，这个百万大军最后一个俘虏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中一个孤岛。这个孤岛因拿破仑这个超级囚徒而闻名于世，它叫圣赫勒拿。拿破仑永远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魂牵梦萦的祖国——法兰西。

身后只能听到诗人那悲怆的声音：

别了，这片土地。

我的荣誉的暗影在这里跃升起来，

并且以她的名字笼罩着世界——如今她遗弃了我——但无论如何，

我的声名，最光辉或最龌龊，却填满她的故事的一页。我曾经和一个世界争战，我所以被制服只因为胜利的流星太迢迢地引诱了我，我曾经力敌多少国家，因此它们才畏惧如此孤独的我，这百万大军的最后一个俘虏。

别了，法兰西。

——然而，如果自由再一次在你的土地上展开大旗，

千万记着我——在你幽深的山谷中，

紫罗兰仍旧在滋生，尽管干枯了，

你的泪水会使它绽开花朵——而且，而且我还会挫败包围我们的太军，

也许你的心听见我，又会跳跃、觉醒，

尽管锁链缚住了我们，但有些环必须打碎，那时候呵，转回头来：召唤你拥戴的首领。

拿破仑，这个一代豪杰，世纪的巨人，曾经给祖国带来巨大声誉和灾难的人，曾经把欧洲闹得天翻地覆的人，现在却囚居在万里汪洋的小孤岛上，在英国一个小总督吹毛求疵的监督下生活，把他与祖国、与人民、与母亲、与儿子

完全隔离开来……

1821年5月5日下午6时，拿破仑最后说了“法兰西……军队……冲锋……”之后，与世长辞了，苍白的嘴唇上，留着一丝宁静的微笑。站在他身边的伴侣们也许第一次意识到他的伟大。死神的魔力使他的脸容回复到第一执政的形象。

尽管拿破仑渴望葬到法国塞纳河畔，但英国拒绝满足他的最后要求，于是他被葬到了圣赫勒拿岛的杰拉尼奥山谷之中。

2年内，他就长眠在一块普普通通的墓板底下，只有寥寥无几的旅客前来参谒，只有那些按季节从一个大洋飞到另一个大洋的巨翼候鸟伴同他共度晨昏。

1840年法国感到它的荣誉缺少了依附，所以前来寻找他的遗骸。国民议会全体议员热烈欢呼政府的决定，并一致同意拨款100百万法郎为运回拿破仑遗骸和营建陵墓之用，这是法国从未给过别人的史无前例的荣誉。

拿破仑的骨灰荣归故国。12月15日，法国政府在巴黎残废军人院教堂内举行了盛大的安葬拿破仑遗骸仪式。巴黎人倾城出动。

墓上镶有一块金属板，镌有如下几个金色大字：

“拿破仑，皇帝和国王，1821年5月5日在圣赫勒拿岛逝世。”

墓门上刻有拿破仑遗嘱里的一句说：“我希望把我的遗骸安放在塞纳河畔我那样热爱的法兰西人民中间。”

拿破仑终于如愿以偿了。